新经济·系列

After the Welfare State

你的未来取决于是否理解这本书

—— 哈佛大学教授 杰弗里·米隆 ——

福利国家之后

（美国）汤姆·戈·帕尔默◎编

熊越 李杨 董子云◎等译



冯兴元 作序 **一堂与我们未来息息相关的经济学课**

张五常·李炜光·毛寿龙·朱海就·余世存·周林等 **联合推荐！**

全球知名学者为你解读西方福利国家的苦恼、忧虑和困境

欧美式福利是幸福，还是陷阱？

希腊与意大利破碎的"福利之梦"，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交替的恶性循环，紧张与焦虑正在西方社会持续升级……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与您共同探讨人类社会未来的福祉。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After the Welfare State

你的未来取决于是否理解这本书

—— 哈佛大学教授 杰弗里·米隆 ——

福利国家之后

（美国）汤姆·戈·帕尔默 ◎ 编

熊越 李杨 董子云 ◎ 等译



冯兴元 作序 一堂与我们未来息息相关的经济学课

Your Future Depends on Understanding What is in This Book

张五常・李炜光・毛寿龙・朱海就・余世存・周林等 联合推荐！

全球知名学者为你解读西方福利国家的苦恼、忧虑和困境

欧美式福利是幸福，还是陷阱？

希腊与意大利破碎的“福利之梦”，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交替的恶性循环，紧张与焦虑正在西方社会持续升级……著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与您共同探讨人类社会未来的福祉。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福利国家之后

（美国）汤姆·戈·帕尔默（Tom G.Palmer） 编

熊越 李杨 董子云 等译

海南出版社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17-13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利国家之后／（美）汤姆·戈·帕尔默（Tom　　G.Palmer）编；熊越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7.10

书名原文：After the Welfare State

ISBN 978-7-5443-7547-4

I.①福… II.①汤…②熊… III.①福利国家－文集 IV.①D08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7974号

福利国家之后

作　　者：（美）汤姆·戈·帕尔默（Tom G.Palmer）

译　　者：熊　越　李　杨　董子云　等

监　　制：冉子健

策划编辑：谌紫灵

责任编辑：孙　芳

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蔡爱霞　郄亚楠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总社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570216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红军营南路15号瑞普大厦C座1802室

电话：0898-66830929　010-64828814-602

E-mail：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7.875

字　　数：162千

书　　号：ISBN 978-7-5443-7547-4

定　　价：42.00元

目录

中文序

序言

Section 1 相互掠夺和无法维持的承诺

福利国家的悲剧

意大利之梦碎于福利国家

希腊福利国家：前车之鉴

Section 2 福利国家的历史以及它取代了什么

俾斯麦的遗产

互助组织的演变

互助取代社会福利：美国兄弟会案例

Section 3 福利国家、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

福利国家本质是庞氏骗局

“买得起房”的权利如何创造出整垮世界经济的泡沫

Section 4 贫困与福利国家

贫困、道德与自由

附录 市场的德性

安·兰德与道德革命

全球化：文化的解放

通过全球化改善人类处境

延伸阅读——《福利国家之后》

延伸阅读——《市场的德性》

译后记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

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中文序

Chinese Introduction

警惕“福利国家”，弘扬市场伦理

本部译著集成了《福利国家之后》（*After the Welfare State*）全书和《市场的德性》（*The Morality of Capitalism*）一书中的3篇文章。前者深度分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问题，后者则梳理了市场理念和企业家伦理的要义。其中《福利国家之后》一书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对欧美福利国家政策最为强有力的和中肯的批评。这种批评植根于逻辑论证和实证数据。两部著作中充满着洞见。所谓大道至简，其实这些洞见本来就应该是常识，因而也需要变成常识。

个人基本权利是最大的福利

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自由权利可能是其可以享受的最大福利。至于它的来源，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解释。基督教徒把这种福利归于上帝的赐福。在基督教运动中，保罗新观认为上帝面前众生平等，由此从基督教教义中发现了人类自由及其潜力，挑战了此前存在的众生不平等的错误认知。[1]保罗新观开始冲击地位不平等的传统，不啻为一场道德

革命。据说这一过程历时数世纪。到了十二三世纪，罗马教廷主持建立了以道德平等为基础的教会法体系。由此，个人在其后逐渐取代了家庭、部落或种姓，成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2]现代自由主义之父约翰·洛克的巨著《政府论》（上、下）就基于对上帝的信念，论证了人类一开始就存在一种自然状态，在这其中，人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其自然权利，包括个人的生命权、人身权和财产权。[3]所谓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就体现在行使和维护这些自然权利。

根据洛克的理论，政治社会和政府都不过是个人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在自然状态本身就拥有的自然权利而达成的制度安排。因此，作为代理人的政府权力来自于作为委托人的个人的授权，而最终权力掌握在个人手里。在这里，政府的运作需要以个人的同意为基础。并且，个人对政府的授权不会超过个人本身拥有的基本权利。如果政府的行为超越了个人的授权，未经个人同意，必须有法院能够接受个人的诉讼，由其做出公正的判决；否则，个人就会面对政府对他的宣战，就退回到了自然状态。此时，不仅个人自己有权应战，而且所有其他人均有权参战。

有关自由即“福利”的另外一个例子，可见上述洛克《政府论》里的阐述。洛克认为自然状态中的个人共同组建政治社会和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实现“public good”，即“共同善”。商务版《政府论》（下篇）将其翻译成“公共福利”。[4]这里，“共同善”或者“公共福利”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政治社会的社会契约和政府来更好保护洛克提及的广义“财产权”，它包括生命权、人身权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狭义财产权。

把公共利益视为个人利益的叠加部分

洛克从理论上系统性地论证了个人的平等和自主的地位，就像为一

个黑屋打开了一扇窗子，既让人看到了灿烂的阳光，又让人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越来越多的国家走向个人基本权利本位，享受着这方面的先发优势。至于个人的基本权利是否存在神圣的源头，部分国家的宪法里给予了肯定。其他国家，因为有了先前这些国家的制度参照，也在逐步接受个人基本权利本位，而且按道理可以少走弯路，享受这方面的后发优势。至于个人基本权利本位是否存在神圣的源头，无论是哪类国家，普通民众也并不关心。无论如何，个人是否存在宗教信仰，已经不会阻挡整个世界朝着接受个人基本权利本位的方向发展的大势。

个人基本权利本位与一个社会需要奉行公共利益并不相悖。这是因为可以把公共利益看成个人利益的叠加部分，它来自于个人的同意。也就是说，如此定义的公共利益实际上是个人利益的一部分。

但是，政府的运作很可能会违背个人的同意：政府越是接近亚当·斯密所指的“守夜人”国家的角色，[5]个人同意的可能性越大；越是走向“掠夺之手”的角色，[6]个人同意的可能性就越小。“守夜人”国家重视并充分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尊重以赛亚·伯林所谓的“消极自由”；“掠夺之手”则往往来自于政府，而掠夺本身则往往是政府和民众追求各种“积极自由”的结果。[7]“消极自由”是一种不让别人妨碍自己的选择为要旨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个人有干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意味着：当个人处于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状态时，个人就是自由的。“积极自由”则经常意味着，要求主动控制和干涉某人某事，决定某人应该去做某件事、成为某种人。“积极自由”的这种性质容易导致其被人滥用，尤其是被掌握公权的政府滥用。对于“消极自由”的赞成者，“积极自由”往往意味过多的国家干预，而这又常常会削弱个人的积极性，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

诚然，在政治生活中，权力的滥用不是例外现象，而是普遍现象：

这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轻重的问题。美国政府债台高筑问题就与两大政党为了赢得竞选而不断增加对选民的福利承诺有关。也就是存在“多数暴政”的问题。而我国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猖獗、权钱交易严重，由此造成了分配严重不公。这说明我国存在“威权滥用”的问题。1980年，针对当时美国政府债台高筑问题，里根总统在其首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府不是解决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则在上任后针对国内滥权问题，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要避免“相互抢劫”的福利盛宴

在自由和福利的关系上，目前国内学界流行一种要求节制自由的“好好先生”方案：崇尚自由者应该节制自己对维护自由的要求，主张福利者也要压抑自己对福利的要求，这样节制一点自由，增进一点福利，社会就万事大吉。虽然这里的“自由”仍然指涉基本权利，“福利”则是指英文用词“welfare”，特指“给予的权益”，英文用词为“entitlements”，即政府组织提供的大量转移支付和再分配。

上述“好好先生”方案，与其说是一种解决方案，不如说是制造问题。因为它只是在两种立场之间选中间立场，缺乏一套原则作为支撑。随着时间的推进，由于两种立场代表的力量可能存在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关系，两种立场本身会不断变化，中间立场也会不断变化。长此以往，就失去了是非观。从长期看，由于现代国家一般难以做好对政府的限权，不到一定的时候，这种方案其实很容易成为一种个人基本权利总体上不断退缩的方案，上一个阶段实现的福利（即给予的权益）要求同时构成了下一阶段提出进一步福利要求的基础：第一阶段，崇尚个人自由者迫于主张福利者对福利的要求，节制了对维护其个人自由的部分要

求，主张福利者也压抑了其对福利的部分要求，暂时达成一种“均衡”；第二阶段，主张福利者会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崇尚个人自由者又被迫做部分让步，主张福利者的福利又进了一步。依此类推。主张福利者步步紧逼，崇尚个人自由者则节节败退，除非这种福利国家化到了不堪重负之时。在这里，现代民主国家的党派竞选和多数表决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党派竞选中，各党派为了获取更多的选票而对选民做出越来越多的福利政策承诺。在多数通过原则下，承诺越多，当选的概率越大。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福利作为“给予的权益”，往往构成一种只进不退的“棘轮效应”。政府为了获取民众的支持，福利承诺倾向于不断加码。其结果往往是政府债台高筑、骑虎难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中把这样一个个人自由空间被迫步步压缩的路径称为“通往奴役之路”。[8]他当时指的是19世纪欧洲形形色色的集体主义做法所引致的下坡路。这些集体主义做法包括各种计划经济、干预主义、福利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的做法。哈耶克的断言迄今为止仍然有效。而且，这些种种集体主义做法的思想源头不仅仅始于19世纪，而是更早。

在政府政策层面，种种集体主义的前进之路则体现为哈耶克密切关注的一种不断上升的对经济的干预螺旋效应：政府的干预政策会产生扩大干预范围和干预力度的必要性，从而导致进一步的政府干预。

在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很多人已经分不清楚什么是“right”，什么是“entitlement”，也就是分不清楚“权利”和他者“给予的权益”。正如《福利国家之后》一书的作者之一大卫·凯利在文中所说，他们把政府提供的福利看作“福利权”。在这些国家，上述博弈过程很难消停，往往要到福利国家发展到臃肿不堪，甚至发生重大危机时，很多人才开始反思。

巴斯夏认为国家不应该成为“压迫”（oppression）和“相互抢劫”（reciprocal plunder）的工具。[9]本书的主编汤姆·戈·帕尔默（Tom G.Palmer）指出：福利国家是这种“相互抢劫”的制度化。这是很有道理的。福利国家发展到一定臃肿程度，人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否愿意，人人分享国家提供的大量福利，又要程度不同地负担相应的开支。正如帕尔默所言，很多纳税人本来可以减少纳税，而不是通过缴纳更多的税金、同时参与“相互抢劫”。这些参与“相互抢劫”的纳税人，指望借此捞回本钱，达到止损的目的。

尽管这个世界有句“天道酬勤”的古训，但是福利国家却往往不是一个奖勤罚懒的社会，反而是个罚勤奖懒的社会。正如本书作者之一帕尔默在《福利国家的悲剧》一文所展示的那样：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结果就变成了“公地”资源，导致所有人无论是富是穷，是自愿还是被迫，都趋于从中尽力攫取、过度利用，从而酿成“公地悲剧”。[10]长此以往，个人的自由权利被侵犯，个人责任原则荒废，社会活力倾向于消弭，懒汉情结泛滥，依赖心理盛行。一个自由的社会，本来要求每个个人在享受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个人是责任人，政府是责任政府。在这样一个社会，由于更好地保障了财产权利，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更易订立和利用各种各样的契约，更能充分利用市场制度，更可降低交易成本，更有机会迈向一个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要用自然正义框定“社会正义”

在公共政策问题上，无论哪个国家要遵循同意原则都很难不存在问题。正因为如此，社会成员对同意原则的遵循与否要有着一个心理承受

度，他们之间需要在个人利益上实现某种共和，同时要注意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我们的个人基本权利经常会遭遇法律和政策的限制。对法律与政策达成一致同意一般是不可能的，一致同意的制度交易成本太高，一致同意意味着一票否决权：只要有一人反对，法律和政策就无法通过。[11]而法律和政策的通过，对社会中的所有人具有强制力。所以我们真正能够追求的，可能是强制的最小化，而很难实现毫无强制。正因为如此，哈耶克把自由定义为一种人的状态，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所施以的强制被减少到尽可能小的程度。[12]

当前这些福利国家初看起来至少存在两大类对峙的群体：一类是“财富创造者”群体；另一类是“财富抢劫者”群体。“财富抢劫者”通过议会多数表决机制要求“财富创造者”心平气和、各有节制地与其“分配”财富。按照“财富抢劫者”的逻辑，只有其“分配”到财富，才体现“社会正义”。目前欧美学术界的一个时髦用语就是罗尔斯《正义论》中强调结果平等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或者“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13]问题是，如果不能伸张保护广义财产权意义上的、本来就在自然状态存在的自然正义（Natural Justice），要何“分配正义”？仔细看下来，正如上文所述，在当前这些福利国家，就连“财富创造者”也参与到“财富抢劫者”的行列，希望通过参与“相互抢劫”来止损。其结果是，人们固化了“财富抢劫”的“权利”观，而失去财富创造的激励。

罗尔斯意义上的“社会正义”或者“分配正义”，其一大要旨是差别原则。根据该项原则，“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既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的最大利益，又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是根据存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最大最小值标准（Maximin Criterion，意指最大化最小值的标准）推导出来的。但是，布坎南对罗尔斯的批评是有道

理的。1998年，在德国慕尼黑与财政学家马斯格雷夫为期一周的辩论会上，布坎南承认自己属于罗尔斯的思想体系，认为至少罗尔斯在试图解决人们如何认识公平的问题，而不是试图灌输和声称我认为公平是什么或者其他人认为公平是什么的研究思路是正确的，认定罗尔斯作为公平的程序正义在目标上是正确的——即可以通过其结果定义正义。但是布坎南指出：罗尔斯不该推导出一个具体的结果。程序并非必然产生差别原则。差别原则作为一种公平程序的可能结果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其他结果也可能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心目中的公平究竟是什么是经验问题。同年，布坎南在接受汪丁丁教授采访时认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将他的“差别原则”当作一种特殊的可能结果（即与其他各种可能性并列，而不是被当作从正义程序推导出来的普遍原则）。[14]

按照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值”标准，差别原则要体现使得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的最大利益”，这既不适用于发达国家，也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罗尔斯在整个推导过程中没有引入成本分析：首先，满足“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的最大利益”的差别原则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的、甚至是难以为继的福利负担；其次，它最容易给懒人不工作提供最大的正向激励，诱使或者怂恿懒人不工作，从而鼓励更多的人放弃其道德整合性，加入到败德队伍之列。可以说，差别原则可以导致发达国家财政负担重不堪负，导致发展中国家即便财政负担不堪重负也难以达到所要求的标准。

欧美福利国家：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概念主要强调由政府来主导甚至包揽对社会成员“福利”的保障，其途径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和维持教

育、卫生或者养老和收入保障等社会支持系统。可能最为有名的就是所谓“北欧模式”，而北欧国家中最为有名的是瑞典。瑞典的做法是从摇篮到坟墓，政府提供全套社会保障。虽然谁都喜欢获得福利待遇，但是天上掉不下免费的馅饼。福利国家问题的症结在于侵犯个人的基本自由，背离同意和责任原则，大搞社会福利分配，从而引起帕尔默所言的“相互抢劫”的制度化问题。[15]

洛克认为，财产权作为经济自由的核心内容，优先于政治权利。哈耶克秉承了洛克的基本权利观。他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指出：“离开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而且“没有经济自由的政治自由是没有意义的”。[16]因此，需要警惕福利国家政策对个人财产权的侵蚀，这种侵蚀最终导致个人政治权利的受损。

福利国家政府维持福利政策的运作，需要通过制造大量的“财政幻觉”来向每个人提供福利，这种幻觉使得纳税人觉得所承受的负担比实际上的负担要轻，受益比提供给他们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要大，从而混淆每个人对自己所承担成本的敏感性，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人对于任何给定的税收水平的反抗。

福利国家的种种做法，若要勉强维系下去，政府除了要控制再分配领域之外，还要尽量控制财富生产本身。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第7章开头，他引用的一句题记是希莱尔·贝洛克的话：“控制了财富的生产，就是控制了人的生活本身。”

欧美国家中福利政策的做法五花八门，可以从《福利国家之后》一书列举如下：

第一，政府提供住房福利。美国政府通过其拥有的“两房”公司干预住房市场，放松对住房市场和相关金融市场的监管，制造一种低利率环

境，支持不合房贷资格者获得低息住房贷款和廉价住房。由此，政府放松了对住房市场纪律和市场原则的遵守，把住房市场政策与住房福利政策混同。美国“次贷危机”就与此密不可分。

根据《福利国家之后》一书作者之一齐汉·诺伯格的介绍，小布什总统当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所有权社会”，倡导公民们通过获得住房所有权来控制自己的生活和财富，以此推进公民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感。但美国政府当时并没有依托交换住房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使得本来不符合房贷资格者可以通过美国政府的房利美和房地美，即“两房”，来拥有低息住房贷款和购置廉价住房所有权，而且这样做相对于通过市场合约关系来说更加有利。“两房”在2004年左右放出了他们将购买任何贷款的消息，这是怂恿银行和其他机构开始发放次贷和准优级贷款这两类“垃圾贷款”的主要原因。2003年，“垃圾贷款”占据了美国抵押贷款8%的份额，但是在2006年的第三季度变成了22%。“两房”在2005—2007年间有40%的抵押贷款是次贷或准优级。

根据诺伯格的文章，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于住房市场的联合财务风险是巨大的。2007年年末，其负债和他们担保发行的抵押担保证券的总和与美国国债数量相等。对于每100美元他们担保或者通过证券借出的钱，他们只有1.2美元的权益。2008年8月，“两房”所拥有的“垃圾贷款”和基于“垃圾贷款”的证券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

第二，政府为了维持福利政策而债台高筑。根据《福利国家之后》一书作者之一麦克·坦纳的分析，福利国家本质是庞氏骗局。如果将国债细化到个人身上的话，每一位德国在职人员身负42000欧元（折合52565美元）的国债。每一个英国家庭承受着惊人的90000英镑（折合140332美元）的国债。每一个法国人都负担着24000欧元（折合30037

美元）的国债。此外，在当前的计算方法下，国家养老金系统和社保体制的无资金准备负债（也就是社保空转额）不计入国债总额，这使得这些国家债台高筑的情况被严重低估。欧洲国家平均的无资金准备负债占据了GDP的285%。

根据坦纳的报告，在某些国家，这些隐性负债在未来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以希腊为例，假如它承担起未来的一切无资金准备债务，希腊的债务总量就将超过其GDP的875%，接近年生产总值的9倍。如果将当前法国承诺分发的养老金考虑在国债内，法国的债务总量就会大涨到当年GDP的549%。而德国若是完全负担起无资金准备债务，其债务总量将会飞升至GDP的418%。美国的负债总额也同样不容乐观，如今已超过15.3万亿美元，占GDP的102%。美国福利体系仍在快速扩张，其中很大一块就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医保方案。美国联邦政府目前的开支超过GDP的24%，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会增长到42%。如果加上美国各个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各级政府的总开支将会超过GDP的59%，这比目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

第三，推行强制性的法定养老制度。很多欧美国家采取“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现收现付”制不实行个人账户积累制度，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收统支，现收现支。养老金领取者不断要求增加国家的养老金支付，甚至认为这只是在偿还他们所缴纳的金额。根据坦纳的分析，美国政府告诉美国人，他们的社保税被“投资”到了一个“信托基金”。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联邦政府用明日税收支付明日福利而开出的欠条。政府往往需要增加负债来维持养老金制度，由此加重了未来一代人的负担。根据坦纳的文章，政府运作养老金项目的作法，是收取在职职工的钱用于支付给退休者。然而在老龄化社会里，这样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现收现付”模式有着与“庞氏骗局”别无二致的资本结构。随着进入

老龄化社会，退休领钱的队伍愈发壮大，支撑养老金的在职人口随之减少，系统就会岌岌可危。

第四，推行强制性的义务医保体系。坦纳的文章表明，即便保守估计，根据奥巴马医保法案中对老年人医保开支的预测，未来社保和医保造成的无资金准备负债，将导致美国欠下72万亿美元的债务。但更现实的数据则表明，届时美国政府承担的负担至少将达到137万亿美元。所以即使是做最好打算，美国国债总数也将超过到GDP的480%。而在最坏打算下，美国收支间的鸿沟将达到GDP的911%。

此外，对人员流动和经济过程的各种过度或者不当干预也是福利国家的做法。严格限制移民的政策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发展。移民是美国创新动力的重要源泉。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管制不利于创造就业，也不利于维护就业，反而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雇佣。最低工资制就是一个实例。2014年4月30日，美国共和党在参议院阻止了民主党主导的提高最低工资法案。该法案旨在把美国的联邦法定最低工资水平从每小时7.25美元提高到10.10美元。提高最低工资的结果必然是雇主对工作岗位的成本和收益做新的计算，往往容易考虑削减低端的现职岗位，节制雇用新的雇员，引入机器设备来替代部分劳动岗位。民主党的这一民粹主义举措实际上会牺牲很多工人的利益，却会获得不知就里的大众的支持。

福利国家的一些替代：互助组织与“智利模式”

一个人格完整者，是责任人的概念，要为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负责。政府也是责任政府，其运作总体上需要征得个人的同意和授权。正如《俾斯麦的遗产》一文中提到的，福利国家强调政府有法定义务为个人的社会福利负责，尤其是政府包办医疗、教育、退休和收入保障等等。

其结果是政府强制从经济中攫取大量资源，破坏个人的基本权利、同意和责任。由此，个人不能成为责任人，政府不能成为责任政府。

《福利国家之后》一书的作者之一，历史和政治学家大卫·格林在《互助组织的演变》一文中详细展现了“私人慈善”和“自愿保险”在欧美历史上的广泛存在及其作用。大量民间自组织的慈善组织和带有自愿保险职能的“互助组织”，为当时的各阶层提供了重要的社会保障功能。中国在古代也有广泛的私人慈善活动，到了民国时代，私人慈善和社会自治发挥了越来越大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作用。而中国乡土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人情，就有着类似于民间互助保险的功效：你所付出的人情，在你需要的时候可以回收，而且一般考虑到了那些已剔除了的通货膨胀的因素。

历史学家大卫·贝托（David Beito）的文章记录了美国人利用结社自由创造出的巨大互助组织网络。在大萧条之前，互助组织可能是除教会以外，美国最主要的社会福利提供者。当时，互助组织的会员数量占到了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3成左右，尤其受到移民和非裔美国人欢迎。与政府福利计划和私人慈善的施舍性质不同，互助组织提供的福利是以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互惠为基础的。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各种兄弟会与其他互助组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且再也没能复苏。根据贝托的分析，引发这次衰退的原因，可能包括福利国家的崛起、各州限制性保险法案的提出以及私立保险公司的竞争。

福利国家用“政府责任”替代了“私人慈善”，用政府组织的强制社会保险替代了欧美国家过去在民间自组织的自愿保险。正如格林一文所显示的那样，自力更生和私人慈善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福利国家仅有的替代选项：“正如私人合作建立的互助组织能够维护社会的团结，为参与人提供紧急援助、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福利，并提供一个传播道德

价值的框架”。坦纳在文章中也指出：政府要放弃这种“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放手个人通过投资在产业中来养老；全世界的公民和政府都应该开始让强迫性的、家长作风的、充满操纵却又缺乏延续性的福利国家，朝着有效、公平、高效并可持续的民间解决方案过渡。

显然，人类发展到当代，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需要复兴各种互助组织来组织自愿的保险和救助。与此同时，可以结合以私人商业保险机构，后者在互助组织之外也可以发挥重要的私人商业保险功能。至于政府，可以发挥辅助性的支持作用，而不是包揽社会保障。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收现付”的养老制度也应该及早抛弃。替代“现收现付”方式的成功模式目前也已存在。比如智利养老保险模式值得研究和借鉴。“智利模式”比较强调遵循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和个人责任原则。智利在社会医疗保险或者社会养老保险中推行个人公积金制度。它于1981年开始实施以个人账户和由私人养老基金管理公司代替政府管理养老金为主要特征的养老保险制度。该制度采取完全的基金制，个人的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后养老金待遇也完全取决于个人养老账户的积累额和投资收益。由于实施了商业性的基金管理模式，智利的养老金的投资收益率在改革后的最初10年年平均收益率达到13%。[17]据统计，经过20年的发展，智利的8家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水平不断提高，从1981—2000年，平均收益率在11%左右。到2000年年底，智利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经营的养老基金的总额已经达到358.76亿美元，其中35.73%投资于智利政府和央行发行的各种债券，18.72%投资于定期储蓄，14.35%投资于商业抵押票据，17.57%投资于企业发行的股票和债券，10.89%用于国外金融市场的投资。此外还有部分投资用于金融机构发行的股票和债券等。[18]

市场理念与企业家伦理：观念创造现代世界的繁荣

本书附录收入《市场的德性》一书中的3篇文章，包括客观主义哲学家大卫·凯利的《安·兰德与自由企业制度：道德革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全球化：文化的解放》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通过全球化改善人类处境》。这些文章为我们展现了有关市场理念和企业家伦理的洞见。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同意经济和责任经济，基于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保护、同意和责任。市场经济实现个人收入的初次分配，这种分配体现绩效原则：在充分竞争的市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边际回报，就是其边际贡献。因此，市场经济体现了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好“装置”，同时它也是“社会”的，不是“反社会”的。如果社会上存在一部分人员由于自己的原因无法参加收入创造，那么可以从其家人或者从他人的自愿慈善获得一些收入再分配。而政府组织的收入再分配反而要靠后，发挥辅助性的作用。这属于一种有运作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自然秩序。从这一点来看，把慈善业提供的再分配作为三次分配，那是错误的。慈善业应该至少与政府一样属于二次分配。按照这里的自然秩序，慈善业属于二次分配，政府涉足的需要限定在三次分配。

有人会以为，《福利国家之后》和《市场的德性》两书与国人无甚关系。他们进而认为，中国还不是福利国家，批判福利国家为时过早。但这是一种误解。很多福利国家因素在中国早已存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大办“公共食堂”就是一例。各种社会保险均在铺开，其中多数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劳动合同法已经在2007年通过，最低工资制也已推行，地方政府社保资金空转额巨大，地方债台高筑，社会福利性住房建设规模空前。

至于本书所选《市场的德性》中的文章，其所论述的市场理念和企业家伦理，也就是“市场的德性”。著名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就指出，是观念和修辞的改变才造就了现代世界的繁荣[19]。伴随着观念和修辞的改变，企业家的人格、地位得到尊重，企业家的资本自由得到尊重，由此激发了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创新。这里，正如弗农·史密斯在其《通过全球化改善人类处境》一文中所说的那样，市场和交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正是市场和交易这两种事物使我们能够从事各种工作，使知识有了专业分工。知识的专业分工，正是一切财富创造的秘诀，是人类处境持续改善的唯一动力来源。我们可以看到史密斯知识结构中带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知识贵族”哈耶克思想的烙印：哈耶克早在1937年就强调“知识分工”（Division of Knowledge）的重要性[20]。这正是全球化的本质。其结论就是要拥抱全球化。同样的结论也出现在了略萨的作品《全球化：文化的解放》中，只有拥抱全球化，那些曾被遗忘的、被边缘化的、被压制的地方文化才能在全球化的大合唱里重现生机。

很多国人对贸易、市场或者“做生意”的鄙视或者误解，这是可以理解的。儒家把社会成员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商人被排在末尾。亚里士多德认为，商贩之得意味着贸易对方之损。他由此把商业视为“零和博弈”。这些鄙视商业和商人的观念，后来影响了苏联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该体系只把生产计入社会产品总值，而不进入贸易或者服务的价值。亚里士多德反对货币投资以求以钱生钱的任何行为，但是，现代经济学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以钱生钱是正当的。比如根据庞巴维克的研究，利息可以用货币的时间价值来解释。[21]庞巴维克把利润、利息、地租等各种收入都归结为人在不同时期内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不同的结果。他认为，产生利息的交易仍是一种商品的交换，存在所有权的转移。庞巴维克把所有物品分为两类：直接满足欲望的现在物品；满足将来欲望

的将来物品。他认为，两者存在价值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一切资本利息的来源。这里，庞巴维克是广义定义利息的。他把利息分为三种形态：一为借贷利息，即利息的一般形态；二为企业利润，即利息的特殊形态；三为耐久物品的利息，即租金。实际上，全球化就是对上述三种利息形式的广泛接受，其背后就是大量的创新和贸易的拓展，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均成为其受益者。

为了长远地保障每个人的根本利益，我们需要警惕“福利国家”，弘扬市场伦理。为此，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原则，辅助性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法定授权原则（Principal of Conferral）以及法治原则。[22]根据辅助性原则，个人和市场能够承担的事务，政府不予以越俎代庖；下级政府能够承担的事务，上级政府也不能如此行事。法定授权原则是指政府根据公民的依法授权和明确列举的权能履行其职责。如果能够遵循好上述原则，差不多就遵奉了哈耶克所提倡的“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Law）原则。[23]

上述原则的拥护者，要像《福利国家之后》和《市场的德性》两书那样，尽量直接提出反对福利国家的具体理由，弘扬市场伦理的理念，把这些理据和理念变成人人皆知的常识。此外，上述原则的拥护者还要提出自己的、可被广泛接受的替代性社会政策方案，也就是说，这些理据和理念要接上“地气”，方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以此角度研究和提出社会政策方案的经济学家仍然属于凤毛麟角。但是，并不是说不存在这样的方案，比如上述智利模式就符合“法律下的自由”理念。这并不是说智利模式就完美无缺，但是它可供世界各国作为具体参照。

冯兴元

2017年7月5日于北京颐源居

注：

[1] 拉里·西登托普："自由主义的宗教渊源"，FT中文网，2014年4月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5594。

[2] 拉里·西登托普：同上。

[3] 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London:Awnsham Churchill，1689.

[4] 洛克·约翰.政府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 A.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776.

[6] T.Frye，A.Shleifer.*The invisible hand and the grabbing hand*.Working Paper 5856，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7] I.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In Isaiah Berlin.*Four Essays on Libert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

[8] F.A.Hayek.*The Road to Serfdom*.London:Routledge&Sons.

[9] Fredéric Bastiat.*Selected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trans.Seymour Cain，ed.George B.de Huszar，introduction by F.A.Hayek.Irvington-on-Hudson: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Chapter 5: The State.

[10] G.Harding."The Tragedy of Commons"，*Science*，162：pp.1243-1248.

[11] 詹姆斯·J.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2] 哈耶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自由宪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3] J.Rawls.*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Cambridge:Belknap，

1999.

[14] 高小勇、汪丁丁主编：专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15] Tom G.Palmer :“The Tragedy of the Welfare State”，in: Tom G.Palmer（ed.）:A *fter the Welfare State*，Ottawa:Jameson Books，Inc.，2012，pp.5-14.

[16] F.A.Hayek，*The Road to Serfdom*.Routledge&Sons，London，1944.

[17] “瑞典、俄罗斯和智利三国养老保险方案比较”，载全景网，2004年5月13日。

[18] 宋洁云：“智利的新型养老模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1月19日。

[19] D.N.McCloskey.*Bourgeois Dignity: Why Economics Can’t Explain the Modern World*.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 F.A.Hayek.*Economica*：*Economics and Knowledge.4*（13）:pp.33-54.

[21] E.Böhm-Bawerk.*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translated by W.Smart.New York: Stechert，1889.

[22] 上述四项原则均见于《欧洲宪法》草案。参见冯兴元等：立宪的意涵：欧洲宪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3] F.A.Hayek 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 Rules and Order（1）.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序言

Introduction

福利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如今的年轻人正在遭受抢劫。被抢的是他们的权利、他们的自由、他们的尊严和他们的未来。罪魁祸首是谁？是我这一代人和我们的先辈们，他们创造出或是未能阻止这个肆虐全球的引擎，它驱动了我们称之为福利国家的盗窃、堕落、操纵和社会控制。

福利国家应当为目前的两个危机负责：金融危机放缓甚至逆转了经济增长，并让全世界各经济体深陷泥潭；而债务危机正在影响欧洲、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它已经在我们之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孩子和年轻人——的肩膀上堆起了债务大山，并做出了不可能兑现的承诺。无准备金的债务危机正在到来，场面将不会好看。

本书的这些文章不会是关于福利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主题的最后文字。恰恰相反，这仅仅是抛砖引玉，希望它们可以激发出对这个问题的更多思考、研究和自省。相应地，一些文章以一种更为学术的文体呈现，而另一些则更像是新闻的体裁，它们运用了各个知识学科。我们希望，它们将为每一位读者提供有一些价值的东西。

随着福利国家开始溃败，它为什么会发生值得一问。福利国家在重大国际危机的引发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福利国家来自何方，它如何运行，以及它取代了什么？最后，现在这个不可持续的体制之后随之而来的会是什么？这本书的目的便是帮助读者们解决这一连串的问题。

有的人认为福利国家是神圣、不容置疑和秉性良善的。对这些人而言，重要的是“意图”，且只有意图。意图对评价人的行为固然重要，但在评价制度之时，我们也应该看证据，然后研究导致了特定后果的激励机制。那些只看意图的人在证据和艰巨的问题前停止了思考。他们认为，只有动机不良的人才会去质疑福利国家，这让那些质疑福利国家的人们成了坏人；人不能轻信坏人，因为坏人只想去骗你；所以最好堵住耳朵、封闭思想以免被他们所骗。

然而，并非所有的思想都是封闭的。那些心态开放的人相信，我们应该探究福利国家所建立的激励机制是否会导致公民们相互对立，并促进一个相互掠夺而非相互团结的体制；当下的福利国家制度是否是不可持续的；政客们是否会响应激励，去承诺——公民们也要求——多于能够提供的；福利国家是否会成为一种反民主的操纵形式，并倾向于时而细微、时而宏大地破坏民主自由主义，而不是作为对民主自由主义的补足；以及被福利国家所破坏的东西是否实际上比取代它们地位的东西更人性、更高效、更可持续。我们理解和评价福利国家的工具应该是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数学，而不是情绪反应或阴谋论。这本书是为那些喜欢提出艰巨的问题，并以开放的心态去探求这些问题的人写的。是时候去问这些艰巨的问题了，福利国家造成了什么，它能否持续，而福利国家之后将会是什么。

汤姆·戈·帕尔默

耶路撒冷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Section 1　相互掠夺和无法维持的承诺

MUTUAL PLUNDER AND UNSUSTAINABLE PROMISES

> “要是我没得到那份政府补助，别人就会得到”，于是就会有人把资源使用殆尽当作一种激励。他们为领取政府拨款辩护，理由是他们“只是在拿回他们所缴的税”，即便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走的东西所缴纳的要多得多。

福利国家的悲剧

汤姆·戈·帕尔默

多数对福利国家的研究完全集中在那些支持者们的意图之上，或仅提供对当前收入转移计划的单纯描述。本文借鉴了关于公共池塘资源的经济学来研究福利国家——一个动态和不断发展的系统，一个已经创造出激励制度去耗尽自身的“公地悲剧”。

福利国家和渔场有相似之处。如果没有人拥有湖里的鱼并对其负责，而一个人可以得到他从湖里捕捞起的所有鱼，那么人人都会试着去尽力捕鱼。每人都会认为：“如果我不去捕鱼，别人会去。”我们中的每个人可能都知道，现在大量捕鱼意味着将来湖中的鱼会被捕光，但只要别人还能捕我不去捕的鱼，我们之中就没有人会有激励去限制自己的捕捞，并让鱼群恢复自身数量。[1]鱼群被捕的速度超过它们繁殖的速度；水中的鱼被捕尽，最终每个人都要吞下苦果。

环境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称其为“公地悲剧”。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大量环境危机——枯竭的海洋渔业、大气和水污染以及其他种种问题——的根源，但它并不仅限于环境问题。福利国家的运行也像一个公地，随着你阅读本文，悲剧一点点展现。在现代福利国家，每个人都有像不负责任的渔夫捕光鱼群那样的激励，但我们所掠夺的是对方的资源。每个人都寻求从自己的邻居那里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的邻居们也在试图从他那里尽力攫取。福利国家把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所说的“相互掠夺”制度化了。[2]

因为我们可以掠夺对方的资源，从而人们会想："要是我没得到那份政府补助，别人就会得到"，于是就会有人把资源使用殆尽当作一种激励。他们为领取政府拨款辩护，理由是他们"只是在拿回他们所缴的税"，即便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走的东西比所缴纳的要多得多。每个人都有攫取的激励。这个悲剧还有一个在枯竭的渔业这个案例中没有体现出来的一面：因为我们在相互掠夺资源，我们不仅要下工夫去掠夺我们的邻居，还得下工夫去避免被同一群邻居掠夺，这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比案例中的情况更糟。我们不仅掠夺他人的资源，我们还越来越多地以超过任何可承受的水平在被人掠夺。结果是山穷水尽。这也正是我们正在与福利国家一起面对的：

- 政府已经向如此多的选民许诺了如此多的利益，全都以彼此为代价，这些体制是不可持续的，但获利者里没人情愿放弃自己的利益。我们本可以这样做以换取更低的赋税，但我们甚至没有那样的选择权。政府可以借钱并把征税推后，也就是推到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届时他们将许诺更多，通过更多的借贷来提供经费。
- 养老金领取者要求增加国家养老金的支付，甚至认为这只是在偿还他们所缴纳的金额。这些养老金的经费提供是建立在"现收现付"（Pay-As-You-Go，PAYGO）的基础上，这意味着从当前的工人那里收的税会支付给当前的领取人。税收超过支出的任何结余都只是"被投资"到政府债券，也就是未来税收支付的承诺。这就是所有美国政府的"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本质："放置在一个不起眼的政府文件柜抽屉底部"[3]的一张大大的"欠条"（IOU）。实际上，"信托基金"并不存在，这是一个巨大的骗局。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被迫支付他们祖父母的退休金，以及他们父母的退休金，并且——如果他们还有钱剩下——他们还得养活自己。国家养老金计划的结构和经典的"金字塔骗局"是一模一样的，它也被称为"庞

氏骗局”或“连锁信”（Chain Letters），它需要支付的人的基数无限增加；当它停止增长，金字塔就会崩塌。政府可以通过印钞票或者借钱来推迟这一在劫难逃的事，但只能是推迟，并且随着每次推迟，情况都会变得更糟。你现在可以听到倒塌的轰鸣声了。

- 农民要求给他的庄稼补贴，这以汽车工人所纳的税为代价；汽车公司和汽车工人要求针对更实惠的进口车的“保护”，以及对破产公司的救助。贸易限制对农民来说提高了车辆的价格，而对汽车公司的救助提高了农民缴纳的税。为了农民的利益，汽车工人被掠夺，而农民被掠夺也是因为汽车工人的利益。相互掠夺的循环周而复始，大多数的“赢家”在一个周期完成后变成输家（当然，一些专门从事操纵政治制度并和安·兰德所说的“靠关系的贵族（aristocracy of pull）”[4]打交道的人，赢得的东西远多于失去的东西。有政治关系的华尔街公司如高盛，巨型农业企业如阿丹米，及其他一些公司便从靠关系的贵族那里获利丰厚）。
- 我们被税务制度装进了医疗“保险”制度的箱子（在美国，私人保险的支付被与工资绑定，同时工资税为“医疗保险”提供资金；而在欧洲，它们和税绑在一起，某些情况下是和私营保险商绑定）。这种“第三方承担经费”影响了我们可用的选择。因为这种预付费的“保险”通常提供日常护理，至于灾难性的事件（如车祸导致的伤害、癌症或是疾病），我们只能在接受救治前征求保险商的同意，不论私营还是国有都是如此。尽管被称为保险，“健康保险”常常都不是真的“保险”；它是预付费的医疗护理，这产生了使消费者滥用的激励，也在各保险公司和政府之中产生激励去监控消费者，以决定我们是否有资格获得偿付。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能行使我们作为其他重要商品的消费者所能行使的同样的选择，于是我们被迫像请求者，而不是顾客那样行动，而医疗服务

则越来越由管理者配给，而不是由顾客购买。

给特定可识别群体的利益是集中的，而成本被分摊到人数众多的纳税人和消费者头上，这给了受益人攫取更多好处的激励，而被掠夺的人则没什么动力去捍卫自己的利益。得到好处的时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但不会停下来考虑对其他人来说这个好处的成本；当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成本变得巨大。穷人最受折磨，因为点滴之利在他们看来都像是一种恩惠，正是福利国家使他们的贫困永久化；而恃强凌弱的隐性转移支付，如保护主义、特许经营和其他对劳动市场自由的限制，以及其他所有的特权和优待又让他们的贫困更为深重。而这些特权和优待都是强大、受过教育、表达流利又大权在握的人为他们自己所设立的，牺牲的是弱小、未受过教育、沉默、无权无势的人。

移民被系统性地妖魔化成“为了得到我们的福利利益才来”。福利国家的臣民通过排挤想要成为移民的人，并把他们丑化成蝗虫和抢劫者[5]来保护“自己的福利利益”，而不是欢迎大家到来并创造财富。与此同时，政治精英们大肆表明，他们正在通过从纳税人那里收取的金钱帮助国外的穷人，为寄生的国际“援助业”提供资金，倾销大量由福利国家政策（通过保障农产品最低价来补贴农民）产生的农业剩余品，并把战利品转交给独裁政府。简而言之，通过福利国家的国际化。这整个过程是一场灾难，它破坏了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责任，因为政治领导人知道，必须解决好外国施主们的问题，而非当地公民和纳税人们的问题。这对军阀割据和内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已摧毁了当地的生产制度。[6]

当公民在一套庞大的相互掠夺（和抵御掠夺）体制里和其他公民和移民争斗的同时，官僚们扩大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并创造和培育了支持他们的政治选民。

相互掠夺并不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唯一显著特征，它已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是一个愚蠢政策的意外结果，这些政策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政客所采纳，但他们不用承担自己政策的后果。在我写这篇文章之时，两起危机正在肆虐全球。

金融危机与福利国家

金融危机形成于有同情心的动机和不良的激励措施的交汇处。这些激励措施是由愚蠢的政策造成的，它们全都能追溯到一个哲学，即控制我们的行为，把彼得的东西拿去给保罗，以及篡夺对我们生命的责任都是政府的目的。[7]当前危机的种子在1994年被种下，那时美国政府宣布了一项宏伟的计划，要把美国的住房拥有率从人口的64%提高到70%，该计划将通过“国家住房拥有伙伴关系”实施，这是一种联邦政府和银行、房屋建筑商、金融家、房产经纪人以及其他特殊利益者之间的伙伴关系。正如格雷琴·摩根森（Gretchen Morgenson）和约书亚·罗斯纳（Joshua Rosner）在《鲁莽的危害：过大的野心、贪婪与腐败如何导致经济的末日决战》一书中证明的：“这种伙伴关系将通过‘使拥有住房更易承担，扩大创新融资，简化家庭购买流程，降低交易成本，改变设计的传统方法和修建更便宜的房子以及其他手段’来实现其目标。”[8]这种对福利国家的扩展对许多人来说似乎听起来合情合理。为什么仅仅因为没有存够首付，或不具备良好的信用记录，抑或是没有工作，人们就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

为什么不通过“创新融资”让住房拥有“更容易承担”？像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这样的政府机构和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这样的“受政府资助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GSE），都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引导租户们成为房屋拥有者。这些措施包括降低首付比率，大幅降低各银行的贷款标准，通过购买和“证券化”更多的抵押贷款，以及许多其他方法来增加进入房市的货币数量。这是一次两党对社会工程的共同努力。布什政府的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了零首付的按揭贷款担保。正如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阿方索·杰克逊（Alphonso Jackson）在2004年所豪言的：“以零首付提供联邦住房管理局抵押贷款将为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尤其是少数族裔，打开拥有房屋的大门。”他补充道：“我们不期望给纳税人造成任何花费。”[9]

美国政府在蓄意和系统性地破坏传统的银行标准，并鼓励——事实上是要求——风险越来越大的贷款。最终结果为好的风险会产生个人利益，而最终结果为坏的风险会落到纳税人头上，因为“面对这些新的宽松要求的银行家，可能把任何有风险的贷款转嫁给受政府资助企业，这些企业负责为数百万美国人提供房屋抵押贷款。”[10]私人化的利润和社会化的亏损是福利国家主义与群带政治（Cronyism）相结合的特征。

随着越来越多的钱涌入房市，房价不断上涨，这像一个派对。每人都感到更加富有，因为他们的房产价格飙升。人们拿出“可调利率抵押贷款”（Adjustable Rate Mortgages，ARMs）来购买比他们过去买得起的更大的房屋，因为他们预计能在利率再次上升之前卖掉它们。信贷很宽松，美国人拿出二次抵押来为假期和游艇买单。在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下，越来越多的房屋被修建出来，其结果是规模庞大的房地产泡沫。人们买房并将其“抛”给下一个买家。与此同时，政府的金融监管机构把实际上高风险的贷款一律评为低风险，包括政府债务（债券）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MBS）。[11]德国银行购买了希腊政府的债务，而美国和世界各地的银行购买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化，人们相信它们是由美国政府担保的。

美国政府的干预主义政策让拥有住房变得更易于承担，扩大了“创新融资”，并破坏了合理的银行习惯，这些政策被与全球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傲慢相结合，监管者们无疑知道风险的实际大小——而市场参与者们拿自己的资产冒风险却被蒙在鼓里。结果是，全球金融体系被高风险贷款、坏账和有毒资产所败坏，并且造成灾难性后果。抵押贷款违约率随着利率上升，此外各机构都被鼓励购买“低风险”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结果它们并不那么低风险。储蓄被消灭了，房主们发现自己无力支付抵押贷款，各个金融机构倒地并起火，经济产出下降。数目众多的激励扭曲是罪魁祸首，对住房和金融市场的整个干预体系造成了这些扭曲，但离开“使住房更易于承担”和“创新融资”的美国福利国家政策，金融危机就不会发生。全球金融列车失事是一个又一个糟糕政策叠加的结果；它是一起由福利国家引发的列车失事。[12]

欧债危机与福利国家

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在疯狂地为一个巨大的房产泡沫打气的同时，在退休金、医疗护理和其他一些福利国家项目上开支剧增，使得全球各国政府陷入了债务危机。许多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政府债务的大幅增长之上，而这种增长也确实已经令人咋舌。与此同时，当与累积如山的无准备金负债——已经对公民们做出、而他们也依赖的承诺——相比之时，这都还算小数目，因为根本没有相应的融资。如果一家私营公司就其义务大小误导了公众和它的负责人，就像政府在系统性地做的那样，该公司的领导们会因欺诈而锒铛入狱。各国政府都在设法从健全的会计实践中豁免自己，并且蓄意而系统性地就他们转嫁到未来纳税人

肩上的债务误导公众。政府发现在今天许诺未来付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未来到来的速度却是非常之快。

经济学家贾戈迪许·戈卡勒（Jagadeesh Gokhale）和肯特·斯迈特斯（Kent Smetters）在2006年（相当保守地）预计了美国政府到2012年联邦总预算的失衡情况，结果为80万亿美元左右。该预算失衡被定义为“政府根据现行法律在所有支出类别——津贴、国防、道路及其他——的预算和预计在各个收入账目的所有税收之间差额的当前估值。”[13]目前戈卡勒正在更新数据，他预计数字将会更高。正如戈卡勒所写：“增加可能的医疗保险成本的上升与新医保法有关，这个数字也许过于乐观，但要到我的项目接近完成时我们才会知道。对欧洲来说，和2010年一样，我估计有53.1万亿欧元的总体失衡。也就是说，是27个欧盟国家12.2万亿欧元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434%。这也是一次低估，因为我们的预测仅做到2050年（不像在美国，预测会一直延续下去）。”[14]

这意味着，那些承诺无法被兑现，也不会被兑现。即使只为目前承诺的一小部分买单，税负也将会上升到天文数字的水平。政府很可能不仅会拖欠公认的债务（债权人持有的债券），还会否认对公民承诺的养老金、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各种利益。就其财政，他们已经欺骗他们的公民很多年。当承诺因为它们无法被兑现而破灭之时，就像我们看到希腊正在我们眼前所展现的那样，他们就精心编制各种谎言。否认他们的承诺的方法之一是开动印钞机，用成堆的纸币伴着每张钞票上增加的越来越多的零来支付他们的承诺，也就是说，承诺兑现而货币将会大幅贬值（作为一种应对债务的手段，通货膨胀是尤其有害的，因为它扭曲了行为，并不成比例地落在穷人和那些无法从中保护自己的人身上）。我们所知的福利国家可能正在一些国家逐步瓦解，而在另一些国家中迅速崩溃，但它们最终都会破灭，并且绝大部分重担将落在那些缺乏用政治

关系和圆滑老练的手段来避免承担后果的人身上。

许多人通过援引他们的意图来愤怒地对这些事实做出回应，忽视了这些后果。他们说：“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大家；我们并非在有意地旨在通过对市场的干预使住房更易于承担，并降低银行标准来摧毁世界金融体系，我们也没有打算让自己的国家破产！”正如哲学家丹尼尔·夏皮罗（Daniel Shapiro）相当贴切地指出：“制度不能由它们的目标来充分体现。”[15]世界上最好的目标，如果通过错误的制度与不良的激励相结合，可以产生可怕的后果。[16]福利国家拥护者们的意图是与其政策的结果无关的。[17]正如普遍实行的那样，大多数“政治哲学”是关于比较一个直觉和另一个直觉的对与错。坦率地说，这对于建构可持续运转、正义的制度不是非常有帮助。为此，我们需要的远不止简单的意图比较；我们需要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而不是脱离实践的单一道德理论。

未来受到威胁，但并没有失去

当今的福利国家要直接为影响全世界的两大经济危机负责：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使得许多国家的经济转为负增长，并消灭掉数万亿美元资产估值，而债务危机已经震撼了欧洲，并威胁到某些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货币和金融系统。当通过错误的激励和制度来实施的时候，即使是最好的意图都可以产生可怕的后果。

然而，这个故事不全是悲观和沮丧。我们可以从福利国家和它那压倒性的债务、羞辱性的官僚机构及相互掠夺之下脱身。这绝不会容易实现，它意味着要迸发出勇气，站出来去面对那些特殊利益团体和老于世故的政客。不过，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必须做到。那些已经在街头表

现出反对“削减预算”（通常只是削减支出增加的速率）的示威者所表现的是对算术的反对。你不能一直在负数之上加负数来得到正的总和；总数不对。我们需要代表理性，代表财政责任，代表削减国家力量，代表解放和授权人们决定自己的未来而在街头示威。我们需要驳回国家的权力，使其仅限于保护我们的权利，而不要试图去照顾我们。对于国家的能力，我们需要头脑清晰的决策，我们需要福利国家的终结。

注：

[1] “如果一块土地不为任何人所有，尽管法律的形式主义把它叫作公有财产，这块土地之被利用是不会考虑到不利的后果的。能够把这些报酬——森林的木材和猎物、水域的鱼类、地下的铁矿等——据为己有的那些人们，不会顾虑他们利用的方法所引起的后果。对于他们而言，土壤的蚀耗、矿藏的枯竭，以及对于将来利用的其他损害，都是外部成本，不纳入他们的投入产出的计算中。他们砍伐树木，完全不想到新苗的重生。在打猎捕鱼的时候，他们不会避免采用哪些伤害渔猎资源的方法。”（《人的行动》，余晖译——译者注）。Ludwig von Mises，*Human Action*：*A Treatise on Economics*，in 4 vols.，ed.Bettina Bien Greaves（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7）.*Vol.2.Chapter*：*6*：*The Limits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Problems of External Costs and External Economies.* 出自：oll.libertyfund.org/title/1894/110599 on 2012-03-25.

[2] 参见Frédéric Bastiat，*Selected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trans.Seymour Cain，ed.George B.de Huszar，introduction by F.A.Hayek（Irvington-on-Hudson: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1995）.Chapter 5:*The State* 1.

[3] “Social Security trust fund sits in West Virginia file cabinet，”*USA Today*，February 28，2005，www.usatoday.com/news/

washington/2005-02-28-trust-fund_x.htm.

[4] Ayn Rand，*Atlas Shrugged*（New York：Signet，1985），pp.381–382.

[5] 对移民的许多指控实际上并不正确，因为在美国的移民们通常为福利国家支付了比他们得到的好处更多的税，并且通过创办新企业，他们在过去已经极大地促进了其移民地的经济活力和社会繁荣。这些问题在Jason L.Riley，*Let Them In：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New York：Gotham Books，2008），pp.91–125.的第三章中有讨论到。

[6] 福利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也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多项研究已证明这一点，包括Dambisa Moyo，*Dead Aid:Why Aid Is Not Working and How There Is Another Way for Africa*（London:Allen Lane，2009）；Graham Hancock，*Lords of Poverty:The Power，Prestige，and Corrup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id Business*（New York:Atlantic Monthly Press，1989）；以及Michael Maren，*The Road to Hell:The Devastating Effects of Foreign Aid and International Charity*（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7）和许多其他重要作品。对援助的影响的一个开创性研究是P.T.Bauer的*Dissent on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7] 参见David Schmidtz and Robert E.Goodin，*Social Welfare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For and Again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一书中关于责任和国家权力的争论。

[8] 参见Gretchen Morgenson and Joshua Rosner，*Reckless Endangerment:How Outsized Ambition，Greed，and Corruption Led to Economic Armageddon*（New York:Times Books，Henry Holt& Co.，2011），pp.2–3.

[9] 参见Lew Sichelman，“Bush to Offer Zero Down FHA Loan，”*Realty Times*，January 20，2004，http://realtytimes.com/rt-pages/20040120_zerodown.htm.

[10] 参见Gretchen Morgenson and Joshua Rosner，*Reckless Endangerment*，p.38.

[11] “受政府资助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GSE］所证券化的任何抵押贷款都是在巴塞尔协议（政府采取的全球法规）之下的，对美国银行来说发起它们是有利可图的，作为证券的一部分即使是买回来也是有利可图的。”Jeffrey Friedman，“A Crisis of Politics，Not Economics:Complexity，Ignorance，and Policy Failure，”*Critical Review*，Vol.21，Nos.2–3（2009），pp.127–183，p.144.

[12] 欲了解更多有关美联储降低利率的政策、政府背书的抵押贷款“证券化”和把政府债务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评为“低风险”的国际金融监管的结合的细节，参见Johan Norberg，*Financial Fiasco:How America’s Infatuation with Home Ownership and Easy Money Created the Economic Crisis*（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2009）.另见：*Critical Review*，“Special Issue: Causes of the Crisis，”ed.by Jeffrey Friedman，Vol.21，Nos.，2–3（2009），以及Jeffrey Friedman and Wladimir Kraus，*Enginee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Systemic Risk and the Failure of Regulation*（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11）.

[13] 参见Jagadeesh Gokhlae and Kent Smetters，“Do the Markets Care About the $2.4 Trillion U.S.Deficit?”*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Vol.63，No.3，2007.

[14] 和作者于2012年3月26日的私人交流。

[15] Daniel Shapiro，*Is the Welfare State Justifi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5.夏皮罗的书为代表福利国家做出的辩护声明提供了一个公正的比较，并提供了它们表现的证据。

[16] 一个例子是福利国家拥护者詹姆斯·P.斯特巴（James P.Sterba）的主张，他主张蓄意饿死劳动人民是适当的，这可以促使他们生产更多，于是国家才可以没收并再分配其生产劳动的成果。斯特巴认为，福利权是一种“消极权利”，也就是和所有的自由相一致，并在他的直觉的基础上建议，威胁没收劳动人民的“非剩余资源”（即不仅生存必需品之外的剩余要没收，身体生存所需的食物也要没收）来促使劳动者生产更多，以给国家进行再分配。这位哲学教授相

信，以蓄意的饥饿来威胁劳动人民与尊重他们的自由是一致的，因为“我们的生产者可能不予回应。穷人（当然，实际上，国家据称代表穷人的利益做事——帕尔默）于是会挪用生产者的非剩余资源，于是，不生产更多只会让生产者消瘦，因为她不愿意变得更有生产力。”“只会消瘦”是斯特巴对分解性新陈代谢（身体为了生存而分解体内脂肪和肌肉组织的生物过程，仅在不再有任何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供给身体的情况下发生，是营养不良的最严重类型——译者注）、水肿、器官衰竭和饿死的其他一些症状的委婉说法。James P.Sterba，“Equality is compatible with and required by liberty，”in Jan Narveson and James P.Sterba，*Are Liberty and Equality Compatible?:For and Agains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23.关于斯特巴的建议在实践上如何运作的令人心寒的说明，参见Timothy Snyder，*Bloodlands: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New York:Basic Books，2010），以及Frank Dikötter，*Mao’s Great Famine: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1958–1962*（New York:Walker Publishing Co.，2010）.大量关于道德和正义，纯粹基于意图的建议在经济学、社会学或历史学的面前是经不起测试的，通常会导致灾难，并且，至少可以说，在道德上是不负责任的。

[17] 关于福利国家的道德声明有大量的文献，绝大部分始于意图也终于意图。我在我的文章“Saving Rights Theory from Its Friends”中提到了其中一些文献，我的文章初次发表于*Individual Rights Reconsidered*，ed.by Tibor Machan（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2001）。这个版本可以在http://tomgpalmer.com/wp-content/uploads/papers/palmer-individual-rightsreconsidered-chapter2.pdf.下载到。这篇文章在Tom G.Palmer，*Realizing Freedom:Liber-tarian Theory，History，and Practice*（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2009），pp.41–83.中再版。

意大利之梦碎于福利国家

皮埃尔嘉米尤·法拉斯加

集记者、学者于一身的皮埃尔嘉米尤·法拉斯加（Piercamillo Falasca）将向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在20世纪50～60年代，意大利得益于稳健的政策而腾飞，成了经济成功的传奇，但在人口年轻，经济仍在增长，未来似乎还很遥远时肇始的福利国家政策，至今已几乎耗竭了这个国家。法拉斯加是意大利古典自由主义组织自由意大利（Libertiamo.it）的主席，以及意大利智库布鲁诺·列奥尼研究所（Istituto Bruno Leoni）的研究员。

“战后这些年，你们国家在经济、工业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增长着实举世瞩目。这个国家曾几乎毁于一旦，饱受高失业和高通胀之苦，如却今扩大了它的产出与资产，稳定了其成本与货币，以西方世界所无法比拟的速率创造了新的工作和新的实业。”

——约翰·F.肯尼迪总统

官方访问时说些客套的称赞也许是种习惯，但在1963年，意大利总统安东尼奥·塞尼（Antonio Segni）在罗马宴请约翰·肯尼迪的晚宴上，肯尼迪所说的这几句话却是在陈述事实。1946—1962年，意大利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7%，这样辉煌的表现几乎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这1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为5%）。所谓的经济奇迹（Miracolo Economico）将意大利变成了一个现代而富有活力的国家，意大利以在所有部门——从洗衣机和冰箱到精密机械零部件，从食品部门到电影业——都拥有可以与在世界上竞争的企业而自豪。

1956—1965年，西德（10年中增长70%）、法国（58%）和美国（46%）都有显著的工业增长，但在意大利引人注目的表现（102%）前都显得逊色不已。大型企业，比如汽车制造商菲亚特，打字机、打印机和电脑制造商奥利维蒂（Olivetti），以及能源企业埃尼（Eni）和爱迪生（Edison）等。它们与数量庞大的小企业合作，这其中很多企业由家族经营，符合家庭在意大利社会中传统的强势角色。5000万人口中至少有五分之一，从贫困、干燥的南方移居到了富裕、工业化的北方，他们改变了生活方式：购买了汽车和电视机，学会了标准意大利语，送子女上学，攒钱买房和帮助他们仍在老家生活的亲戚。1960年后，由于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经商和工作机会不断增多，意大利人流向欧洲其他国家和美洲的趋势中止，也终结了在1个世纪不到的时间里让几乎2000万离开故土的意大利人的“大离散”（Diaspora）。

意大利经济景气的秘诀是什么？多年之后，一位基督教民主党（Democrazia Cristiana，天主教中的右翼政党）的参议员在一个采访中说：“当时，我们明白，而且当即认识到，我们不能驱动意大利社会。这个国家比政治更强大，甚至比政治更聪明。无为而治是比许多政府举措更好的选择。”参议员皮埃罗·巴塞蒂（Piero Bassetti）所说的“我们”是指谁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几年，一群自由市场导向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在政府中取得了要职，扫清了法西斯主义立法，并制定了民主政策和自由市场改革。反法西斯记者、经济学家路易吉·伊诺第（Luigi Einaudi）是其中一位核心人物。他是意大利古典自由主义者中最突出的一位，他于战后回到意大利，担任中央银行行长，然后是财政部长，最后成为共和国的总统。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总理阿尔契德·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eri，1945—1953）和德·加斯贝利去世后的继任者朱

塞佩·佩拉（Giuseppe Pella）等人所推行的经济政策。

在这些人中，有些人可能在意大利以外并不出名，但他们代表了欧洲政治文化中独特的“例外”。经受了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20年的统治以及战争的恐怖，那群古典自由主义者代表了这个民族从其极权主义的过去崛起成为民主资本主义自由国家的唯一希望。他们开展活动的背景是极不容易的。意大利是被法西斯集体主义和战争所摧毁的穷国；大部分人既没有工作也没受过教育；基础设施缺乏或者十分薄弱；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威胁用共产集体主义替代法西斯集体主义；而且，国家控制的企业主导了经济的很大部分。

路易吉·伊诺第的影响至关重要。审慎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压制了至少20年（1959年，《金融时报》赞扬里拉是西方最稳定的货币）；自由贸易协议帮助意大利重新进入国际市场；财政改革（瓦诺伊法案，以设计该法案的大臣命名）缩减了税率，简化了税收体系。在一个以凯恩斯主义思想和宽松开支政策为主导的时代，意大利的公共开支却相对得到控制：1960年公共开支才差不多达到1937年的水平（GDP的30%，很大份额是固定资本投资），而其他欧洲国家的开支已经急剧上升。

少数学者，如著名的法学家布鲁诺·列奥尼（Bruno Leoni）曾警告人们如果忘记他们新得到的繁荣的原因，会有哪些危险。不断提升的繁荣似乎是新设政府开支和干预的完美时机。早在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政府就建立了正午银行（Cassa del Mezzogiorno，类似于罗斯福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但设立在贫困的意大利南部）。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政府通过了旨在再分配财富、扩张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如国有化电力供应）以及建立更为强大的福利国家的法案。

在相对繁荣的意大利，再分配运动取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1962

年，工会在冶金工人劳动合同的重要谈判中要求缩短劳动时间，增加假期以及工厂有更多的权力去组织工会活动。意大利社会党（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与基督教民主党一道加入了执政联盟，组建了第一个“中左政府”。1963年，政府通过土地国有化进行的一项公共住房计划，这激起了企业家联合会和私人所有者（其中包括天主教会）的强烈反对。这让基督教民主党决意抛弃这个理念，但这样的集体主义大政方针主导了20世纪60年代余下的几年以及整个20世纪70年代。

那个时期采纳了数个重要的公共政策为意大利当前的危机埋下了伏笔。第一，由于1966年宪法法庭的裁决宽松地解释了宪法上平衡预算的制约，因而放松了财政纪律；宪法的约束被悬置起来，这让议会得以通过法律，可以不通过财政收入（税收），而以发行国债来支付每年的政府开支。这道裁决为公共预算逐年扩张撕开了一道口子。路易吉·伊诺第于1961年去世，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他对财政纪律的呼吁。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基本赤字”（Primary Deficit，即总预算赤字扣除利息支付）还几乎为零，它在宪法法院的裁决之后迅速攀升，并在1972年当赤字开支成了系统性的政策策略以后加速；1975年，基本赤字达到了GDP的7.8%这一危险数值。

第二，1969年引入了慷慨的退休金体系（布罗多利尼法案）。先前以缴纳金额为依据的机制被一个再分配的体系所取代。据此，退休人员取得的养老金，并不根据他们工作的那些年间被收走的强制储蓄总量而定，而仅仅参照他们先前的工资。意大利政府建立起了面向每个公民的“社会养老金”，以及养老金的工龄标准。这就使工人可以早早退休，而且在意大利南部，残疾补助金采用了松散的发放规则，人们认为这可以取代更为有效的鼓励经济增长的政策。几乎没人注意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毕竟，未来的选民在今天并不投票。

第三，在1970年通过的《工人法案》变本加厉地管制劳动市场。其中第18条规定，如果法庭发现一家雇用15名以上长期固定合同雇员的企业解雇某个员工是不公平的，那么这个员工有权恢复原职。提供证据之责任完全落在了雇主头上。这个法律不仅使解雇员工要付出很大代价，而且同时使雇用员工非常昂贵。这两者削减了工作的流动性，滋长了非法工作。

第四，通过1968—1978年间连续的几道法令，建立了国有化的医疗体系，经费几乎完全来源于税收。这意味着并没有多少激励让消费者节约使用医疗服务。

第五，1970年1月，政府为工程和冶金部门的所有雇员推行了强制规定，大大管制和限制了工作时间。

这样那样的政策，其长期的负面效应因为意大利仍旧强劲的增长，以及较低的人口平均年龄而在短期内没有显现出来。数量庞大的青年工作者支付了为少数退休人员提供的慷慨的养老金和医疗开支。年复一年，这些政策伴随着政府不断强化对劳动和服务市场的管制，降低了生产率，使劳动市场趋于僵化，雇佣成本急剧上升，而且还推动公共开支不断上升，国家债务不断累积。国债反过来又吸收了私人储蓄中越来越多的份额。

时过境迁，老龄化的人口降低了工作人口和退休人口的比率，使养老金以及医疗体系日趋艰难，越发难以为继。20世纪60—70年代，欧洲所有国家都扩大了公共开支，但意大利几乎是失去了控制，丧失了其20世纪50年代以来财政负责国家的形象。公共开支从1970年GDP的32.7%上升到1993年的56.3%。意大利政府推行的一项鲁莽的政策——雇用更多的公务员来补偿短缺的私人就业，尤其在南部（当然，该工作短缺很

大程度上与强加在私人部门身上的极端雇佣成本有关）——更是为此火上浇油。20世纪50～60年代，公共债务平均稳定在GDP的30%左右，而1994年这一数字达到了惊人的121.8%。

意大利奇迹就此终结。平均GDP增长率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3.2%，但在20世纪80年代就降到了2.2%。得益于里拉的不断贬值，意大利企业苟且能暂时维持他们的国际竞争力（1987年贝蒂诺·克拉克西总理宣布意大利GDP超过英国），但高通胀和高公债显然危害到了未来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政府推行了各种改革的尝试，尤其是1992—1993年的财务和政治危机之后。这两年里，意大利几乎有主权债务违约的危险，战后的政治体系也被腐败的指控所横扫。国有实业的一些私有化帮助政府将公债降低到略微安全的水平。养老金体系做作微小的变动。另外，1997年意大利议会通过立法节制劳动法规，但废除第18条的规定（有关被解雇雇员复职权利的条款）面临巨大的政治阻碍，致使意大利建立了麻烦的双规市场，既包括高度管制和僵化的旧式合同，也包括灵活的新固定期限合同。

这些改革为这台耗竭的引擎提供了些许燃料，暂时延迟了它的停工。不过，正常运转已是去日之事了。

意大利依然还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意大利的政治体系如同一位没落的贵族，发现自己无法适应其新的处境。意大利福利国家和对劳动市场的福利主义干预，其最深层次的结果，既非经济也非政治上的，而是文化上的。让即使近年来意大利面临新的债务危机时改革仍然步履维艰的，是福利国家成瘾的文化。

当代意大利人似乎并不乐意像他们父母和祖父母那样，挽起袖子大

干一场，在自由和竞争的经济中生产财富，不乐意放弃负担不起的福利国家补助来换取更大的自由、收入和繁荣。意大利能否回归到伊诺第的古典自由主义训示，能否重建其经济增长以及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正如历史长河中常常发生的那般，意大利发生的事情可以为整个世界树立起一个范例，是好是坏，让我们拭目以待。

希腊福利国家：前车之鉴

阿瑞斯蒂德·哈齐兹

很少有现代民主国家经历过希腊那样惊人的制度性失败。在纷扰的20世纪，希腊经济曾经有过数十年的财富积累期，直到希腊各党用基于民粹主义与官商勾结的福利国家主义取而代之。在本文中，法学与经济学学者阿瑞斯蒂德·哈齐兹（Aristides Hatzis）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国家主义政策及其对短期政治利益的追逐，是如何造成了国家的腐败、负债和政治破产。哈齐兹是雅典大学研究法哲学与制度理论的教授。他在希腊危机网（GreekCrisis.net）上写文章专门讲述希腊的危机。

现代希腊已经成了经济和政治破产的代名词。希腊的制度性失败几乎是一场考验制度优劣的完美试验。想从一国身上找到如此之多的，教科书级的制度缺陷、僵化和畸形，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希腊政府做到了。希腊的案例也因此成为其他国家的前车之鉴。

曾几何时，希腊或多或少被大家看作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甚至可以说希腊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是个罕见的成功典范。在长达半个世纪里（1929—1980年），希腊保持了高达5.2%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知道，同期的日本增长率不过4.9%。

如果考虑到在此期间希腊的特殊政治格局，那么这样的增长数字就显得更为惊人了。1929—1936年，希腊政局风起云涌，充斥着各种政变、激烈的政治斗争、短命的独夫政治，并在同化150多万小亚细亚难民的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困难（难民数接近当时希腊人口的三分之一）。

1936—1940年，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希腊被右翼独裁政权统治。1940—1944年，希腊又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创，是伤亡人数占国家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希腊发生了共产主义革命，并随即陷入了一场惨烈的内战（分为1944年和1946—1949年两个阶段）。1949—1967年，希腊是典型的家长式的、缺乏自由与法治的民主政体。1967年4月21日，军阀接管政权并统治希腊，直到1974年7月倒台。之后，希腊才成为宪政自由民主政体。即便如此，饱受战争、暴乱、独裁、政治动乱的希腊，还是成功地保持了经济的增长。

在希腊拥抱宪政民主7年之后，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当时的9个成员国向希腊伸出了橄榄枝。希腊成为欧共体大家庭的第十名成员，其加入的时间要早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希腊为何加入欧共体？这一决定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量的结果。但假如希腊没有在过去几十年里克服种种阻碍，保持经济增长，那么希腊入盟也是不可能发生的。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时，希腊的公共债务占GDP的28%；预算赤字低于GDP的3%；失业率大约在2%～3%之间。

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

1981年1月1日，希腊正式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10个月后（1981年10月18日），安德烈亚斯·乔治乌·帕潘德里欧率领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PASOK）凭借激进的民粹纲领上台了。该党的纲领包括退出欧洲经济共同体；当然，没有人愚蠢到践行这一承诺。在泛希腊社会运动党执政期间，希腊仍然保留了共同体的成员资格，但希腊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却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希腊今日的危机，是泛希腊社会运动党短视的政策带来的恶果。这

种政策失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①泛希腊社会运动党执行了毁灭性的经济政策：他们一手创建了不断膨胀且低效的福利国家，并对私人领域进行了令人窒息的干预和管制。

②从长远来看，泛希腊社会运动党给希腊政治带来的影响更具破坏性。其政治成功导致希腊保守党派（“新民主党”）转型成了山寨版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1981—2009年，两党都开始推行民粹主义、裙带主义、国家主义、保护主义和家长政治的纲领，并将这一趋势保持至今。

结果，今日的希腊政治，集中体现在两党争相向选民许诺特权，鼓吹民粹福利主义，并推行掠夺性的国家主义政策。

增长的动力何在？

财富通过自发的合作和交易产生。自发的交易并非零和博弈——一人之得必然来自另一人之失。自发的交易是正和博弈，通过交易创造的额外价值被交易双方共同享有。强制的交易却往往是负和博弈，交易一方的损失要远大于另一方获得的利益。假如小巷里的劫匪用刀捅了你，并从你身上抢走了40欧元，那么你付出的医药费和痛苦要远大于40欧元。试图转移财富的政治企图也同样给各方带来资源的浪费——为了掠夺他人而避免自己被掠夺而浪费的资源，往往要比再分配的资源的价值高得多。

财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这些都是繁荣的代名词。繁荣与自发产生的交易数量紧密相关。在这种经济体系中，政府的角色是保护个人权利，因为权利正是自发交易发生的基础。此外，政府需要允许人民

创造财富。政府的职责包括保护财产权和监督合同执行，以便促进市场规范化，而这正是英语“regulate”[1]一词原始的含义。在某些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需要谨慎地进行干预，但是这些干预行为不能够扭曲市场信号，否则只会带来比市场失灵更糟糕的政府失灵。

大多数当代政府则肩负起了另一种更大胆、也更危险的职责——不是通过制定清晰的规则来“规范”市场，而是肆意干预市场；没有促进市场交易，而是横加阻挠；没有保护双赢的、能够增加财富的交易，而是通过财政补贴和政府开支将双赢交易变成双输。绝大多数的政客相信只要花钱就能促进财富增长；如果花了钱而财富并没有增长，那只能说明花钱还不够多。失去控制的政府开支导致了希腊今日的危机，然而问题却并非希腊特有。类似的开支无度也带来了美国历史上头一次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以及欧洲当下的主权债务危机。

政府开支对政客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因为从短期来看，这些开支能够为他们买到选票；毕竟，从长期来看，我们都难逃一死——至少难逃从公职上退休的那天。政府开支也讨选民喜欢，因为他们会将政府的福利视作免费的午餐。选民看不到的，是这些开支并非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他们自身——至少来自其他人的钱包。

似乎从1974年起，希腊政客就对经济现实进行了选择性遗忘。在军阀独裁时代结束之后，即使是保守派政府也对银行和企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革，对特殊关系企业进行补贴，并扩充了福利机构的权柄。即使如此，这一届政府的所作所为比起1980年上台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1981年之后，国家干预色彩加重，政府管制和裙带主义成了主流。这种主义的统治一直延续到2009年，中间只有两次改革的尝试：一次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时革新派保守党的改革尝试纷纷碰壁，2002年的改革则更加成功。当时希腊即将加入欧元区，而改革的

主力是革新派社会党人。然后，现在我们知道，当年吸引眼球的经济数据其实是捏造而来，而结构性改革屈指可数。

考虑到雅典可能是全球“逃税之都”的事实，希腊政府是如何支持这样大规模的开支的呢？我们知道，希腊的逃税现象非常普遍，而税务系统又长期低效率运行，这使得政府收入颇受束缚。在税收之外，希腊公共支出主要来源于欧盟的援助以及政府借贷。《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精辟地总结到：“希腊自从1981年加入欧盟之后，逐渐演变成又一个中东石油国。只不过，希腊的资金并非来自于油井，而是来自于布鲁塞尔。补贴、援助和低利率的欧元源源不断地从布鲁塞尔流向雅典。”

自2002年希腊加入欧元区以来，这种政府借贷的成本骤降，来源性也变得广泛。由于债券市场不再担心希腊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希腊大额的经常收支赤字得到外资平衡，并得以享受了一段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然后，这样做的后果是希腊承担了3500亿欧元的公共债务（一半来自国外银行）。更令人担心的是另一种鲜为人知的负面效应：

来自欧盟的援助和外国银行的贷款被直接用于消费，而非储蓄、投资，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化或者制度发展。

凭借着其他国家的援助，希腊的“派对”狂欢了30年。我必须承认，希腊人确实乐在其中。到2008年，希腊人均收入增加到31700欧元，在全世界排名第25，高于意大利和西班牙，大约是欧盟国家平均值的95%。私人消费要比欧盟国家平均值高出12%，这使得希腊成为世界上人类发展和生活质量指数排名第22的国家。如果这些已经足够耀眼，那我还要告诉你，这些数字都被大大低估了，因为希腊的地下经济大约要占到全国GDP的25%～30%。

未纳入统计的收入主要和逃税有关。2010年，有40%的希腊人并不纳税，而已经申报的税收中，95%要少于30000欧元。如此普遍的逃税行为给国家预算带来了每年200～300亿欧元的缺口，而这个数字至少占到2009年财政赤字的三分之二。

无论是从道德还是经济上来说，希腊都已经陷入了腐败的泥沼。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臭名昭著的“雅典游泳池”。在希腊，游泳池是财富的象征，因此希腊的税务部门将私人游泳池用于调查潜在的逃税行为。2009年，仅有364户希腊人声称自己家里有游泳池。然而卫星影像显示，仅雅典的私人游泳池数量就高达16974个。也就是说，仅有2.1%的游泳池所有者在诚实地报税。在逃税如此家常便饭的希腊，我们奇怪的并非97.9%的人要撒谎，而是为什么那2.1%的人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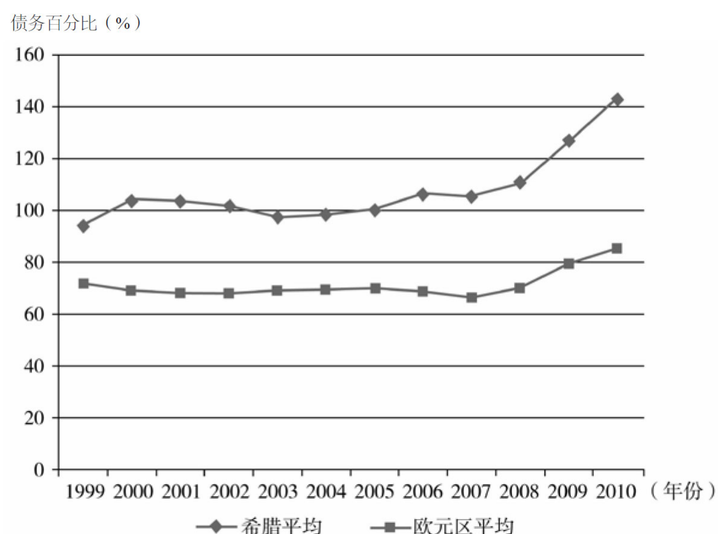


图1-1　希腊债务与欧元区债务平均水平的比较

来源：Eurostat.

说谎成了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你完全可以说用撒谎来保护自己创造的财富不被掠夺是情有可原的。问题是，希腊的财富不是创

造的，而是借来的。1980年，希腊的公共债务仅占GDP的28%；1990年，这一比例达到了89%，到2010年升至140%。预算赤字从1980年的3%增长到2010年的15%。财政支出在1980年占GDP的29%；30年之后（2009年），这一比例增长到53.1%。这些数字一直被希腊政府隐瞒。直到2010年，希腊政府才承认当初并未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真相是当时的希腊政府雇用了高盛等华尔街的公司以帮助自己伪造数据，借以欺骗欧元区的决策人士。

希腊当下的惨状乃是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①希腊福利国家的普遍低效和腐败；

②福利主义干预政策带给自愿经济交换的繁重负担。

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希腊就总体营商容易程度而言，在全球183个经济体中排名第100位。在所有欧盟和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国家中，希腊不出意外地排名倒数第一。作为过去30年的欧盟成员国，过去10年的欧元区成员国和全球最富有的25个地区，希腊名列哥伦比亚、卢旺达、越南、赞比亚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之后。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说："要把一个国家搞得这么糟糕也很不容易。"希腊政府的政策对自由企业和私人财产都十分不友好，对于劳工和资本的流动性加以严重的阻挠，而这一切都被冠以"社会稳定"和"公平"之名。

表1-1　在183个国家里，希腊在营商方面的指标排名

领域	排名
*营商容易程度	109
创办企业	140
处理建筑许可证	50
雇佣工人	147
申报财产	107
获得信贷	87
保护投资者	154
纳税	76
跨境贸易	80
保障合同执行	89
关闭企业	43

*总体经商容易程度基于10个方面

来源：世界银行，2010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2010年，想在希腊创办企业平均需要花费15天，耗费1101欧元，而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平均只需8天和417欧元。在希腊，每年申报所得税需要耗费224小时；而在欧盟最富裕的国家卢森堡则只需59小时。希腊在保护投资者程度的排名中十分凄惨——在183个国家中排名第154位。希腊在各项排名中最靠前的一项是关闭企业的便利度，排在全球第43位。

在希腊，几乎所有行业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被高度管制并卡特尔化。这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并阻碍了财富的创造。此外，希腊官僚组织惊人地低效，却耗费了希腊GDP的7%，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

奉行干涉主义的官僚机构更容易滋生腐败。根据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报告，2009年规模较小的腐败行为约浪费了希腊8亿欧元（10.8亿美元），比2008年增加3900万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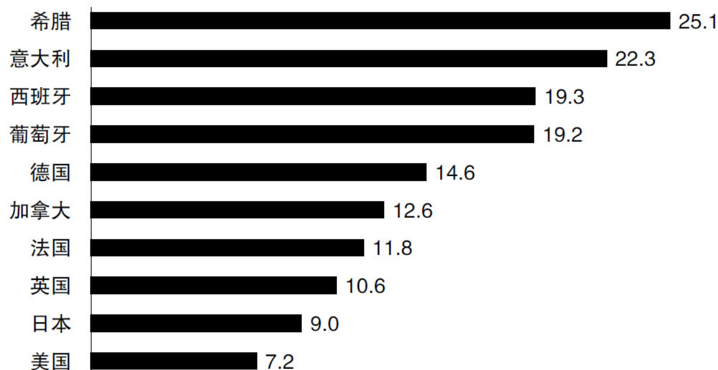


图1-2　地下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2007年）

不出所料，希腊是27个欧盟成员国中经济竞争力最弱的一国。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的2010—2011年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ompetitive Index），希腊排名第83位，水平不及越南、约旦、伊朗、哈萨克斯坦、纳米比亚、博茨瓦纳和卢旺达。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发表的《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希腊在141个国家中外商直接投资排名第119位。在创业艰难、官僚成本高且腐败泛滥的商业环境下，50%以上的希腊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也就不足为奇了。

希腊膨胀的福利系统使很多人坚信福利是一种“社会权利”。选民们习惯了国家给予的诸多“权利”，而日益老龄化的人口又被允诺了大量医疗与退休福利。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任何政客或政党而言，如果对相关福利进行大幅削减，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

希腊的一批无法维持的“权利”，是这个把什么享受都当成“权利”的时代的绝佳范例。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投入达到了人均10600欧元，而税收却仅为人均8300欧元。仅这一来一回就造成了人均2300欧元的赤字！

不到一半的人在工作 47%

超过三成的人在失业 36%

四分之一的人在偷税漏税 25%

接近一半的财政支出在发福利 42%

图1-3　希腊的悲剧：希腊经济危机一览

与此同时，公共部门的工资实际从1996—2009年增长了44%。部分部门的工资甚至增长了86%。雇员们每年领取相当于14个月的工资，包括额外两个月的工资作为奖金——圣诞节会发放一个月工资作为奖金，复活节假期以及夏日假期之前分别发放半个月工资。同期，退休金水平同样大幅上涨。

在公共部门里，工龄达35年的希腊男性有权在58岁时退休，并领取大量退休金。女性则可以更早退休；如果一位女性有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她可以在50岁时退休。希腊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1岁，而德国则为67岁。到2030年，希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能会从2005年的18%增加至25%。

有人可能会认为，尽管福利制度的开支较高（1996年开支占GDP为19%，而2009年则占29%），至少它为公民提供了一定的安全感并限制了不平等。但希腊并非如此！即便福利制度“免费”提供了医疗和教育服务，希腊家庭仍然要为总医疗的45%掏腰包（主要用于贿赂医生、护士和公务员以促使其履行职责）。每年，许多（2.5%）希腊家庭会因高额医疗支出而破产。教育服务的情况同样如此。即使教育服务在名义上是在各方面都“免费”的，希腊家庭为孩子教育的额外支出（私人家教）还是高于任何欧盟成员国。

希腊的漫长派对即将结束。随着借债狂欢的过去，宿醉将随之开始。希腊是该清醒的时候了，而非再次坠入债山压身的谷底。希腊人应该惩罚任人唯亲与腐败行为，并重新赋予市场以活力。人们应当有通过商品交换而创造财富的自由。希腊的盗贼式统治应当被法治取代。为不幸的穷人设置的安全网，不应成为权力阶层和富有者浪费福利的借口。正是后者的铺张使穷人和无权力者情况艰难。

希腊给我们的教训是：经济发展与繁荣并非来自政府借贷与开支。繁荣源自市场，繁荣源自自愿交换，繁荣源自储蓄、投资、工作、生产、创造和贸易。政府在创建法治、安保和保护自愿交换的法律机构方面意义重大，但希腊政府却忽略了这些重要的责任，反而滋养了庞大的官僚机构、无法维持的“权利”以及盗窃、腐败、特权、欺诈横生的体制。

希腊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其面对的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但只要对症下药，希腊总会好起来。

注：

[1] 英语中该词既可表示“管制”，亦可表示“规范”。——译者注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Section 2　福利国家的历史以及它取代了什么

THE HISTORY OF THE WELFARE STATE AND WHAT IT DISPLACED

> 我控诉这届美国政府是我们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最会花钱的政府。这届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办公室，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但却没能预见到人民的真切需求和被削减的购买力。这届美国政府以纳税人为代价，维持着各种办公室和官僚，各种委员会和委员。
>
> ——富兰克林·罗斯福

俾斯麦的遗产

汤姆·戈·帕尔默

理解福利国家的起源有助于我们理解其运作及影响。本文将概述福利国家的起源，揭示福利国家这种政治体系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持其创造者的权力而设计的。从德意志帝国引入强制保险制度到欧洲和美国的当代福利体系，本文追溯了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那些福利国家对先于它们就存在的自愿福利制度不屑一顾。福利国家所弃置一旁的这些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没有福利国家的情况下可能有的图景——由自我管理、自我尊重、独立而且繁盛的人民所组成的社会。

福利国家可以与社会主义国家相区别。在数十年的用语中，社会主义一词，至少有指对计划经济的尝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央计划”）；通常情况下，它要求生产手段完全的国有制。这两种含义，无论哪一种，都意味着有意识地尝试使用国家计划来配置资本和劳动，并将其用到相互竞争中去。比如，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会尝试计划和指挥纸张、车辆、食品、医药、服装和其他商品的生产。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尝试有若干例子，其中包括苏联和它所保护的国家，如古巴，以及部分转型、允许私有财产和市场运作的中国。与此不同的是，福利国家并不需要国家拥有所有生产资料，但是在某些行业里存在着显著的国有制，这主要是和某些服务有关，比如教育、医疗、娱乐乃至住房——所有这些都与“福利”有关。

一个福利国家并不需要管理所有生产活动，但它的确承诺对人民的

福利或者幸福负责。福利国家的活动范围比有限政府更广，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者提出，有限政府仅提供司法、对抗侵害的防卫、法治，也许再加上有限的“公共财货”。古典自由主义国家将自己的职能限定为创建和平的条件，让民众自由追求他们自己的幸福（福利）。与此相反，福利国家把为民众谋取福利作为己任，而不仅仅是为他们提供追求各自幸福的条件；相应地，福利国家倾向于主导乃至垄断退休保障、医疗保险、教育以及收入保障的供应，并组织大规模的转移支付。通常，进行收入转移的理由是将“富人”的钱给予“穷人”，但最典型的情况是在“富人”之间翻来覆去地“捣腾”，进行大量的转移支付。[1]

福利国家并非完全（甚至并非主要）将资源转移给穷人。在很多方面，穷人是福利国家的牺牲品，坐收渔翁之利的是那些更善于操纵这个体系的人（向穷人发放“食品券”和其他食品补贴的福利国家，同时也会通过诸如农业补贴、限制廉价进口食品以及规定最低食品价格的手段提高食品的价格）。福利国家取得政治稳定性的手段，是在社会各个阶层：从最富裕到最贫困的人群中形成大量选民。福利国家主要关注的不是向下“再分配”收入，因为很多的财富再分配都以相反的方向进行，即从穷人转移至富人。在较富裕的社会中，大部分的收入再分配是在中产阶级内部“捣腾”，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外一个口袋，并减去由官僚制度、拉选票和裙带关系所产生的行政费用和无效率的费用。[2]

福利国家的起源

现代形式的福利国家起源于19世纪晚期的德国。它是德国政治家奥托·冯·俾斯麦的政治手腕和“国家建构”的成果。这位“铁血宰相”曾在军事上击败法国和奥地利，在“铁与血”的基础上将其他德意志国家统一成

为“第二帝国”。

俾斯麦对德国支持自由贸易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发动了漫长的政治战争。古典自由主义者赞同的是用和平手段建立一个繁荣的国家，同时也希望德国与邻为善，而不是依靠战争、殖民和军国主义。福利国家作为俾斯麦的中欧国家建构计划的一部分，是这位“铁血宰相”的首创，从此，这种体系便占据了全球政治空间的很大范围。俾斯麦通过19世纪80年代推行的一系列强制意外、健康、残疾及老年保险计划，在德国引入了福利国家体系。俾斯麦称自己的举措为“国家社会主义”。1882年，俾斯麦声称：“为了我国的福祉，我们已经采用的许多举措属于社会主义，不过国家还将要更进一步地习惯社会主义。”[3]

历史学家A.J.P.泰勒（A.J.P.Taylor）对此的解释是：“俾斯麦想让工人更依赖国家，因此也就更依赖他本人。”[4]福利国家首先是一种政治策略，用于建立一个依赖于国家、受民族集体主义意识形态鼓动的人群。

俾斯麦承认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制造一个强大的德国统治欧洲所需要的民众的依赖性，也就是忠诚：

年老之后有一笔养老金可以拿的人，比没有养老金的人要高兴得多，对付起来也容易得多。这个道理看一看私仆和总理府或者法院的公仆便可以知道。后者的容忍力要好得多，因为他还可以指望拿养老金。[5]

如果有70万个每年向国家领取年金的人，我想这会是一大好处，尤其是如果这些人属于本来在骚乱中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并且错误地相信他们可以从中发财的那些阶级。[6]

泰勒推断道：“社会保障无疑减少了民众在各方面的独立性；不过，

即便是民众中最独立、最狂热的传道者也会犹豫是否要废除这个由俾斯麦发明，并被所有其他民主国家复制的体系。”[7]确实，福利国家减少了民众“在各方面的独立性”，也就是说，在各方面更具依赖性。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能够、应该而且必须鼓起勇气废除“俾斯麦发明的这个体系”的关节点上，因为世界上的福利国家都已经扩张过度了。

魏玛共和国曾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福利国家，但在20世纪30年代，其过度扩张的福利体系开始崩溃，[8]并催生了独裁、战争以及从未见过的最具掠夺性、最邪恶的福利国家——第三帝国。正如历史学家哥茨·阿里（Götz Aly）在《希特勒的受益者：掠夺、种族战争和纳粹福利国家》一书中所说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纳粹党，

宣传的是德国人民的两个古老的梦想：民族和阶级统一。这是纳粹受大众欢迎的关键，他们从中取得了追求其罪恶目标所需的权力。人民国家（Volkstaat）的理想——民有和民享的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有特定种族谱系的德国人建立的福利国家。希特勒在他一次重要发言中承诺：“建立一个社会公平的国家”，一个将会“继续根除一切（社会）障碍”的典范社会。[9]

阿里继续说道：“他们（第三帝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史无前例的方式，为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创造了先决条件。”[10]阿里详细地记录了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即这个福利国家在德国民众中建立起的如此全面的救济、依赖和忠诚的体系，是通过剥夺犹太人的财富（从他们的钱财、企业和住房到他们镶的假牙、儿童的玩具，乃至他们的头发）和没收敌人的资产来获取资金，以及通过征用和故意膨胀占有国的通货来洗劫欧洲其他国家。这同样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计划，需要越来越大的人口基数把钱财支付给它，将掠夺来的战利品运送到上层。与所有金字塔型计划

一样，第三帝国注定要失败。

国家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有破坏性、最邪恶的，但它与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那些“毒性”较小的福利国家联系非常紧密，这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所有福利国家都从反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有限政府和个人自由原则开始，它们故意引起公民的依赖，以此创建针对公民的各种政治控制体系。通常，这些体系拥有某些被集体认同和集体目的的学说作为理由。

在18世纪和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消灭了奴隶制和农奴制，将犹太人和其他少数宗教人群从二等公民的地位解放出来，争取了宗教自由，解放了商业贸易、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带来的是人类历史上大众生活水平最惊人的提高。这种变迁产生了在文化和政治上反对自由主义的冲击力，这些人渴望旧日的那种和谐与团结，在这些想象之中，公共的爱压倒了“私心”；自由主义的成功引发了反动的回应。后来与卡尔·马克思合作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撰写一篇对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批判性文章时，正是谴责自由主义促进和平，通过贸易自由实现公共利益：

你实现了各国人民的友善——但这友善是贼人之间的友善。你减少了战争的数量——就是为了在和平时期赚取更大的利益，让个人之间的敌意大到最强，从而打起下流的竞争战！你什么时候“出于纯粹人性”做事，意识到将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对立起来的无益？你的道德何时曾没有受到利益诱导，你何时曾将不道德、利己的动机抛诸脑后？

自由经济体系通过化解民族性，极力将敌意普遍化，将人类变成一群贪婪的禽兽（竞争者不是禽兽又是什么），仅仅因为每个人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利益而相互吞食。[11]

此外，恩格斯和其他作者也提起旧时对于有息贷款的非理性仇视。

这种古老的怨恨掺杂着反自由主义和反犹主义：

有息放贷——没有劳动，仅仅放一笔贷款就获得收益——的非道德性实在太明显了，这在私有财产中已有暗示，而且一直以来，没有偏见的大众意识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这种问题上，大众往往是正确的。[12]

自由市场将经济与社会关系放在了动态的、不断流动的环境下，这让精英阶层的批评家大为光火，因为他们希望经济关系稳定、持续，并具有道德正确性：

竞争的条件造成价格恒久波动，并完全剥夺了贸易活动最后残存的那点道德……在这个漩涡中，还有什么可能存在以道德为基础的交易？在这个不断涨跌的市场，每个人都必须努力找到最有利的买卖时机；每个人都必然成为投机者——也就是必然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获；必然为了使自己富裕而损害他人，必然算计他人的不幸或者要让运气对自己有利……不道德的顶点是证券市场的投机，在这里，历史和与之相伴的人类被降格为满足算计的、赌博的投机者之贪欲的手段。[13]

反自由主义与反犹主义是齐头并进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攻击企业自由将整个基督教欧洲犹太教化，他瓦解了先前那种团结互助的形式，将基督教欧洲的面貌变成了他本人对犹太人的讽刺描述。[14]这个主题将在下一个世纪中不断地被重复。

随着古典自由主义不断为更多人争取到更多自由，反对它的力量也在发展壮大，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反自由主义理论中开花结果。如谢莉·伯尔曼（Sheri Berman），这位福利国家（也叫作“社会民主”）坚定的捍卫者，在她那部详尽的历史著作《政治的首要性：社会民主与欧洲二十世纪的形成》中认为：

市场在不断前进，这在各个欧洲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安。批评者哀叹对自利的歌颂以及猖獗的个人主义，哀叹传统价值和社群的瓦解，以及资本主义在其身后留下的社会错位、原子化和分化现象。于是，在世纪末，公社思想和民族主义运动兴起，认为只有恢复民族性的各个社团才能提供团结感、归属感，以及这个已经分裂的、迷惘的欧洲社会急需的那些集体目的。[15]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政治回应当中的一种，它讲述了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替代的必然性，这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而一旦这些论证没有成为现实，其他一些知识分子就转向别的直接行动的方式来攻击和消灭自由个人主义。就如伯尔曼所注意到的：

虽然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在关键方面有显著差异，但人们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之间重要的相似性。他们都拥护政治的首要性，兜售他们使用政治权力重塑社会与经济的欲望，它们都赞同社群团结和集体的善。他们都建构了现代的、大众的政治组织，并称自己为“人民的政党”。他们对于资本主义都采取了中间立场——既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希望其死亡，也不像许多自由主义者那样毫不批判地崇拜它，而是采取了“第三条道路”，相信国家能够也应该在不摧毁市场的条件下控制市场。[16]

欧洲大量的“人民政党”为今日的福利国家铺平了道路，但他们在今天已经丧失了那些让他们取得政权的大部分激动人心的辞藻。不过，留在他们身后的是一片狼藉——从摇篮到坟墓的宏大许愿是各种尚无资金支付的年金和保险金，在金字塔型计划背后留下的是大量债务和未兑现的承诺，欧洲各个社会的经济动乱把矛头指向了这些福利国家本身（在希腊，由于福利国家无力为自己提供资金引发的2012年5月6日大选使得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激进左派政党联盟和公开表明立场的法西斯主义

政党金色黎明党进入议会。对20世纪的欧洲历史有所了解的自由民主的支持者，都会对此感到严重担忧）。

福利国家在美国生根

在美国，福利国家到来的形式有些许不同，不过它与欧洲的反自由主义运动还是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推动资源“转移”的政策，通常是以授予各种特权为形式，这在最高法院判决了《穆恩对伊利诺伊州》（*Munn v.Illinois*，1877）一案后成为定例。该案允许州立法控制铁路、谷物仓储设施和其他行业的价格和费率，这意味着那些立法机关现在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他们为了某些利益可以牺牲他人。莫里森·威特（Morrison Waite）大法官写下了多数意见：

当财产以一种公共的形式使用，并使之成为一种公共的结果影响整个社群时，它确实裹上了公共利益的外衣。[17]

于是，我们所说的“寻租”阶段开始了，也就是通过政治行动，以其他人为代价为自己谋求利润。农民以铁路为代价谋求利益；铁路牺牲其竞争者的利益；制造商牺牲消费者的利益；诸如此类。在“进步主义”时代，转移国家在美洲大陆上焕发生机。

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以及随后联邦储备委员会灾难性的决策，然后是坏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其中包括摧毁贸易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它们开启了席卷全球的保护主义浪潮，导致国际贸易崩溃。这段经历让许多人把大萧条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归咎于干预主义政策不足，而不是这些干预政策的破坏性。共和党总统赫伯特·胡佛在1932年的大选中夸耀自己如何增加干预主义来应对先前干预所造成的恶果：

我们当时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我们本可以无所事事，但这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所以与此相反，为了应对局势，我们向私人企业和国会提出了共和国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经济防卫和反击计划，并且我们将这个计划付诸行动。[18]

胡佛承诺，如果他再度当选，则会有更多的这种干预主义。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时大力反对干预主义的胡佛当局。罗斯福既承诺废除禁酒令这样灾难性的在政策（这也许是让他赢得大选的一个同样十分重要的原因），又怒斥了胡佛的过度开支：

我控诉这届美国政府是我们历史上在和平时期最会花钱的政府。这届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又一个办公室，一个又一个委员会，但却没能预见到人民的真切需求和被削减的购买力。这届美国政府以纳税人为代价，维持着各种办公室和官僚，各种委员会和委员。[19]

尽管罗斯福在竞选中反对胡佛的干预主义政策，但新上任的罗斯福政府很快就开始采用、延续和调整胡佛政府的政策，这就成了我们所熟知的新政。新政在实质上是一系列对经济过程杂乱无章的干预，它致使这次萧条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20]

这个干预经济的计划大部分是从胡佛那里继承而来，罗斯福又将其扩展。这个计划包括阻止价格向下调整的措施（这是美联储大幅缩减货币供应量的正常反应），这些措施包括大批量摧毁食品，建立一个有害的农业补贴体系（这仍然是美国福利国家的一大支柱），建立大规模公共建设项目（延缓了经济调整、延长了萧条的时间）以及建立强制缴纳退休金的“社会保障”体系（它以德国的体系为范本，把对于劳动征收的税的一半称为“雇主缴纳部分”）。现代福利国家的一大特点是建立大规模津贴项目（通常是以“穷人”的名义来推进的，但实际上是逐渐覆盖越

来越多的人，直到变成普遍的津贴），美国体系与欧洲体系的相似性着实令人惊讶。[21]

许多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生活在福利国家当中，因为其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们，“福利”一词仅指向穷人进行转移收入的政府项目。他们没有认识到，每个人都在为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和许多其他巨额（而且是破产了的）津贴计划交钱，他们都被这些计划套在了福利国家里。此外，尽管非裔美国人是享受“有家庭收入调查”的福利计划的少数族群，大多数美国人看到福利就必然会联想到贫困和非裔美国人，这主要是源于美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启动反生产的“反贫困大战”和“伟大社会”计划。计划结果却不尽如人意，随着针对穷人（最主要是非裔美国人）的计划不断增加和扩展，社会开始瓦解，美国城市被挖空，公民社会的志愿组织萎缩，双亲家庭不断减少，犯罪率提升，而且还导致了史无前例的青年失业率水平。

社会学家弗朗西丝·福克斯·派文（Frances Fox Piven）注意到，“反贫困大战”和“伟大社会”发端于美国党派政治斗争。20世纪50年代，黑人选民在全国大选中变得日益重要。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1952年取得的选票中有21%来自黑人，1956年，这个数字上升至39%。尼克森于1960年取得的选票中有32%来自黑人。[22]派文观察到：

1960年，民主党人发现，黑人选票，尤其是城市中的黑人选票，对于总统大选至关重要（肯尼迪依靠芝加哥南部黑人聚居区的选票，在伊利诺伊州以仅仅8000票优势取胜的故事很快成为民主党日后的范本）。不过，黑人还没有被城市的各个政党吸纳，市政府的机构也没有给予黑人与他们选票数量相匹配的任免权、权力和服务。为了补救这一失衡现象，肯尼迪-约翰逊政府逐渐发展了一个双管齐下的办法：首先，他们绕

过州和地方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新的针对贫民窟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政；其次，他们鼓励各种向市政府机构施压，给予黑人更多服务的策略。[23]

这一策略能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摆脱那些认为非裔美国选民对他们的利益造成威胁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州政府一级，如果是民主党执政的话，他们通常极其敌视黑人选民（尤其是当时被民主党掌控的南部各州）；还有北方的市政府，因为它们通常由“白色人种”（波兰裔、意大利裔、斯洛伐克裔等等）的民主党人联合执政，不愿与黑人分享权益和政治权力。因此，“联邦政府必须另辟蹊径，它必须在国家政府和贫民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联系，一种越过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系……如果资金流经白种人政治领袖，这笔钱可能再也不会发到少数族群的贫民手中。”[24]

“伟大社会”本质上也是一项政治策略。这一点通过共和党人掌权后，只是将福利利益转移到他们的选民的做法即可为证。先前直接发放给黑人社区的钱，变成了由州政府管理的“整体拨款”（Block Grants，在大多数情况下由民主党白人或者共和党人控制）。他们也创造了新的津贴形式以更好地适应于他们的政治议程。派文注意到，这样做的原因“并不像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和其他评论者所说，共和党人的政策是以对我们国内问题的性质有更清楚的认识为基础，他们真实的原因无非是旨在满足不同的政治需要。”[25]

美国福利国家的“反贫困计划”不仅让一个政党取得了一个很大的投票群体（因此也使美国党派政治在种族这条线上急剧分化），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数百万人的经济福利。在撰写本文时，黑人青年的失业率几乎是亚裔和白人青年的两倍，比西班牙裔青年高50%。[26]在伟大社会计划开始前，黑人青年失业率在以前一直都接近，很多时候还低于白人

青年的失业率；而在此之后，这些数据开始分离。[27]美国的贫困率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乃至60年代都在大幅下降，而这一趋势在“伟大社会”计划推行的20世纪70年代停止，并开始略微上升。与此同时，年轻非洲裔美国男性的劳动力参与度显著下降。[28]由于“反贫困大战”的失败显而易见，许多美国人（不论他们的种族）都将“福利”与针对城市内部黑人群体的项目联系到一起。事实上，针对穷人或者少数族裔的计划所涉及的钱，只是美国福利国家所控制和分配的总量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反贫困大战”中很大一部分钱是由官僚制度本身消耗掉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1973年写道：“不论中产阶级在职人士的种族或者族裔背景，他们都有一种惊人的一致性。对于如何设计方法改善底层阶级群体的条件问题，他们无一例外都会想到要首先改善中产阶级在职人士条件的方案，然后才可能是，但也可能不是改善穷人的条件。”[29]根据理查德·A.克罗瓦德（Richard A.Cloward）和弗朗西丝·福克斯·派文（Frances Fox Piven）的看法：“社会福利的各种官僚制度以穷人的名义设立，但穷人并不是它们真正的主顾。这些机构实际上是面向其他更有势力的群体。这些群体能够为公共官僚机构提供其存活和扩张所需的正当性和政治支持。”[30]

福利国家并非只是一系列杂乱无章的收入转移项目；它是一套连贯的政治策略，它限制了穷人改善自身命运的能力（保护特权群体免于与他们竞争），同时又发放收入补贴，对于穷人遭受的这些痛苦的损害，部分地予以补偿。有的政治家标榜自己为穷人的朋友，而正是这些政治家投票支持规定食品最低价格，以维持较高的食品价格；他们支持通过特许经营和最低工资法，用价格手段将不熟练工赶出市场，以此推行劳动市场准入限制，也同时向那些由于他们的政策而强制失业的人提供收入支付。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注意到：

最低工资法和其他劳动市场规范的确减少了就业机会，因此也就减少了那些被强制赶出市场的人的收入。从这个事实可以推出，作为这种限制工会策略的一部分，必然需要有一种政治策略来呼吁建立各种维持计划，为那些因为市场关闭而失业的人提供收入。如果没有工作就只能挨饿，那么社会就会出现剧烈波动。因此，工会很有可能会带头支持收入补贴计划（如食品券、福利、工作队、公共服务雇佣及各种计划），这代表了整个社会向那些首先限制了劳动市场的人进行收入再分配。他们施舍给那些工作被拒的人一些面包屑，让他们保持缄默，就这样掩藏了工会和其他经济机构导致的市场准入规范的真实后果，由此建立起一个永久的福利阶级。[31]

福利国家基本上是且仍将会是控制人民的一种政治策略，它的目的不是为他们生产更大的福利，而是把他们当作政治选民来操纵，福利国家是古老的“主子”和“门客”关系的一个新版本。它操纵的不仅仅是人口中较为贫困的部分，而是每一个人。

政治科学家爱德华·塔夫特（Edward Tufte）在《经济的政治管控》（*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中展示了转移支付（主要是中产阶级之间的转移支付）是如何根据大选日程的节奏而被系统地操纵的。这种操纵的方式增强了“竞选——经济周期”的现象，即与竞选同步的繁荣与萧条，其原因在于政府会在大选之前利用转移支付最大化其可利用的收入，那么统治政党的选民支持也往往会因此增加。

“竞选——经济周期在全球滋生了一个跌跌撞撞、时断时续的经济。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粉饰大选年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薪资税。政府偏向于采用“效益立竿见影、隐性成本来日方长”的政策为短视的选民提供短视的政策。特殊利益诱使拉帮结派的政治家向多数人征收小笔成本，以此为少数人获取巨大效益。这导致了不稳定和无效率的经济。[32]

我们所说的福利国家这种主子和门客的体系，最终撞上了某种在根本上无法操纵的东西——算术。

政府需支付项目主要包括国家养老金、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国家项目，其总额已经达到了无法持续的水平。雅典街头的情况就是明证：“反政府”的暴动人群几乎完全是政府雇员；他们向另一批政府雇员（即警察）投掷汽油弹。这种情况在美国也能看到。近两届美国政府举债之巨是先前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他们的举债不仅用于为他们的全球军事力量和干预提供资金，为布什总统“医疗处方药，改善与现代化法案”和奥巴马总统“患者保护和可负担医疗法案”（也被称为“奥巴马医改”）未能兑现的项目买单，他们甚至动用了比这还要多的钱。仅仅布什总统的愚蠢做法就为预算失衡增加了17～18万亿美元。[33]奥巴马总统的这件蠢事需要用到多少钱还较难计算，因为它要具体实行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基于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精算局的计算与方法可以保守估计，它在75年的时程上大约会再度增加17万亿美元的债务。[34]2008年，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理查德·费雪（Richard Fisher）直截了当地讲述了美国政府“医疗保险的数学”：

该计划有3个部分：医疗保险A，覆盖住院费用；医疗保险B，覆盖就医部分；还有医疗保险D，29个月前刚刚实施的药物补贴。医疗保险A中待付款项的无限贴现现值是34.4万亿美元；医疗保险B中需要额外的34万亿美元；医疗保险D中不足资金还有17.2万亿美元。如果你今天要付清所有3个项目的钱，你会被85.6万亿美元的账单套牢。这比社会保险的账单的6倍还多，比整个美国经济每年产出的6倍还多。[35]

这些义务将会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富支付它们而被取消。通货膨胀也许会是抵消它们的办法，这意味着负担会不均等地落在穷人和弱势群体的身上，而且会以全球经济扭曲和资源错配为代价；或者政府不直接支

付这些钱，取消这些义务；或者可以改变规则，让很多群体失去接受政府承诺的补助资格。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官方债务已经处于极高的水平，但如果我们将未兑现义务（即还未有财政收入来支付的未来提供补助的承诺）的总和计入预算失衡，那么官方承认的债务只能算是冰山一角。债务将无法偿付，承诺也将无法兑现。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越发需要思考替代福利国家的其他选择。

福利国家之前……与之后

政治家喜欢指出他们推行一项政策后的成效。“看哪！”他们跟我们说：“自从我们推行工伤法以来，工伤的数量下降了！”把实行新法律后出现的任何改善都归功于自己。要检验他们的说法，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看一下这项法律通过之前的趋势。如果它在法律实施前就有下降趋势，甚至以更为陡峭的角度下降，那新法带来了其后的改进一说，可信度便大打折扣。[36]趋势线分析是检验政策是否改善境况的好方法。在政策实施前情况是怎么样的？也许改进是由于另外的因素。

福利国家的辩护者想要我们相信，在福利国家之前，穷人是没有救助的，没有医疗，没有教育，没有养老，“没有福利”，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福利国家只不过是接管了自愿组织建立好的制度和安排，进而以此为自己邀功。

就福利制度而言，在其被福利国家所取代之前，自愿制度曾体现出显著的活力，并以此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从灾祸时期的医疗需求，到运势不济时的出手相助，这种“友好组织”（Friendly Society）在尚未被福利国家冲垮前，便提供了这种“互助”，历史学家也已将它们精彩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些组织提供了社会团结互助、灾祸保险、道德援

助，以及其他许多服务。这一切都以自愿为基础。以英国为例，根据历史学家西蒙·科尔德里（Simon Cordery）所说：

这些集体自助组织为工人提供了互助保障，以及常规的、以仪式为基础的一连串机会。1914年，在英国的自愿组织中，它们占据了最大部分，其成员数量达到600万人——等于所有成年男性人口的一半。[37]

友好组织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也有所叙述。它们当年拥有的成员远远多于人们大书特书的工会。它们受到的支持远远大于在许多国家夺取权力的社会主义运动。它们提供社会服务，其维护工人尊严的体系也更为优越。[38]

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帝国运用暴力强制德国工人支付“保险”，而更为自由主义的英国则遵循自愿主义原则。历史学家E.P.亨诺克（E.P.Hennock）观察到：

在普鲁士，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指定类别的人群需强制缴纳保险。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登记总长（Chief Registrar）监控各种自愿团体行动的尝试较不成功。不过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文化条件下的自愿保险比地方上选择性强制的普鲁士有更广的覆盖面。到了19世纪90年代初，强制保险已经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推行，而英国的自愿体系至少仍然与德国同样全面地覆盖了英国社会。但一旦全民强制保险生效的时间足够长，政治家对其运作有了政治信心，它的扩张便开始加速，产生的结果也远远超过任何自愿手段能实现的程度。官僚管理的强制保险，其优势在于它的过程可以渐进地向人口中的其他部门推广，只要这样做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39]

任何覆盖面变大的速率加快，当它是意味着用官僚管制替换工人的自我管理，从而取消或大幅度减少服务之提供者间的竞争的时候，其价

值到底有多大？

此外，就如亨诺克在另一处冰冷地指出的，德意志帝国的体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一种不可持续的“现收现付”的基础上。亨诺克提到被称为“职业协会”（Berufsgenossenschaften）的强制合作体系。工人被分配到这样的协会当中，需要向它们支付自己的保险。亨诺克注意到，俾斯麦“发现完全覆盖的职业协会不需要积累资本储备来支付未来的债务。与常规的国家制度一样，它们可以根据“现收现付”的原则运作，通过提高其成员在后一年必要的贡献来满足每年所需支付的款项。由于债务只会逐渐积累，这样的安排减少了最初几年的成本，而且使计划中的补偿水平最终能够实现。尽管这样做的代价是问题会在未来堆积起来，但它至少在目前可以让政府不必考虑给予补贴。”[40]

换言之，政治家发现他们可以把皮球一路踢下去，因为他们无须与有选择自由了解价格和其他有关未来支付和债务的当前指数的人打交道。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通过“现收现付”的体系，将问题推给了未来几代人，用短期主义、机会主义取代了负责任的对未来的打算。它大大减弱了自愿组织这一德国社会此前的支柱，而输出到英国和其他国家后也带来了同样的后果。福利国家之前并非一无所有。福利国家之前有更好的体系，但它被国家给扼杀了。

教育也是类似的情况。自愿提供的教育服务在被国家挤出之前就已经在传授文化，而且已经有开始再度逆转的趋势。教育史学家E.G.韦斯特（E.G.West）观察到：“1833年，政府最初介入教育时扮演的是发放补贴者的角色，其时它就好像是跳上了一匹已然在奔跑的马。”[41]教育学者詹姆士·图利（James Tooley）则已反复证明，虽然各国目前都声称为学生提供普遍的教育，但“免费义务教育”往往在现实中难以找到。在国家“免费义务教育”这一解决办法失败的地方，即便是对于最最穷困的

人，自愿提供的教育也在运转。这一点图利在他的研究和著作《美丽的树：考察世界最贫困的人如何教育自己的一部私人日志》中已有论述。[42]

提供社会服务、医疗服务和教育的这些自愿制度，福利国家在有些时候会选择刻意扼杀，有些时候则是让它们显得多余。工人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而组建的自愿组织，是各种国家主义政党和事业的一个重要阻碍。“我们大多数人强烈而且坚定地相信自愿原则，反对国家强制”，一位作者在1909年的一期《秘密会员杂志》中这么写道。[43]德国和英国的友好组织被扼杀的原因正是它们培育了大众的独立性而不是集体主义。在美国，由于国家坚持旨在创造政治选民和依赖性的政策，公民社会的自愿组织便因之萎缩。各地的人民都变得习惯于期望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去思考他们如何能够和平地与他人共事，改善自己的境遇。

我们能够拒绝福利国家，从而避免其由于崩溃而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如果希腊还不算一个足够大的警示的话，魏玛共和国的命运应当引起我们注意，我们需要解决福利国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我们能够避开灾难，我们能够用更公正、更公平、更有效、更有助于在穷困之中挣扎的人们的制度来替代福利国家。

从国家引发的这种依赖转向自由和独立，从持续贫困转向向上流动，从拉拢选票转向积极的公民权，实现平和、有序转型是今日正在成年的新一代的任务。他们的上一代辜负了他们。他们应当参与到公众辩论和政策形成当中，表达他们正当的愤怒，这是他们的长辈以为将皮球一路踢下去问题就会消失，这是他们的浪费、不负责任和鲁莽行事。我们已经踢到了路的尽头，这一代人不能再继续踢下去了。福利国家的路已经走到头了。

福利国家之后

福利国家正陷于危机，以它的名义所做的承诺混合着黄粱美梦和弥天大谎。福利国家起源于一种权力机制，它取代、挤出并摧毁了各种自愿的、参与性的制度；它将社会弱化、原子化，降低了个人责任；它用依赖关系和主从关系取代独立性和权利。它攫取了公民对于自身福利的责任，将公民变成自己的门客、附庸、臣民和乞求者。

将过程与结果混为一谈是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福利国家的鼓吹者宣称他们追求崇高的结果，但对于实现这些结果的过程却很少或者没有关注。即便是某些公开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士，他们曾经致力于拆除权力和镇压的体系，但也开始相信通过立法可以取得有益的结果。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将他当时正在兴起的福利国家主义的“社会自由主义”称为“新托利主义”（即新保守主义），因为他们采用的是保守的、等级制的社会控制手段来实现他们所认为的自由主义目标。

公共的善的增益在早年是各种自由主义措施最为显著的共同特征（当时是通过放宽限制取得这种增益的）。但近来自由主义追求公共善，不是通过放宽限制而间接取得，却将其作为直接取得的目的。为了直接取得它，他们采用的方法与他们最初采用的在本质上截然相反。[44]

于是，“社会自由主义”从真正的自由主义，即通常所说的“古典自由主义”分化出来。改革的关注点从原则、规则和制度移开，转而去尝试通过使用强制力量直接取得结果，而这结果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才有选择的可能。通常，我们选择的是手段（包括规则和过程），而不是后果，我们希望那些手段会带来我们所欲求的结果。[45]当政策制定者忘记了手

段的重要性——就人类合作而言，激励很重要，而且并没有魔法棒可以向世界一挥就能直接实现各种结果。由此我们能够毫无疑问地断定，他们把政策强加给我们之后，必然有许多糟糕的、预料之外的后果。斗转星移，福利国家那些预料之外的后果已经摆得明明白白，而且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此时正是结束这场魔法秀、掀开幕布、拆穿巫师的真面目的时候，变魔法的巫师只不过是政客和官僚——他们也不过是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类。

那些相信道德价值、尊严和人类权利的人应当站在古典自由主义者本杰明·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的立场：

为免却我们各种麻烦，他们（权威的所有者）已经做好十足的准备，除了服从和纳税！他们会这样对我们说：你们努力的目的、劳动的动机、所有希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不就是幸福吗？这样吧，把这幸福留给我们，我们会把它送给你们的。不，先生们，我们决不能将幸福留给他们。无论这样一种温柔的承诺有多么动人，都让我们要求政府不要越过自己的界限。让它仅限于维护公道。我们应当自行担起让自己幸福的责任。[46]

为福利国家之后做准备更待何时？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自由、更多选择、更负责任的行为，我们要更多地关注如何避免让未来的纳税人担起重负为今日的选民提供津贴这种毫无公平可言的做法。强制不能替代自由，它也不会带来安全、幸福、繁荣或和平。

为福利国家之后的自由、责任与繁荣做准备的时候到了！

注：

[1] 他们也针对政治精英们认为有道德的直接行为产生了大量的“道德立法”。这些措施包括禁止卖淫、消灭“道德堕落”、禁止麻醉品（包括酒精、大麻、鸦片等）、宣告异族通婚非法、迫害并将少数新问题入罪、禁止认为会对自己造成危险的行为，并普遍打压被认为和人们的福利不相容的物质和行为。在最近几年，随着流行的习俗发生了变化，福利国家有时会随之改变，但这些“进步”状态的历史只是吹毛求疵和道德压抑的行为之一。

[2] 丹尼尔·夏皮罗指出，“政府配给通常有利于有知识、有关系，以及被很好地激励的中产阶级。”Daniel Shapiro，*Is the Welfare State Justified?*，p.149.

[3] 参见Brink Lindsey，*Against the Dead Hand:The Uncertain Struggle for Global Capitalism*（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2002），p.33.

[4] A.J.P.Taylor，*Bismarck: 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1955；New York: Sutton Publishing，2003），p.204.泰勒指出，俾斯麦有一个计划被国会驳回；他想要“部分”直接来自国家的预算。相反，国会只征收雇员直接支付和其他声称“由雇主”支付的部分。然而，正如经济学家们都知道的那样，这两个“部分”的全部负担都会落到雇员身上，因为这来自本来应该以工资支付的钱；雇主会根据完成工作的价值付钱，不会多给，并往往对雇员收到多少现金漠不关心。俾斯麦是由国家代表群体利益的“公司联合”，而非有个人权利的公民形成这一理念的先驱。如泰勒指出，“这个理念更深远地承载了他对利益群体替代高级原则的强调。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重新捡起了这个表达和设计。”（204页）以社会保障的“雇主部分”的形式对劳动者额外征税的累积，促成了魏玛共和国议会政府的垮台。如Jürgen von Kruedener，“Die Überforderung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ls Sozialstaat，”*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t*，11，no.3（1985），pp.358–76一文写到的，因为这起垮台“是福利国家主义过度扩张的后果，工资和工资负担是促使其发生的一大原因。”（376页）

[5] 参见A.J.P.Taylor，*Bismarck: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p.203.

[6] 1889年3月18日的演讲，参见David Kelley，*A Life of One’s Own: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Welfare State*（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

1998），p.39.

[7] A.J.P.Taylor，*Bismarck:The Man and the Statesman*，p.203.泰勒（Taylor）指出，俾斯麦开创了一个范围广泛的福利国家制度，而“最后他谈到了‘工作权’和失业保险的想法——20世纪福利国家的最后一步。”（204页）

[8] Jürgen von Kruedener，“Die Überforderung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ls Sozialstaat，”显示了正是俾斯麦曾开创的东西的结果：“社会保障”的“雇主的份额”中工人要负担的开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急剧上升。Kruedener总结到，“这个巨大的陷阱，实际上是这个国家的悲剧，是它作为一个福利国家在客观上的过分扩张。”（376页）

[9] Götz Aly，*Hitler's Beneficiaries:Plunder，Racial War，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New York:Henry Holt & Co.，2006），p.13.阿里描述了在对欧洲其他地方掠夺之前，对德国犹太人的掠夺：“到1937年年末，财政部的公务员们尽可能地推动了国家的信用额度。当被迫为国债再次融资拿出新办法之时，他们把注意力转向了德国犹太人的财产，这些财产稍后被充公并加入到人民基金（Volksvermögen），或者叫德国人民的集体财产。集体财产这个充满意识形态的概念（不仅限于德国社会）暗示了剥夺那些被主要种族视作‘外国人’（Volksremden）或者‘敌人’（Volksfeinden）的人的可能性。”（41页）强迫劳动是一种再分配，它来自对犹太人、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其他被国家视作一个整体的人的奴役，这远非对大型私人公司的补贴。在计算了国家对各公司征召劳工所付的“工资”征收的税之后（“这些公司所付工资的60%～70%”），阿里得出结论，这代表了1941—1945年130亿德国马克（约现在的1500亿美金）：“这个数字的大小与传统的历史假设不符，历史假设是各公司从强迫劳动那里获益最多。相反，来自强迫劳动的数十亿国家财政分担了普通德国纳税人的巨大负担。而这只是‘民族同志’从他们对政府运动那里所获的好处之一，这个运动不仅发动战争反对别人，而且要剥夺他们拥有的一切（162～163页）”。

[10] 同上，p.303.

[11] Friedrich Engels，“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in Lawrence S.Stepelevich，ed.，*The Young Hegelians:An Anthology*（Amherst，

N.Y.:Humanity Books，1999），pp.278–302，p.283.

[12] 同上，p.289.

[13] 同上，p.293.

[14] 参见Jerry Z.Muller，“The Long Shadow of Usury: Capitalism and the Jews in Modern European Thought，”in his *Capitalism and the Jew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15–71.

[15] 参见Sheri Berman，*The Primacy of Politics: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3–14.

[16] 同上，pp.16–17.

[17] 94 US 126（1877），参见Douglass C.North，Terry L.Anderson，and Peter J.Hill，*Growth&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A New Economic History*（Englewood Clif s，N.J.:Prentice Hall，1983），p.146.

[18] Herbert Hoover，“Address Accepting the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Nomination，”August 11，1932，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23198&st=&st1=#axzz1rUPyI5Ew.另见：Murray N.Rothbard，“Herbert Hoover and the Myth of Laissez-Faire，”in Ronald Radosh and Murray N.Rothbard，eds.，*A New History of Leviathan*（New York:E.P.Dutton&Co.，1972），pp.111–145.

[19] 参见Franklin D.Roosevelt，“Campaign Address on Agriculture and Tariffs，”*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Volume one，The genesis of the New Deal，1928–1932*（New York: Random House，1938），p.742.

[20] 参见Amity Shlaes，*The Forgotten Man:A New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New York:Harper，2007），Douglas A.Irwin，*Peddling Protectionism:Smoot-Hawl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以及Gene Smiley，*Rethinking the Great*

Depression（Chicago: Ivan R.Dee，2002）.

[21] 对相似性的考察（也结合了对明显差异的多次声明）参见John A.Garraty，“The New Deal，National Socialism，and the Great Depressio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8，No.4（October，1973），pp.907–94，以及Wolfgang Schivelbusch，*Three New Deals:Reflections on Roosevelt's America，Mussolini's Italy，and Hitler's Germany*，1933–1939（New York:Henry Holt & Co.，2006）.事实上，墨索里尼在1934年似乎非常喜欢新政：“应该密切地关注美国的实验。在美国，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是直接的，有时也还以无因回避权的形式干预。其含义仅仅是总统强迫双方提交的集体合同。在对该实验进行判断之前，我们必须等待。”Benito Mussolini，“Speech in the Senate on the Bill Establishing the Corporations，”13th January 1934，in Benito Mussolini，*The Doctrine of Fascism*（Rome:Ardita，1935；republished New York: Howard Fertig，2006），p.69.

[22] 参见Hanes Walton，*Invisible Politics:Black Political Behavior*（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5），p.123.

[23] 参见Frances Fox Piven，“The Great Society as Political Strategy，”in Richard A.Cloward and Frances Fox Piven，*The Politics of Turmoil:Poverty，Race，and the Urban Crisis*（New York:Vintage Books，1975），pp.271–283，pp.271–272.

[24] 同上，pp.276–277.

[25] 同上，p.283.

[26] http://bls.gov/news.release/youth.t01.htm.

[27] 参见Walter E.Williams，*Race and Economics:How Much Can Be Blamed on Discrimination?*（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2011），pp.41–43.

[28] 参见Charles Murray，*Losing Ground:American Social Policy，1950–*

1980（New York:Basic Books，1984），introduction to 1994 tenth anniversary edition，p.xviii.

[29] Daniel P.Moynihan，*The Politics of a Guaranteed Income*（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p.54.经济学家瓦尔特·E.威廉姆斯在1980年指出，“事实证明，如果我们计算所有以消除某些贫困名目发生的联邦、州和地方的年度支出，我们会发现超过2500亿美元被花费在这些项目上。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钱给穷人，每四个贫困家庭中的一个将收到大约每年4万美元。他们没有得到这笔钱。大部分钱被非贫困人群、官僚和负责照顾穷人的专业人士拿走。这感觉像通过马群来喂麻雀。Walter E.Williams，“The Poor as First Victims of the Welfare State，”*Imprimis*，Vol.9，No.7（July 1980），p.6.威廉姆斯的著作*The State Against Blacks*（New York:McGraw-Hill，1982）对整个干预主义体系提出了一个强迫性和证据确凿的起诉书，因为这个干预体系对于其据称要用福利国家去帮助的对象来说，是有害的。一些数据已在他的著作*Race and Economics: How Much Can be Blamed on Discrimination?*中被更新。

[30] 参见Richard A.Cloward and Frances Fox Piven，*The Politics of Turmoil*，p.4.

[31] 参见Walter E.Williams，*Black America and Organized Labor:A Fair Deal?*（Washington，DC:Lincol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1980），p.25.

[32] 参见Edward Tufte，*Political Control of the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143.

[33] 引自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贾戈迪许·戈卡勒在国土安全及政府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词，Subcommittee on Federal Financial Management，Government Information，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109th Cong.，1st sess.，September 22，2005，www.hsgac.senate.gov/download/092205gokhale.以及达拉斯联邦储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费雪（Richard Fisher）的文章，“Storms on the Horizon: Remarks before the

Commonwealth Club of California，”www.dallasfed.org/news/speeches/fisher/2008/fs080528.cfm.

[34] 参见“President’s Health ‘Reform’ Grows Unfunded Obligations By $17 Trillion，”http://budget.senate.gov/republican/public/index.cfm/2012/3/president-s-health-reform-grows-unfunded-obligations-by-17-trillion

[35] 参见Richard Fisher，“Storms on the Horizon.”

[36] 该趋势线分析在Charles Murray，*What It Means to Be a Libertarian:A Personal Interpretation*（New York: Broadway Books，1997），pp.47–56.一书中有解释。

[37] 参见Simon Cordery，British Friendly Societies，1750–1914（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3），p.1.

[38] 参见David Beito，*From Mutual Aid to the Welfare State:Fratern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ervices*，*1890–1967*（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0）；David Green，*Working Class Patients and the Medical Establishmen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5）；Nicolas Marques，“Le monopole de la sécurité sociale face à l’histoire des premières protections sociales.”*Journal des Économistes et des Études Humaines*，vol.X n° 2，Sept-Oct.2000，www.euro92.com/acrob/marques%20mutu-elles.pdf;David G.Green and Lawrence Cromwell，*Mutual Aid or Welfare State:Australia’s Friendly Societies*（Sydney:Allen&Unwin，1984）；David Green，*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The Rediscovery of Welfare Without Politics*（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2000）；Anton Howes，“Friendly Societies，the State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Great Britain 1900–1939，”unpublished thesis，King’s College，London，2012.

[39] 参见E.P.Hennock，*The Origi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ngland and Germany*，*1850–191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76.亨诺克似乎不明白（当时许多人都不明白），所谓的“雇主的贡献”完全来

自工人的工资，并且并不代表从雇主到雇员的转移，而仅仅是雇员能拿回家的工资的减少。

[40] 同上，p.92.

[41] 参见James Bartholomew，*The Welfare State We're In*（London:Politico's，2004），p.153.巴塞洛缪（Bartholomew）的书极好地展示了福利国家是如何被称赞为进步的。根据其他依据和文件，福利国家有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文明的倒退，依赖、犯罪和其他一些现代社会病的增加。韦斯特的书开创了对不依靠国家的教育的研究。关于这个话题有一篇短文，参见“The Spread of Education Before Compulsion: Britain and Americ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The Freeman*，Vol.46，Issue 7（July 1996），www.thefreemanonline.org/featured/the-spread-of-education-before-compulsion-britain-and-america-in-the-nineteenth-century/。对这些问题的一项调查，参见James Tooley，*Education Without the State*（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98），esp.chapter 3，“The Secret History of Education Without the State.”www.iea.org.uk/sites/default/i les/publications/i les/upldbook56pdf.pdf.

[42] 参见James Tooley，*The Beautiful Tree:A Personal Journal into How the World's Poorest Are Educating Themselves*（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2009）.

[43] *Oddfellows'Magazine*，No.414（June 1909），参见Simon Cordery，*British Friendly Societies*，*1750–1914*，p.155.

[44] 参见Herbert Spencer，“The New Toryism”［1884］，in Herbert Spencer，*Political Writings*，ed.by John Offe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69.

[45] 对于过程而不是结果是政治选择的常见主题的一般观点的扩张，另见Mark Pennington，*Robust Political Economy: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the Future of Public Policy*（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1）。

[46] Benjamin Constant，“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Moderns”［1819］，in Benjamin Constant，*Political Writings*，ed.by Biancamaria Fonta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326.

互助组织的演变

大卫·格林

自力更生和私人慈善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福利国家仅有的替代选项。正如历史和政治学家大卫·格林（David Green）在本文中所展现的，私人合作建立的互助组织能够维护社会的团结，为参与人提供紧急援助、医疗和其他方面的福利，并提供一个传播道德价值的框架。大卫·格林是西维塔斯智库（Civitas）的创始人及总监。西维塔斯智库旨在研究公民社会，总部设在伦敦。格林在他的书中展现了国家健康保险（在英国始于1911年）以及其他福利制度是如何动摇了互助组织的基础，并逐渐将后者边缘化的。格林曾出版过多部著作，包括《工人阶级患者与医疗机构》和《重塑公民社会：脱离政治的福利安排》（London：Civitas，2000）。本文即选取自后面这部著作。

大多数福利史喜欢把福利服务的改善等同于政府参与度的提高。这类书的叙述脉络，大多是讲福利国家的兴起填补了市场的空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上，缺乏独立生存能力的人们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无论他们的需求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比如，家庭和社群的救济虽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却由于其非正式、缺乏记录的性质而被历史学家普遍低估。同样，慈善机构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常常有人认为私人慈善是在福利国家诞生之前唯一有组织的福利来源。实际上，历史上组织最严密，最能满足公民需求的福利提供者，其实是互助组织（Mutual Aid）。从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互助组织是英国最主要的社会福利供应者。[1]

互助组织是一种自治的、互惠互利的，由体力劳动者们共同创建的

一个协会，它旨在为不时之需做准备。互助组织的指导思想与私人慈善倡导的乐善好施精神不同。互助组织的经营依靠的不是一群人掏钱帮另一群人，而是由平等的个人组成社团承诺在困难之际互相伸出援手。会员得到援助不是受施，而是享受会员的权益，因为他们同样有义务帮助其他成员渡过难关。互助组织起初以地方俱乐部的形式存在。一开始，共同基金被简单地收集在一个木箱或者保险盒里。19世纪，英国逐渐发展出全国性的互助组织，组织成员多达数十万人，并握有精心经营的投资产业。

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英国，大多数家庭以靠工作自给自足为傲，但是微薄的工资意味着一旦家里的工人生病或者去世，经济困难就会接踵而至。面对这样的现实，互助组织的概念应运而生。在20世纪初，互助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担任着社会慈善俱乐部和福利提供者的角色，并至少承担以下这些责任：在主要劳工因为疾病、交通事故或者年迈无法工作时发放病假和退休工资；为组织成员及其家庭提供医疗保险；提供足以举办体面葬礼的丧葬费；为失去家人的遗孀和孤儿提供资金和生活上的帮助。医疗服务通常由成员投票选出的医生来提供。在大多数城镇，互助组织也另设有医疗机构，这相当于今天的保健中心。组织还建立起支援网络，以方便成员在异地找工作。

像卡特互助会（Incorporation of Carters）这样的互助组织，早在1555年就在苏格兰利斯镇成立了，但是直到18世纪，互助组织的规模和数量才开始迅速增长。

整个18世纪，互助组织的成员数量保持着持续增长状态。1801年，费德里克·伊顿爵士（Sir Frederic Eden）发表的权威调查表明，当时英国约存在7200个互助组织，成年男性成员数量达到了648000人，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不过900万。据1803年《济贫法》所估算的数据显示，

仅在英格兰与威尔士就有9672个独立的互助组织，其包括了704350个成员。[2]

当英国政府根据1911年的《国家保险法案》对1200万公民推行强制性社会保险时，至少有900万公民已经是注册和非正式的自愿保险协会成员了。1910年，即法案颁布的前一年，抛开非正式的互助组织不谈，单单注册的互助组织就有660万成员。这种惊人的会员数量，是在之前30年间快速增长而积累起来的[3]——1877年，注册会员数量不过275万人。此后，会员数量每年平均增加85000人，10年之后已经达到了360万人。1897年又达到了48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约12万人。再到1910年的660万，平均每年增加14万人。

正当互助组织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国家强制保险的介入改变了一切。

起源

最初，互助组织只是由当地酒吧的常客和熟人组成的。所有成员定期付费，同时获得既定的权益。在每年的圣诞节前，一些互助组织会平分年底所剩的资金，而其他的则将余额滚动到下一年。一些组织并无书面规则，另一些组织则有详细的规章手册。每个组织完全自治，而这一特点正是吸引会员的有力因素。自治组织能够以多种方式迅速应变，从而满足成员的需求。当英国政府推广组织登记时，许多互助组织不愿照办，因为注册即意味着法律的枷锁。正如互助组织史的专家P.H.高斯登（P.H.Gosden）所说：“如果大部分会员想要把一部分余款开年终派对，那么他们肯定不想让57个政府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指手画脚。”[4]

早期的许多俱乐部采取均分制的组织形式，即每位会员向共同基金缴纳相同的款项。如果在年底仍有盈余，那么这些余额将会平分给每一位会员。这种组织形式直到20世纪都很流行，但其弊端也迅速显露出来。首先，缺乏累计式基金意味着组织经常会出现现金周转不灵的情况；其次，由于会员年度续费制度的存在，病重的会员有时会在年底被排除在组织之外。为了纠正这些弊端，互助组织转变为互助联盟，开始保留共同储备金，并制定了只要缴纳会费即可保留会籍的原则。

联盟从19世纪早期开始发展，以“分会制”被广为熟知。1874年，皇家授权的互助组织有34个，每个都有逾名个成员。单是“曼彻斯特联合共济会（the Manchester Unity of Oddfellows）和“守林者共济会”（the Ancient Order of Foresters）两个组织就有将近100万会员。

联盟的出现对于互助组织的内部管理有着重大影响。在最早的俱乐部中，主流的做法是确保每个成员在决策上有平等的话语权。由于在小规模的组织中，所有会员都可以在同一地点会面，多数表决就成了决策的常态。这些早期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达成共识，也是为了一起找乐子。会议上半场会通过决议来维持组织纪律，下半场就开始给成员发放啤酒。

早期的工人互助组织采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自治。第一种是公投，即使不能与会，成员仍然可以投票；第二种是设立管理分支，权力在分支间轮转；第三种是代表会议，每位代表都充分反映其选民的意见；第四种是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出的成员可以平衡自己对事实的判断与选民的意愿和利益，自由实施他们认为最好的措施。

逐渐地，联盟开始显现出三级结构——分支、选区和联合体（Unity）——从而将重要的分支自治原则与选区、联合体层面的代议制

有效结合起来。在分会制契约中，分支保留了很大的权力，尽管最终决策权属于联合体的年度或者双年大会。

联盟中最重要的职位是高级秘书（Grande Secretary），也叫作通信秘书（Corresponding Secretary）、常任秘书（Permanent Secretary）和高等法院书记员（High Court Scribe）。颇让这些组织引以为傲的是，组织中的任何成员都可以毫无障碍地晋升到高职：

每个会员的权利都得到同样严格的尊重和捍卫，每个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权益。唯才是用的原则使会员各得其所。[5]

19世纪，互助组织在地方分支和国家级联合体中加入了中间级别。区域性组织够平摊丧葬费风险，使会员在连续过世时所需的丧葬支出不至于压垮地方分支。区域性组织直接从中央获得权力，但却由分支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管辖。除了管理丧葬金，地区还充当上诉的中间人，并监督分支机构的管理情况，检查账户，并酌情进行必要的干预。分支机构每年必须向地方和中央上缴资产表。[6]当然，并非所有分支都喜欢中间级别的加入，部分分支会因此退出联盟。

19世纪中期，实行参与式民主的地区俱乐部正在逐步演变为有着代表大会和全职行政职员的三层结构联盟。然而，组织中纯粹民主的思想仍然强烈，民主投票被作为决定组织结构变化的标尺。在自治性的地区医保俱乐部的全盛时期，每个会员都被认为有同等的担任公职的资格。这是工人阶级成立的组织，尤其是新成立的组织的共识。例如，1893年独立工党成立不久，《号角》报的编辑就在社论中宣布：

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普通的市民，只要诚实，有头脑，就完全可以胜任官员和代表（如委员会委员和议会议员）的日常责任。所有的官员都应该在一年后卸任，由他人继任。[7]

互助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这种精神，并在时间的推移下不断改革，使结构得到完善，这也使强有力的组织与成员的强烈参与热情得到了平衡。

互助组织和参与性民主

互助组织特别有趣的地方在于：组织试图将成员权力的保留和组织的高效率平衡起来。与之相反，福利国家常因权力集中而饱受诟病。值得注意的是，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并非政府独有。当分支制开始取代纯粹的地区俱乐部时，中央和分支之间的权力平衡就成了一个难解的问题。

分支制的互助组织为解决这个古老的问题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方法。这些办法多通过提高参与度来确保效率最大化，同时节省运营开支。守林员联盟采用的方法是确保法律权威“属于并且源自全体成员”。宪章的第一条将成员权力比作“阳光”，并规定“这种权力与生俱来，不受任何人为的限制。官员代表全体成员的意志，并对其负责。官员权力由成员赋予和限制。”在分支中，全体成员在以下条件保持平等：

法庭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的事务都秉承平等的原则。没有穷人无法企及的高职，也没有富人无法屈尊的责任。每一个官员都应该具备管理的智慧，能抱着既谦卑又决绝的态度行使权威，最后，还要有良好的操守来赢得尊重。这是每一个成员都有能力达到的。[8]

早期的俱乐部授予分支主席处罚失当行为的权力，其相关条约也应运而生。位于吉斯伯勒的守林者俱乐部允许主守林人对妨碍他人者罚款3便士，或对滥用语言或辱骂他人者罚款6便士。[9]

同时，互助组织和早期的俱乐部清楚地意识到防止领导人滥用权力的必要性。多数组织在新任主席的就职典礼上会强调对主席的期盼。守林人俱乐部的主守林人的入职宣誓是这样的：

本人，〔姓名〕，被选举为主守林人，在您与会友面前特此庄严宣誓，将尽全力改善大家的福利状况，促进组织的和睦与融洽。我将努力参与管理组织内各项事务。[10]

互助组织对权力的监督并不完全依赖道德约束，规则同样限定了领导者的权限。以守林者协会的基本法为例，法律规定：如果领导人在卸任之前“未得到兄弟集会的允许，或尚未指派有力的继任者”，或者没能尽可能地将“所有合法提议”诉诸投票，即便这位领导者所犯罪行“没到免职动议的程度”，这样的失职也会导致5先令的罚款。再犯罚10先令，以此类推，直到21先令为止。[11]

在许多互助组织中，分支会议的开幕式同样被设计来避免掌权者滥权。在曼彻斯特联合体中，每次会议开始时，每位公职人员都需要庄严地阐述对成员的责任。例如，财务秘书要说：“为了维护分支机构和各会员的公平公正的账目，为了解释与平衡各位与分支机构多数人的需求，我的职责是保持账目清晰明了。”[12]

早期俱乐部采用轮值制来确保成员同甘共苦，但是轮值制逐渐让位于定期选举。例如，在曼彻斯特联合体中，除了财务秘书是分支机构指定的之外，领导人每半年或一年进行变更，是一种惯例。

民主的训练场

每个互助组织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各个分支机构都保留着相似的

传统，在各方面也差异不大。在曼彻斯特联合体中，新成员可以担任门卫、保卫者、指导员以及秘书助理等工作。保卫者是要担任门卫职务和确保密码的正确性；指导员通过入会介绍帮助新成员；门卫检查成员出席情况，保证成员出席权，并且保管互助会的章印。每个分支机构都有两个秘书，分别是选任秘书和财务秘书，前者主要负责会议记录。除了财务秘书，原则上其他的职位每年都要换届。

除了这两个秘书之外，每个分支机构还有3个主要职位：长老（the Noble Grand）或主席，副长老或副主席，再加上上任长老。这些职位也要定期更换人选。所有成员都是担任这些职位的合适人选——所谓"交椅轮流坐"——但成员首先得通过处理低级职位上的工作，并依次通过各级认证来证明自身的能力。

组织的管理远非轮值这么简单。参与式管理同样是成员学习新技能的方式。对于多数体力劳动者而言，分支机构为其提供了在工作场合难得的自我提升的机会。但是每半年更换主席的方针同样带来了风险——新任主席可能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胜任。为了消除这种风险，并保证新任主席能听取可行的建议，给每位主席都指派了两位帮手。他们在会议中坐在长老两边，并在会议过程中通过耳语提供建议。传统上，长老会选择一位经验丰富的"右护法"。此人通常有参与管理组织事务的经验，并熟知组织规则与流程。"左护法"是以朋友的身份提供不可动摇的精神支持。在这种制度下，高度的权力分散与高效率一箭双雕。而相比于体力劳动者在工厂低微和受限的角色，互助组织可以让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他们的点滴参与有助于维持运动的互助精神，也让成员因此颇有成就感。

管理分支机构事务的成员有希望晋升到更高的职位。担任过四次初级公职，通过初级资格认证，并担任过副长老、大长老或者上任大长老

的成员，即有资格获得上任大长老或紫袍长老认证。如若成功，该成员就晋升为前大长老委员会，并有资格参与地区和联合体级别的事务。前者包括地区秘书、地区主席、地区副主席和上任区主席等。

地区以上级别的职位包括联合体主席、副主席和上任主席。这些职位每年进行一次选举。委员会由上述3个高级公职人员和其他9位经年会选出的成员组成。每人上任一年后需退任，但是可以通过重新当选而续任。每个职员都需要拥有紫袍长老资格。高级秘书是全职性质职位，通过年会选举，供职长短由年会决定。

遵守规则，尊重彼此

最大的互助组织通常都有一本详尽的规则手册。这种手册对劳工出身的成员来说简直是神圣之物。规则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规则并非外部强加，而是基于多年经验，会员内部总结的产物：不断采纳、修改、废止，并随环境改变而改变。即便规则会导致不便，成员也是欣然接受的。

互助组织的成员们为他们制定的规则感到骄傲。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为了规则中蕴含的原则而骄傲，而非规则本身。组织的规定明确了每个成员必须做出的贡献和拥有的权利，并规定了公职人员的责任。

规则限制了公职人员的权力，并尽量将公职的荣誉与责任分享给广大的成员。规则保证了每一个同盟下的机构分支都可以有独立于区和联合体的自治权。这些组织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取代人治。在这一点上，互助组织是英国民主进程的理想训练场。

世纪之交的互助组织

19世纪后半叶，随着环境的变化，新型的互助组织开始发展。我们通常将互助组织分为两类，即提供疾病补贴的一般组织和无补贴的特殊组织。对于多数组织而言，在成员生病时提供补贴，是组织最大的任务。

1910年，《国家保险法案》生效的前一年，英国共计有各类互助组织26877个，注册会员达6623000人。[13]一般的互助组织可做如下分类：

表2-1　1910年英国兄弟会组成情况

	分支数量	会员人数
兄弟会联盟与分支	20 580	2 782 953
保险型兄弟会	3 117	1 277 185
年末均分型兄弟会	1 335	292 909
存款型兄弟会	81	381 491
总数		4 734 538

来源：贝弗利治，《自愿行动》，表21

1910年，特殊互助组织的会员总数达到1888172人，其中855962人所在的互助组织提供丧葬补贴，403190人所在的组织为船坞损坏和其他损失提供补贴，329450人所在的组织提供医疗保险。[14]

结论

互助组织的吸引力来自于其多样化的体制与大小带来的灵活性。正如贝弗利治（Beveridge）在《自愿行动》（*Voluntary Action*）中感叹

的："想到现在这些庞大的互助组织是从当初10来个人歇工之后在酒吧的聚集而演变而来，便令人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互助组织有成有败，但是贝弗利治认为，这些工人的组织改变了世界：

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或者在国家垄断的领域，对机制不满者要实现改变只能先改变政府。而在自由的国家和领域，改良的方法则全然不同；对旧制度不满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立新组织来满足自身的需求。市场欢迎实验，无论成败，而尝试正是创新的助产士。

注：

[1] 与澳大利亚的兄弟会的比较，参见David G.Green and Lawrence Cromwell，*Mutual Aid or Welfare State*.

[2] 参见P.H.J.H.Gosden，*The Friendly Societies in England 1815–1875*（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61），pp.4–5.

[3] 参见P.H.J.H.Gosden，*Self-Help*（London:Batsford，1973），p.91；William（Lord）Beveridge，*Voluntary Action*（London:Allen&Unwin，1948），p.328.

[4] 参见P.H.J.H.Gosden，*The Friendly Societies in England*，p.18.

[5] 参见Ancient Order of Foresters，*General Laws*，Observations on the Advantages of Forestry，1857.

[6] 参见Josef Maria Baernreither，*English Associations of Working Men*（London:Swan Sonnenschein，1893），p.380；G.D.Langridge，，*A Lecture on the Origin*，*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Manchester Unity Independent Order of Odd Fellows*（Melbourne:Manchester Unity，1867），pp.20–21.

[7] 参见Sidney and Beatrice Webb，*Industrial Democracy*（London:The Authors，1913），p.36，note 1.

[8]　参见Ancient Order of Foresters，Lecture 1，1879，pp.41–42.

[9]　参见Ancient Order of Foresters，Court *Robert Gordon*，Rules 53 and 55，1877.

[10]　参见Ancient Order of Foresters，*Formularies*，1879，p.12.

[11]　参见Ancient Order of Foresters，*General Laws*，1857，Rule 82.

[12]　参见Independent Order of Oddfellows，Manchester Unity，*Lodge Ritual and Lecture Book with Procedure*，1976，pp.9–10.

[13]　参见William（Lord）Beveridge，*Voluntary Action*，Table 20.

[14]　同上，Table 22.

互助取代社会福利：美国兄弟会案例

大卫·贝托

历史学家大卫·贝托（David Beito）记录了美国人利用结社自由创造出的巨大互助组织网络。在大萧条之前，互助组织可能是除教会以外，美国最主要的社会福利提供者。当时，互助组织的会员数量占到了全国成年男性人口的三成左右，而且尤其受移民和非裔美国人欢迎。与政府福利计划和私人慈善的施舍性质不同，互助组织提供的福利是以捐赠者与受助者之间的互惠为基础的。到20世纪20年代，兄弟会与其他互助组织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并再也没能复苏。引发这次衰退的原因，可能包括福利国家的崛起、各州限制性的保险法案，以及来自私立保险公司的竞争。大卫·贝托是位于塔斯卡卢萨的阿拉巴马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从互助到福利国家：兄弟会与社会保障，1890—1967》、《反抗的纳税人：大萧条时期的抗税斗争》以及同琳达·罗斯特（Linda Royster）合著的《特立独行的黑人：T.R.M.霍华德的民权和经济权利斗争》。

美国社会自行组织福利的例子数不胜数，上至教会，下至宗族、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在这其中，美国兄弟会可能是最有趣的福利组织，也是最被福利史学家忽略的福利组织。1920年，大约有800万美国人是兄弟会成员，占美国20周岁以上成年人的30%。[1]

兄弟会由其成员管理，并由地方一级的分支分散管理。通常，兄弟会会有一个秘密的仪式，仪式与独具特色的词汇、仪式和活动等联系在一起。大多数成员并不真的相信这些仪式中“魔法”的力量。仪式主要是

为了提供娱乐，并测试成员之间的凝聚力。通过举办抽奖活动、自制糕饼义卖、庆典和野餐活动，分支机构也成为大量城市街区和小城镇中的社区生活中心。兄弟会分支机构也为其成员及家庭提供了广泛的社会互助机会。[2]

尽管划分的标准并不绝对，我们还是可以把兄弟会大致分为两种：秘密组织和保险互助会。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各有不同的侧重。秘密组织主要专注社交与非正式的互助，其代表性组织包括共济会、麋鹿会以及奥德费勒兄弟会。1930年，单是共济会的会员数量就占美国成年白人男性的12%，比例十分惊人——比较来看，在20世纪30年代，工会成员的数量仅占劳动力人口的10%多一点。与多数秘密组织相似，共济会避免采用书面合同或正式的保险契约。对此，林恩·杜美尼尔（Lynn Dumenil）写到："作为一般原则，共济会的领导们不希望有人为了牟利而加入组织。组织反复强调，并在加入时的宣誓中包含了如下条款：新成员不得因追逐个人利益而加入组织。"[3]

尽管有严格的规章，秘密组织仍然是美国历史上民间互助的主要渠道。一位声誉良好的共济会成员知道，只要他们开口，组织不仅可以支付其丧葬费，还会举办体面的葬礼仪式。如果患有疾病，成员可以指望组织的兄弟们在祭坛募捐而来的款项，或者组织成立的探病委员会表示的关心。加入共济会就等于就业机会和商业机会。萨缪尔·刚培兹（Samuel Gompers）是一位资深共济会成员，也是美国劳工联盟的主席，曾经举了个例子。1897年，刚培兹在去会友人的路上遇到了一位陌生人，他二人交换了联络暗号之后，陌生人承认自己是受矿业公司雇用而来监视工会领袖的。随后他把拍摄的底片交给了刚培兹。刚培兹回想起来："发现自己的会员身份经常成为自己的护身符。"[4]

秘密组织的互助项目也有不那么遮遮掩掩的。20世纪前后，许多大

型互助会都开展了针对孤儿院和为老年成员及其配偶修建住宅的项目。截至1929年，共济会的39个辖区和奥德费勒兄弟会的47个辖区为其老年成员提供了住宅。1914年，共济会住宅项目给每位居民的平均补贴超过1800美元。在当时连社保都没有的美国，互助会成功确保了这些住宅不必过于拥挤。[5]

总的来说，保险互助会比秘密组织带来的社会福利影响更为深远。保险互助会和秘密互助会都有严密组织、神秘仪式和提供非正式互助体系等特点。二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保险互助会为成员提供了正式的保险政策，这是秘密组织没有的。互助保险保护的基本原则是向已故成员的受益人发放死亡抚恤金（人寿保险的形式之一）。保险互助会在工薪阶层间较为流行。1910年，《大众杂志》（*Everybody's Magazine*）中的一篇文章写道："富人一般会因为名声选择在大公司参保。而在互助组织中，穷人保险是为了生计，是为了以备有需要时，不必向慈善组织和救济站求援或者诉诸堕落的手段生存。"[6]

与秘密组织的活动类似，保险互助会提供的大部分援助都没有记录在案。无论成员的阶级或种族组成如何，几乎所有的组织都会一再强调成员的责任是为"兄弟姐妹"提供帮助。美国现代木工组织（Modern Woodmen of America）（这个组织管会友叫"邻居"，管分支机构叫"营地"）的发言人在1934年写到："时不时的小额捐款可以帮助很多人，比如穷困潦倒的成员，帮他重新自力更生，度过经济窘境；一个生病的'邻居'，组织可以出钱帮他收割庄稼，运到市场，并报销冬季的油费；因为火灾失去家园的人也会有新房子住——这就是木工组织在14000个'营地'上的运作方式。"社会学家彼得·罗伯茨（Peter Roberts）描述了在世纪之交时，互助组织如何在宾州的矿工中，通过赞助彩票的形式来帮助超期领取疾病补助的会员。[7]

与大型互助组织有关的，最容易查阅到的历史资料是国家兄弟会大会（National Fraternal Congress，NFC）提供的记录。大会是保险互助会的主要票据交换所。1919年，附属于大会的组织社团有超过900万名成员，超过120000个分支组织。这些组织提供的死亡抚恤金平均1100美元（每月约91美元）。这大约与当时与美国工人的平均年收入相等。[8]

一般而言，规模较小的组织（多数是地区层次，且非国家兄弟会大会的成员）支付的死亡抚恤金较低。为了更好地展现互助死亡抚恤金政策的总体平均水平，我们需要参考许多当时开展了的地区性研究。最可靠的研究之一是1919年由伊利诺伊州医疗保险委员会在芝加哥就工薪家庭人寿保险参保情况的详细调查。调查发现，超过74.8%家庭的丈夫、58.8%的妻子以及48.8%的儿童（14岁以下）购买了人寿保险，超过一半的劳动力的保险都是通过兄弟会提供的。这些政策平均发给的补助为768美元，即每月逾64美元。这组数据还不包括同时在私立公司和互助组织中购买多份人寿保险的人。[9]

互助组织的普遍特点是允许老年成员一次性或者分期兑现其保单。通常，受益人会用这笔钱来做点小生意。尽管如此，把兄弟会的死亡抚恤金归类为老年人的“退休金”（长期意义的退休收入）是不恰当的。纽约老年安全局在1930年开展的关于老年保险问题的研究发现，死亡抚恤金通常只是作为其他收入来源的补充。据安全局估计，纽约有43%的老年人通过有酬工作、退休金、储蓄及其他收入形式自立，50%的老年人（含家庭主妇）依赖家庭和朋友的帮助。受其他公共或私人慈善机构的救济的老年人不到4%。[10]

那么，兄弟会的死亡抚恤金与政府扶贫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在诸多政府福利中，与互助死亡抚恤金最相似的，可能就是许多州实行过的单

身母亲援助计划。这些计划一开始的受助对象仅限于寡妇，后来逐渐演变成联邦政府组织的，对有子女家庭的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AFDC）。这些计划的受益者数量与补助金的规模与互助组织相去甚远。1931年，仅有93620个家庭（1921年仅有45825个家庭）从母亲养老计划获得了帮助，而且平均月补助仅有22美元。相比来看，1931年，至少有900万人（主要是工薪阶级）在参与互助保险。据此数据来看，迈克尔·B.卡茨（Michael B.Katz）的“公共基金比私人基金帮到更多人”的看法实在不那么可信。[11]

兄弟会医疗保险与意外保险

在整个19世纪，民间互助主要体现在死亡抚恤金上。从20世纪早期开始，许多兄弟会开始创立正式的医疗保险与意外保险。1917年，加利福尼亚州的59个兄弟会中，有45个提供疾病保险或意外保险，而伊利诺斯州的159个互助组织中则有140个提供医疗保险或意外保险。然而，这些数字似乎并不重要。首先，实施疾病保险的决策权通常掌握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手中，而且即使存在疾病保险基金，成员们通常不会参保。如果我们采纳各州和当地的调查数字，1920年，只有不到40%的兄弟会成员参加了正式的医疗保险。不过，这一比例在此前20年中不断上升，这是毫无疑问的。[12]

互助医疗福利的规模、质量和医疗服务组合，取决于互助组织及特定分支机构的情况。最常见的医疗福利是每周给付现金。1917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兄弟会成员每周可以获得7～10美元的医疗福利补助，获得补助的时限平均最长为13个周。虽然工人患病的平均时间（以耽误的工作日形式计算）一般不超过两周，但很少有福利项目可以覆盖整个旷工

期。另外，在许多互助组织中，为补助期满的受助者（每年仅有10%参保人会提出申请）延长补助期限或者进行募捐的做法十分常见。[13]

在大萧条之前，兄弟会完全掌控了人寿保险市场（至少在工薪阶层如此），将其他商业竞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在很大程度上，兄弟会成功的秘诀在于自身结构带来的竞争优势。不同于私人企业，兄弟会在应付“道德风险”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道德风险恰恰是保险行业的顽疾。就医疗保险来说，最主要的道德风险是投保人会利用投保身份进行敲诈性的索赔。医疗保险的索赔极具主观性，因此难以核实。人寿保险面临的道德风险则相对小很多，因为受益人只有出具死亡证明才可以获得抚恤金。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互助组织在失去了在人寿保险方面的竞争优势后，仍可以持续主导疾病保险市场。[14]

在疾病保险索赔方面，兄弟会有几个办法来防范道德风险。第一，每位新申请加入的成员必须提供一份由医生开具的健康证明。第二，与私立企业不同，互助组织可以利用成员们的团结。这一点不容小觑。正如加利福尼亚州社会保险委员会（Social Insurance Commission of California）的评论所说，互助组织“互惠互利”的本质，无疑会抵消人们借装病来索赔的倾向。人在和商业机构打交道时可能会不择手段，但如果面对财政状况与自身有直接利益关联的组织，就会变得格外谨慎。互助疾病保险的历史发展证实了经济学家詹妮弗·罗巴克（Jennifer Roback）的预言：“要防范道德风险时，从内部着手比外部监督有效率的多……简而言之，在价值观相同并且共享同盟利益的人之间，逃避责任的行为更容易被发现。参保（或兄弟会）的成员之间存在着某种社会契约。”[15]

20世纪20年代，互助疾病保险逐渐开始覆盖门诊治疗。例如，宾州的“雷丁守林者”组织每年收取1美元，为成员提供医生门诊（包括出

诊）服务；“老鹰兄弟会”每年收取2美元，为成员提供产科与性病之外的一切医疗服务。互助组织分部开立的诊所在许多大城市扎根。在纽约市下东区，光犹太分支组织就雇用了500多个医生。[16]

互助组织和分支机构通常会与医生签订以人均费用为基础的合同，换取医生为成员及其家人提供治疗。这种办法与现代的保健组织极为相似，对于渴望获得客户群的年轻医生或是想做兼职的退休医生极具吸引力。一位分支医生萨缪尔·斯浮堡（Samuel Silverberg）回忆到：“兄弟会会根据一定数量的病患为单位支付我一定金额——每位成员每3个月5美分，每个家庭75美分或1美元。每位成员都有权到诊室看病或请我出诊。互助组织的成员可能会把医生推荐给朋友，我的行医对象因此就更广了。但令人头疼的是，我要在狭小的楼梯里面跑上跑下。”[17]

分支机构医疗的发展引发了业界的反对。一些医生担心这会逐步破坏其按人头收诊疗费的规矩。跟斯浮堡一样，知名医生H.T.帕垂（H.T.Partree）早期也在分支机构诊所工作。他斥责合同行医是“不体面的竞争”。帕垂不情愿地回忆道：

组织的成员只需每人每年1美元的付费，而耗费精力的大病小情的数量和种类却让人瞠目结舌。这份工作让我异常不快——一想到任何分支机构都可以这样践踏医疗服务，我就感到义愤填膺。

加州沙斯塔郡医学会（The Shasta County Medical Society of California）也是恐惧竞争的典型。该学会警告分支机构限制它们的活动范围，否则“我们的服务就将贬值成跟擦鞋儿童和零食小贩一样”。[18]

20世纪初，全国的医学会和州委员会都在试图摧毁“邪恶的分支医疗”，至少也要挫一挫后者的锐气。加州医学会（California state medical society）的众议院代表要挟要开除任何与组织签订契约提供家

庭医疗服务，并月收入超过75美元的医生。纽约州易瑞郡医学会（The Committee on Contract Work of the Erie County，New York）的合同工作委员会建议采取“非常手段”对付“屡教不改的”合同医生。[19]

移民、非裔美国人和妇女之间的互助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量移民安置美国的过程中，兄弟会和其他的互助组织扮演了无名英雄的角色。1900年，美国的前12个大城市中有40%的人口出生于国外，20%为移民的后代。每个移民人群都可以求助于一个或者多个互助组织，后者会为他们提供住房、英语课程以及招聘信息。[20]

移民群体的极高参保率，包括那些自于东欧和南欧的贫困人群，跟移民兄弟会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1918年，捷克移民最大的互助组织的会员人数就超过了150000人。1914年，马萨诸塞州移民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每个有希腊人聚集点的城镇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希腊互助会。1910年，伊利诺伊的斯普林菲尔德虽然只有不到3000名意大利移民，却有多达12个互助组织。尽管移民互助组织的增长速度很快，但反对的声音从未消散。在20世纪初，对互助会态度尤其冷淡的恰恰是激进改革派，比如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21]曾表示：

美国人应当主动为移民做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将移民置于外国政府的代表、组织的管辖，被外语媒体和机构所控制，受外国政府利益摆布，继续允许移民以社会异类的方式存在，与其他社会公民脱节，那我们就是在为未来找麻烦。[22]

兄弟会在非裔美国人中的流行程度甚至超过了移民团体。抛开最大

的几个白人组织不谈，非裔美国人组织的种类和数量毫不逊色。据社会学家霍华德·H.欧杜姆（Howard W.Odum）估计，1910年在美国南部“黑人组织的会员总数，无论是付费组织还是免费组织，都接近了教会成员的总人数……在一个有色人种居民不足500人的城镇，要找到15～20个不同组织的分支机构并不稀奇。”欧杜姆把互助组织描述为非裔美国人“核心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3]

最古老且著名的非裔美国人组织当数普林斯·霍尔共济会。据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威廉·木拉斯津（William Muraskin）估计，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该组织在整个南方的小城镇吸收了30%以上的成年非洲裔男性公民。地方和州的分支机构提供了广泛的互助服务，包括医疗保险、孤儿院、就业部门以及养老院。组织成员包括诸多非裔美国人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小亚当·克雷顿·鲍威尔[24]、奥斯卡·迪普利斯特[25]、瑟古德马歇尔[26]、卡尔斯多克斯[27]、布克T.华盛顿[28]和W.E.B.杜波依斯[29]。[30]

需要注意的是，共济会仅仅是非裔美国人兄弟会的冰山一角。像奥德费勒、麋鹿会和皮希厄斯骑士等白人组织，也有相对应的非裔美国组织。当然，也有在组织名字上跟白人组织没有瓜葛的非裔美国组织，比如“真正改革者”、“泰伯儿女”和“美国伽利略渔民总会”等。1904年，由非裔美国人创立的、与主要白人兄弟会相似的组织已经在美国各地合计有400000多名会员和8000多个分支机构。而杜波依斯在5年之前就曾估计费城第七区70%的非裔美国人参加了兄弟会或其他松散的互助会和小型保险会。[31]

兄弟会和其他的互助组织使得不同阶级的非裔美国人都能享有保险。与白人组织不同，非裔美国人的秘密组织更倾向于提供正式的人寿保险与疾病保险，再加上非正式的互助。1919年，伊利诺斯州的健康保

险委员会估计，93.5%的非裔芝加哥家庭至少有一位成员参与了人寿保险，是所有族裔中参保率最高的。紧随其后的是波西米亚人（88.9%）、波兰人（88.4%）、爱尔兰人（88.5%）和本土白人（85.2%）。多数非裔美国人从事非技术性职业，如家政服务与零工，收入较低，这更使上述数据令人刮目相看。在一个种族隔离和经济边缘化的时代，这组数据有力地证明了非裔美国人家庭的坚韧不拔。[32]

非裔美国人在芝加哥的高参保率并非偶然。1919年，在费城开展的非裔美国南部移民的调查表明，98%的家庭（排除工薪阶层）至少有一位成员参保，40%以上的家庭有成员参与互助组织。1910年，在宾州的矿业城镇宅基地中，91.3%的非裔美国家庭参加了人寿保险，仅低于斯拉夫人的93%，领先于当地白人的80%。这类统计数据给政府养老保险的主要倡导者伊萨克·鲁宾诺（Isaac Rubinow）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3年，他评价非裔美国人和移民把"通过自愿组织开展互助保险的习惯在美国发展到了极致。"[33]

虽然名为"兄弟会"，兄弟会地方分支机构成员并不限于男性。女性在兄弟会的积极作用被很多历史学家忽略了。许多兄弟会都设有女性附属机构，如共济会有"东方之星"，奥德费勒有"瑞贝卡姐妹"。美国最大的由女性管理和出资的兄弟会是"马卡比女士"。该组织称其分支机构为"蜂房"，并为会员提供包括孕妇保险的服务。这些兄弟会也帮助女性其他方面的生活。大部分兄弟会养老院允许成员的妻子或丈夫以相同的条件进入。尽管无法获得全国性的统计数据，但宾州养老金委员会（Pennsylvania Commission on Old Age Pensions）发现在州内的兄弟会与慈善养老院中，有76%的成员是女性。可见，女性是死亡抚恤金的主要受益人。[34]

互助的充分性

由兄弟会提供的互助保护是否足以满足大众的需求？要准确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多个层面着手。首先，我们必须理解这种需求体现在哪些方面。兄弟会解决了多种个人需求：民族身份认同、娱乐、搭建业务关系，并为成员提供保险与社会福利。当然，每个组织有各自的侧重目标。在研究兄弟会时，历史学家发现并没有一种“最好的方式”——组织必因其成员需要而设立。共济会和奥德费勒强调仪式的保密性与庄严性，而“马卡比骑士”和“全美匠人古会”则强调保险和保护。其他组织，如爱尔兰人兄弟会和波兰人联盟等，则将民族内部的团结视为关键。[35]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作为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保险互助会不是万能的。但它们的确为满足成员及其家庭的需要做出了扎实的工作。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互助疾病补贴覆盖了成员的患病期。死亡抚恤金也对失去家庭成员（通常是主要的收入来源）造成的财务冲击起到了缓冲作用。

对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来说，在谈论社会福利的“充分性”时，通常持太过机械的观点。充分性的问题被简化成了分配多少政府支出为好的问题。而在大萧条之前，兄弟会成员和普通美国人心中的“充分性”则远远超出金钱的范畴，事关品格、自尊和自立。正如兄弟会运动的主要声音《兄弟会观察》所说：“兄弟会主义在不侵犯他人权利的基础上，热切地关注一切有关自主、个人自由和保护个人权利的问题。”在许多场合，《观察》都对政府在社会福利中日益扩大的角色表示不满，担心这会削弱互助组织同胞的凝聚力。《观察》曾这样谴责联邦政府：“国家养老金触及了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品格。它将摧毁了我们对个人责任的信念。”[36]

如果采用以上这些不容易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充分性”的话，那么兄

弟会为会员提供的，恰恰是政府福利项目无法提供的。1904年，彼得·罗伯茨（Peter Roberts）在他针对移民矿工社区的社会研究中指出：“独立、自立和远见”是他所见的兄弟会培养的主要品质。罗伯茨还说：

工人们在分支机构中找到了乐趣，因为他们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由员工管理自己的事务也许不是最有效率的选择，但是他们从此汲取经验、学习商业技巧、了解经济世界的允许原则。这种参与的社会价值远远比经济考虑重要。[37]

值得帮助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

在大萧条以前，公众普遍关注福利制度对个人责任、品格和独立的影响，而在福利史学家眼里，这种关注不过是大惊小怪。史学家要么认为这种想法是过时的维多利亚中产阶级道德观在作祟，要么就说这是精英在图谋控制穷人。同样，史学家也看不起过去把穷人分为值得同情和不值得同情两类的做法，并普遍赞扬政府补贴穷人是满足基本人权。在卡兹（Katz）看来：“把穷人分成两种虽然方便，但却是毁灭性的。”因为这种做法掩盖了社会贫困的重要原因。受迈克尔·沃茨尔（Michael Walzer）的影响，卡兹认为这种分类是残忍地将穷人变成“慈善的物件”，剥夺穷人作为平等社会成员的权利。卡兹对20世纪前后经常做这种区分的慈善社工们的抨击尤为猛烈。[38]

卡兹和其他福利史学家对这种二分法的批评，草率地忽略了其背后的合理性。我们必须认识到，慈善工作者经常面对的是复杂和微妙的两难情况。他们分辨穷人的方法尽管不完美，却有合理的前提：与其他民生状况相似，贫困是有许多原因与解决方法的。1899年，慈善运动的杰出领袖玛丽·瑞奇蒙德（Mary Richmond）观察到：

当我们自问“谁是穷人？”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穷人之间有许多相异的特性——自私与无私、高贵与低劣、工人与寄生虫——而且在深入他们之中时，我们要认识这些人，这些看上去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要认识到这种不同可能只是琐碎且无关紧要的。在其他方面，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39]

相比之下，传统的福利史学家对于贫困的看法似乎肤浅得多。在公共政策上，他们支持的权利理论事实上就是一个简单（而且极具误导性）的信条，即“没有不值得可怜的穷人”。尽管他们本意并非如此，这种观点的效果就是把所有穷人归为无差别的群体。比起慈善组织的二分法，这种看法代表了对穷人更深层的傲慢，也对有资格享受福利，但为了保持独立而骄傲地继续工作的穷人尤其不公平。按照权利理论者的逻辑，这些想要自力更生的人，其实都是不识时务的傻瓜。

尽管如此，福利史学家有一点的确说得在理。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私人与政府的社工在调查穷人背景时，经常采取居高临下的家长制作风。这些“友好访问”的调查者俨然以受访者恩人身份自居，让人不堪其扰。[40]

鉴于这种情况，卡兹把区分式扶贫看作是“幸运儿”们的无知的产物。卡兹的批评对于慈善和福利官僚来说还算适用，但是对于兄弟会就缺乏说服力。首先，即使是那些由最穷和最受压迫的人群组成的兄弟会，也只会帮助“值得帮助”的穷人。很少有兄弟会把援助变成无条件的权利，不论其会员的阶层和种族。例如，普林斯·霍尔共济会的乔治亚分会宪章这样规定的：“任何脏话连篇、放荡、酗酒或者道德上有罪的人都将被剥夺会籍。”[41]

威廉·穆拉斯基（William Muraskin）把这种限制理解为受压迫群体

试图赢得主流社会尊重的尝试。正因为如此，兄弟会才会引入占统治地位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产阶级道德。然而，这一观点严重缺乏说服力。例如，激进工会组织在互助计划中也采取相似的限制，这如何理解？西部矿工联合会（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前身）就规定，成员“遭受的事故或疾病若是由缺乏节制、轻率或不道德行径导致”，该联合会将拒绝提供帮助。矿工联合会是由社会主义者和自我觉醒的工人阶级组成，为何会屈从于“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当然，史学家还有最后一招，就是将支持这类限制的工人们归为“虚假觉醒”或“故弄玄虚”的受害者——他们一定是被欺骗了。然而，这无非是历史学家把现实世界理解成了大家各取所需的理想化模型。这种理想化世界与现实世界在两点上极端不符：后者存在资源稀缺的现象，并且承认人类的行为经常是具有自毁倾向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不过是试图把稀缺的资源用在不自我毁灭的个体上罢了。[42]

如果从这一角度分析，要在慈善和福利制度制定的扶贫资格和兄弟会的规矩上找到共同点是徒劳的。慈善和政府福利并非拿错了细节，而是拿错了方向。他们作为局外人，无法明白过穷日子的真相。与现代福利国家的官僚们相似，20世纪早期的慈善机构工作者们从未理解真正穷人的生活条件，也未完全赢得他们的尊重。因此，穷人对发放救济品，但又毫无人情味、充满官僚色彩的体系产生怨恨与疑虑，也就不足为奇了。[43]

慈善与福利救助的限制原则，都是围绕着捐助者与受助者间的敌对关系产生的，而互助组织则以互惠互利为原则。实际上，捐助者与受助者间敌对性似乎是所有济贫体系（无论公共或私人掏钱，不管受益人基于权利或经济状况）的通病——这些济贫体系都是由官僚和其他局外人（包括纳税人）控制并资助的。而在互助组织中，捐助者与受助者的关

系平等，成员们经常彼此熟识。当然，兄弟会在确定扶贫资格的时候也会有些制造紧张和过度简化的情况，但是都达不到福利官僚和慈善机构那种居高临下、贬低人格的程度。这里面最关键的原因是，互助组织谁该谁不该得到帮助，通常是穷人自己说了算。

当然，互惠的想法必须基于成员与组织内部的相互责任。这完全不同于把受捐看作单方权利的想法。为了强调这一点，《兄弟会观察》的编辑沃特·巴斯耶（Walter　Basye）写到："兄弟会跟宗教或储蓄银行相似，付出越多，回报越多。在互助会的银行中，最好的存款就是发自内心的兴趣与支持。"[44]

虽然兄弟会的社会福利是有条件的，但这种限制与慈善机构有很大区别。兄弟会的领导者跟现代福利史学家一样，痛恨家长式的慈善活动。皮希厄斯有色骑士的手册写到："我们生病的兄弟不能被送到冰冷的公共慈善手上。在这里，我们要照看我们的兄弟。正因为他们一直在贡献，所以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堂堂正正索要这笔钱，而不是卑躬屈膝向那些慈善组织伸手。"1910年，一个墨西哥美国人的兄弟会（Mutualista）杂志骄傲地宣布："不管我们有多穷，你也见不到墨西哥乞丐。墨西哥人无论年纪和社会教育背景，都会努力工作，有尊严地养活自己。"[45]

兄弟会对于扶助范围的限制，正是基于团结一致的道德感。兄弟会会帮助有这种道德感的会员，就像工会只帮助守规矩的成员。在工会中，违反约定（如不缴纳会费或在罢工期间出勤）的成员将自动失去福利。与工会不同的是，互助组织不能频繁地以暴力强制那些不听话的会员，而必须完全依赖成员的自愿服从和道德制裁。

互助，过去与现在

关于互助和自助的大量历史记载，与如今穷人的社会与经济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考虑到住房质量、工资和日用消费品的条件，20世纪初的贫困人口可能十分羡慕如今的“底层阶级”。然而，从在社区联系的强度、治安状况、家庭团结、个人独立性和对未来的希望上看，事情却刚好相反。后面这些指标虽然不容易量化，对于人的发展和幸福却是至关重要的。[46]

在我看来，社会学家威廉·尤里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提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尽管威尔逊拒绝重返福利国家时代之前的有限政府角色，但他一再指出了显著下滑的贫民窟居住条件。他写到：“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哈莱姆区及其他贫民街区的黑人，可以在炎热的夏夜毫不担心地露宿于公园、紧急出口和屋顶，白人则可放心地出入市中心的酒馆与夜店。当时也有犯罪，尽管这个极度贫困的社区从未出现居民惧怕夜行的现象。”[47]

詹姆斯·博彻特（James Borchert）同样也提到了老城区在过去与现在的对比。在《华盛顿小巷生活》（Alley Life in Washington）一书中，他详细地评论了20世纪早期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中非裔美国人和白人贫民依赖心理缺失。正如博彻特所言，这些地区的居民“并不都是国家的马前卒。他们为个人的生活负责。他们不是‘福利骗子’。他们展现了骄傲、独立和力量……与学者与改革者描述的混乱与病态相反”，他们“可以在新的环境中维护古老的文化特征，并在必要时进行适应和调整。”博彻特把这种状况归因于大量的家庭、自助以及贫民窟内部的“安全网”式互助。[48]

从互助到福利国家[49]

尽管史学作品很少描述（或者证实）互助组织的衰落，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互助组织的核心部分——兄弟会的成员数量一直在急剧减少，不管是在贫困阶层还是在中产阶级中。白人保险互助会的主要会员来自国家兄弟会大会下辖的组织。1906年，大会的会员组织拥有91434个分支机构。1925年，会员组织达到鼎盛的120000个。随后，分支机构的数量趋于水平并有所下降。下降的速度在大萧条期间略有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加速下降。到1986年，大会仅存52655个分支机构。仅在20世纪70年代，大会就损失了20%以上的分支机构。尽管部分兄弟会的情况略好，但是最大的几个白人秘密组织，包括共济会、奥德费勒和皮希厄斯骑士等，遭遇了最严重的衰退。[50]

要追踪非裔美国人互助组织的命运就更困难了。跟白人的互助组织相比，非裔美国人组织的数据零零散散。根据许多偏主观的衡量标准，我们大约知道非裔美国人组织的会员数量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在大萧条时期开始衰退。最有名的非裔美国人组织普林斯·霍尔共济会曾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有所回转，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又再度一蹶不振。[51]

即便如此，大萧条期间及之后，非裔美国人互助组织仍保持着强劲的势头。1934年，社会学家盖伊·约翰逊（Guy Johnson）观察到："在南方的黑人社区，一般都有两种以上的教会和2～20种秘密兄弟会组织。"10年后，加纳·麦达尔（Gunnar Myrdal）里程碑式的研究《美国的难题：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的结论认为，各个阶级的非裔美国人参加兄弟会的意愿都要高于白人。据他估计，仅在芝加哥一个城市，就有超过4000个组织来满足城市中275000个黑人市民的需求。[52]

然而，麦达尔并没有赞美非裔美国人自我组织的盛况——他把互助组织看作问题所在。麦达尔认为，非裔美国人兄弟会是对白人社会组织绝望的模仿，也是社会病态的映射。麦达尔宣称："尽管大多数黑人来自中下阶层，但他们比白人更愿意加入组织，在这一点上，黑人已经被显著地"美国化"了。在麦达尔看来，大多数黑人组织是"白费力气"。然而，假如让麦达尔时光穿梭到今天，让他亲眼看看当下贫民在城市公共住房项目中与人隔绝地的惨状，是否会改变他的观点。[53]

现有的研究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互助机构会在过去的50年突然衰退。相关文献充满了粗略和主观的猜测。最流行的解释是互助会的保险设计上存在的问题——据信，在1870—1910年建立的大部分互助组织，都对其保险机制做出了错误的计算。起初，无论风险或年龄如何，所有会员都缴纳相同的保费。一开始，这一体系运作良好，但是随着老年会员的增加，抚恤负担越来越重。会内的死亡率升高，会费也越来越贵，这导致一些低风险的年轻会员退会。1910年后，大型的兄弟会开始了痛苦的转型，将保费改革成凭风险计算。国家也立法加速这一过程。这种转型的结果，导致许多（本来可以继续有效运作的）小型非裔美国人互助会的解散。[54]

理查德·德·莱斯美斯·奇普（Richard de Raismes Kip）和J.欧文·斯德尔森（J.Owen Stalson）等学者认为：来自广播、电视、电影等娱乐手段的竞争加剧了互助会的人员流失。这一说法在解释秘密组织命运可能说得通，但是却不适用于保险互助会。毕竟，保险互助会的卖点是保险（起码传单上是这么写的），而不是提供会员娱乐。另外，只关注娱乐手段转变的学者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很多人选择参加兄弟会保险会，而不是非保险性质的俱乐部和秘密组织。而且如果娱乐是互助会的主要卖点，那为什么还要不遗余力地维持昂贵的保险项目

呢？[55]

此外，法律和强制性的因素可能使兄弟会的处境雪上加霜，使它们不能有效对抗私人和政府竞争者。到20世纪20年代，医学会通过限制性上岗证和证书屏障，成功地打败了分支机构诊所和其他合同医疗机构。这不仅导致整个医疗费用的上涨，而且遏制了兄弟会在医疗保险上的扩张。[56]

罗杰·L.蓝森（Roger L.Ransom）和理查德·萨奇（Richard Sutch）对立法干预互助组织的论述颇具启发性。他们指出，州政府对一些特定的保险形式的禁止——比如唐提式（Tontine）保险[57]——让消费者愈发依赖雇主提供的保险计划以及社会保障之类的政府保险计划。蓝森和萨奇的理论与目前可见的历史事实吻合，但还需要进一步充实。[58]

学界在解释福利国家的崛起和互助组织衰落的因果关系上也差强人意。不过目前清楚的是：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互助组织的衰落与政府社会福利作用的扩张是同时发生的。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介入（超过传统济贫所的范畴）在罗斯福新政之前就已经可见。大萧条开始时，大多数州施行了工人补偿金法律以及孕妇补贴。1913年，美国有20个州实行孕妇补贴；到1931年，这一数量已达46个州。20世纪30年代联邦政府第一次实质性介入社会保障领域，就是如今的美国社保（Social Security）和儿童补助计划（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ADC）。[59]

尽管政府干预的崛起和互助金的衰落有明确的相关性，要说它们具有因果关系仍需进一步的证据。常识告诉我们因果关系很可能存在。历史上的互助组织无不是应需而生。通过窃取原先由自愿性质的社团负责的社会福利责任，政府大大地破坏了对互助组织的需求。从这点出发，有大量详实的实例证据可供历史学家仔细考察。比如，随着20世纪一二

十年代官方工人补偿金的到来，那些在工作场所，由工人自己组织的各个互助工业意外保险应声退出。不止如此，由于工人补偿金的资金直接流向了雇主选择的医疗计划，互助组织提供的类似服务也就面临尴尬的处境。[60]

尽管卡兹为福利国家辩护，但他也怀疑政府的转移支付计划对穷人互助组织的衰落大有影响。他看到在福利国家之前，穷人们依赖于“一系列复杂的、交互的网络”来获得帮助，这些网络“基于感情的互惠关系，以及穷人之间自发、卓越的慷慨行为”。卡兹还指出，联邦政府的福利计划导致“这些在老城区社区中的支撑网络被削弱，使贫困和无家可归的现象加剧。”[61]

互助组织的衰落和另外一个重要的社会福利机制——家庭的命运也需进一步研究。和互助组织少得可怜的历史文献相比，非裔美国人的家庭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是研究的大热点。最为人所知的研究仍然是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的《奴役与自由中的黑人家庭，1750—1925》。其中，古特曼质疑了丹尼尔·帕特里克·摩尼汉（Danniel Patrick Moynihan）1965年的结论（这一结论在某些圈子里仍然流行）。摩尼汉认为，被奴役的经历使得非裔美国人家庭极端“缺乏组织”，并且无法应对社会变化。古特曼利用大范围本地人口调查数据得出的结论是：至少到20世纪20年代，非裔美国人双亲家庭数量一点不比白人少。尽管跟白人相比，非裔美国人育有更多私生子，但是一般也把单亲和孩子算入家庭体系。然而，1983年的美国居然有41.9%的非裔美国人家庭没有男性户主。古特曼的研究显示，当下非裔美国人家庭中极高的单亲家庭比率并不是奴隶制的遗产，而是20世纪的产物。[62]

尽管很少有贫困的非裔美国人是双亲健全的，但这个现象本身并不能清楚地表明家庭破裂的加速。最近关于非裔美国人家庭的研究已经明

确表明，在一些困难的历史背景下，单亲家庭和松散大家庭很好地取代了双亲家庭的角色。一个更准确的“破碎”家庭的指标，是一个家庭（无论组成如何）有多依赖单方面的援助和救济。一旦有这么一个更准确的指标，我们就发现，自大萧条时代起，就有大量的家庭是“破碎”的。最显眼的依赖性增长，开始与六七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福利申请（不是像兄弟会这样的互助机构，而是向政府）。1931年，93000个家庭申请了单身母亲养老金（不到美国总人口1%）。而现在，有380万美国人仰仗这种援助，每5个非裔美国人家庭里的1个。[63]

由互助组织和自救到福利国家的转变，并不仅仅是从一个机构到另外一个机构的账簿交接。就像兄弟会的领导人担忧的那样，兄弟会消亡带来的损失远非金钱所能衡量。过去兄弟会的互利和自律被家长式的依赖所取代。福利国家的崛起不仅带来自我管理的互助机构的衰退，也给了冷漠的官僚体系占领供应福利的机会。[64]

注：

[1] 对兄弟会成员数量的估计来自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Research Committee on Social Trends，*Recent Social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vol.2（New York:McGraw-Hill，1933），p.935。美国的人口数据来自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pt Ⅰ（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pp.15-20。《近期社会趋势》（*Recent Social Trends*）中的数据对兄弟会成员做出了粗略而有效的估计。然而，出于谨慎说几句。由于没能赔偿那些参加了不止一个组织的人，这些数据高估了兄弟会的成员。另一方面，因为未能把为数众多的组织（多数由非裔美国人和移民在运营）和在邻里和职业层面运作的当地救济团体的成员计算在内，这些数据又低估了兄弟会成员。在救济

团体省去了互助的同时，他们缺乏兄弟会小屋和仪式的特征。欲更多了解救济团体，参见：Charles Richmond Henderson，*Industrial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8），pp.63-83.

[2] 关于仪式的功能作用，最好的讨论仍然是Noel P.Gist，“Secret Societies: A Cultural History of Fraternalism，”*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udies* 15（October 1，1940）。另见Marc C.Carnes，*Secret Ritual and Manhood in Victorian America*（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3] 参见Walter Basye，*History and Operation of Fraternal Insurance*（Rochester:the Fraternal Monitor，1919），pp.35–36: Lynn Dumenil，*Freemasonry and American Culture*，1880—1930（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225，22.

[4] 参见Lynn Dumenil，*Freemasonry and American Culture*，1880—1930，p.21.

[5] 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Care of Aged Persons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i ce，1929），pp.162，15，163；以及Lynn Dumenil，*Freemasonry and American Culture*，1880—1930，p.20.1929年，该局鉴定了112个给老年成员的兄弟之家，绝大多数是秘密社团为贫困成员经营的，为超过7000人提供了住房。一些保险互助会也建立这样的家，但一般来说他们更为依赖保险来帮助他们的老人。至于兄弟孤儿院，参见：C.W.Areson and H.W.Hopkirk，“Child Welfare Programs of Churches and Fraternal Orders，”*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21*（September 1925），pp.85–95.

[6] 参见Harris Dickson and Isidore P.Mantz，“Will the Widow Get Her Money? The Weakness in Fraternal Life Insurance and How It May Be Cured，”*Everybody’s Magazine 22*（June 1910），p.776.

[7] 参见Este Erwood Buffum，Modern Woodmen of America: A History，vol.2（Modern Woodmen of America，1935），p.5；以及Peter

Roberts，*Anthracite Coal Communities:A Study of the Demo-graphy*，*the Social*，*Educational and Moral Life of the Anthracite Regions*（New York:Macmillan，1904），p.309.

[8] 参见Walter Basye，*History and Operation of Fraternal Insurance*，pp.15–16，以及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pt.1，p.168.

[9] 参见Illinois Health Insurance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Illinois Health Insurance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1919），224–25.

[10] 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Care of Aged Persons，158，以及New York Commission on Old-Age Security，*Report of the 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Albany:J.B.Lyons，1930），pp.312–13.引自：Carolyn L.Weaver，*The Crisis in Social Security:Economic and Political Origin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82），pp.41–42.到1928年，大约14%的劳动力在私人养老金计划之内。有效私人养老金计划的总数在大萧条早期最糟糕的几年实际上增长了。老人严重依靠贫困救济的普遍看法——这是在社会保障建立前后被广泛宣传的——是一个神话。在1923年，只有不到1%的老人居住在救济房里，和1880年是差不多的。参见Carolyn N.Weaver，*The Crisis in Social Security*，pp.48，63.

[11] US Department of Labor，Children's Bureau，*Mothers'Aid*，1931（Washington，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3），pp.8，17；and Michael B.Katz，*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A Social History of Welfare in America*（New York:Basic Books，1980），p.xii.最近关于当地白人兄弟会，如奥德费勒兄弟会、皮西厄斯骑士会、联合工人古老秩序会，的工人阶级会员的频率的文献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参见Mary Ann Clawson，*Constructing Brotherhood:Class*，*Gender*，*and Fraternali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87–110.

[12] *Report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Sacramento:California State Printing Office，1917），pp.81，

89；and *Report of the Illinois Health Insurance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pp.464.1919年，伊利诺伊州健康保险委员会估计，芝加哥25.8%的打工人员有关于疾病的投保（多数在兄弟会），针对残疾的有23.7%。大多数兄弟会不提供正式保险，通常是用临时性方法来处理成员的健康问题。*Report of the Illinois Health Insurance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pp.216，218，221.

[13] *Report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Commission*，82，89，302: *Report of the Illinois Health Insurance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pp.123，474；以及Peter Roberts，*Anthracite Coal Communities*，pp.309–10.1929年，美国约9%的工业从业人员因为疾病损失8个及8个以上的工作日。US Public Health Service，*Public Health Reports 47*（January 15，1932），pp.136.

[14] 我感激珍妮弗·洛巴赫（Jennifer Robach）指出兄弟会在处理道德风险上可能的优势。参见她的“Social Insurance in Ethnically Diverse Societies，”mimeograph，Center for Study of Public Choice，George Mason University，October 1989.更多关于商业公司对提供健康保险的早期试验，和接下来他们遇到的道德危机，参见Frederick L.Hoffman，*History of 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1875—1900（Prudential Press，1900），pp.6–62.1909年，著名的保险高管约翰·德莱顿，一个并非是兄弟会鼓吹者的人，声称“确保患病期间规定的总和只能是拥有完善的知识和对个人成员完全监督的兄弟会组织，兄弟会组织能安全地并且只能以有限的方式执行。”John F.Dryden，*Addresses and Papers on Life Insurance and Other Subjects*（Newark:The 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 of America，1909），p.32.

[15] 参见*Report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of California*，p.110，and Jennifer Roback，“Social Insurance in Ethnically Diverse Societies，”p.10.

[16] 参见James G.Burrow，*Organized Medicine in the Progressive Era:The Move Toward Monopol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pp.121–123.

[17] Samuel Silverberg，参见George Rosen，“Contract or Lodge Prac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edical Attitudes to Health Insurance，”*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67*（April 1977），pp.374–175.

[18] 参见H.T.Partree，“Contract Practice: Its Ethical Bearings and Relations to the Lodge and Industrial Insurance，”*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Medicine 10*（December 1909），p.596；以及James G.Burrow，*Organized Medicine in the Progressive Era*，p.126.

[19] 参见George Rosen，“Contract or Lodge Prac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Medical Attitudes to Health Insurance，”p.378；以及James G.Burrow，*Organized Medicine in the Progressive Era*，pp.128，131.

[20] Samuel P.Hays，*The Response to Industrialization:1885–1914*（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p.95.

[21]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年），美国第26任总统。——译者注

[22] 参见Hace Sorel Tishler，*Self-Reliance and Social Security，1870–1917*（Port Washington:National University Publications，1971），p.95.更多关于特定移民团体的兄弟会（和相关的互助组织），参见：David M.Emmons，*The Butte Irish:Class and Ethnicity in an American Mining Town，1875–1925*（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9），pp.94–132:Michael R.Weisser，*A Brotherhood of Memory:Jewish Landsmanshaftn in the New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5）；William I.Thomas，*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vol.2*（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58），pp.1578–1643；以及Humbert S.Nelli，*Italians in Chicago，1880–1930:A Study in Ethnic Mobi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p.156–99.

[23] 参见Howard W.Odum，*Social and Mental Traits of the Negro:Research in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Negro Race in Southern Town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10），pp.102–103，109，99.

[24] Adam Clayton Powell Jr.，牧师，纽约市第一位黑人议员。——译者注

[25] Oscar DePriest，民权领袖，第一位非南方众议院，来自伊利诺伊州。——译者注

[26] Thurgood Marshall，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位黑人大法官。——译者注

[27] Carl Stokes，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市长，美国第一位非洲裔大城市市长。——译者注

[28] Booker T.Washington，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美国19世纪末最重要的黑人领袖。——译者注

[29] W.E.B.Du Bois，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民权运动领袖，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30] William A.Muraskin，*Middle-class Blacks in a White Society: Prince Hall Freemasonry in Americ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118，133–59，54–56.

[31] Booker T.Washington，*The Story of the Negro*，*The Rise of the Race from Slavery*，vol.2（New York:Negro Universities Press，1969），pp.148–70；W.E.B.Du Bois，*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Negro Americans*（Atlanta:Atlanta University Press，1907），pp.109，115，122；and W.E.B.Du Bois，*The Philadelphia Negro:A Social Study*（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7），pp.185–86，221–27.墨西哥裔美国人同样形成了如共济会和世界护林者这样的“白人”组织的墨西哥版本。然而，大多数墨西哥裔美国兄弟社团（mutualistas）并没有白人的直接对应版。Jose Amaro Hernandez，*Mutual Aid for Survival: The Case of the Mexican American*（Malabar，Florida:Robert E.Krieger Publishing Co.，1983），pp.65–66.

[32] 参见*Report of the Illinois Health Insurance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p.222.

[33] Sadie Tanner Mossell，“The 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One Hundred Negro Migrant Families in Philadelphia，”*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98*（November 1921），p.200；Margaret F.Byington，*Homestead:The Households of a Mill Town*（New York:Charities Publication Committee，1910），p.91；and Hace Sorel Tishler，*Self-Reliance and Social Security*，1870–1917，p.96.非裔美国人寿险的高持有率持续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1967年，密歇根大学研究调查中心发现，在每个收入群体里非裔美国人持有寿险的百分比都比白人高。大约80.33%的非裔美国人家庭持有某些寿险，相比之下白人家庭为77.5%。更为近期的估计更难获得，但是，依据1967年开始的福利国家的快速扩张，发现相应的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的保险比率发生了改变是很有趣的。参见Roland W.Bailey，ed.，*Black Business Enterprise: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New York；Basic Books，1971），p.167.

[34] 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Monthly Labor Review 28*（March 1929），pp.421，424；Charles W.Ferguson，*Fifty Million Brothers:A Panorama of American Lodges and Clubs*（New York:Farrar and Rinehart，1937），p.144；and *Report of the Pennsylvania Commission on Old Age Pensions*（Harrisburg，1919），p.67.

[35] 爱尔兰人当然是指爱尔兰裔美国人。参见Michael F.Funchion.ed.，*Irish American Voluntary Organizations*（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38），pp.51–61.

[36] *Fraternal Monitor* 22（December 1，1911），p.16；and *Fraternal Monitor* 19（January 21，1908）:p.10–11.

[37] 参见Peter Roberts，*Anthracite Coal Communities*，pp.263–264.

[38] 参见Michael B.Katz，*In the Shadow of the Poorhouse*，p.291；以及Katz，*The Undeserving Poor: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Welfare*（New York:Pantheon，1989），pp.179–80，184，239.

[39] 参见Mary E.Richmond，*Friendly Visiting among the Poor:A Handbook for Charity Workers*（Montclair，NJ: Patterson Smith 1969），pp.11–12.

[40] 关于慈善组织在20世纪早期的调查方法，参见Walter I.Trattner，*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A History of Social Welfare in America*（New York:Free Press，1989），pp.89–92.

[41] Michael B.Katz，*The Undeserving Poor*，p.184；以及William A.Muraskin，*Middle Class Blacks in a White Society*，p.46.内战之前北方自由的非裔美国人之间的兄弟会也受到了类似的限制。1832年，一个非裔美国人团体观察到，在费城，“那些兄弟会的成员们受到规章制度的限制，这往往促进了他们之中的工业和道德。对于任何无视或违反这些规则的放纵和任何形式的不道德行为，该成员可以被留会查看或开除。Leonard P.Curry，*The Free Black in Urban America，1800–1850:The Shadow of the Drea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p.203–4.

[42] 参见William A.Muraskin，*Middle Class Blacks in a White Society*，p.84–85；and Alan Derickson，*Workers'Health*，*Workers'Democracy:The Western Miners'Struggle*，*1891–1925*（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p.66.

[43] 我相当感激珍妮弗·弗里德曼（Jeffrey Friedman）指出基于敌对关系的慈善援助与限制和这些在以互惠关系为中心的兄弟会那里的对比。

[44] 参见Walter Basye，*History and Operation of Fraternal Insurance*，p.20；以及Michael B.Katz，*The Undeserving Poor*，p.179.根据特伦斯·奥唐奈（Terence O'Donnel），兄弟互助会的“团队精神”是其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其远远优于纯粹的商业公司可以要求的“善意”。Terence O'Donnell，*History of Life Insurance in its Formative Years*（Chicago:American Conservation Company，1936）.

[45] 参见*History and Manual of the Colored Knights of Pythias*（Nashville:National Baptist Publishing Board，1917），pp.448–

449；以及Jose Amaro Hernandez，*Mutual Aid for Survival*，p.93.

[46] 关于互助组织衰落的一些后果的一个有见地的看法，参见Charles Murray，*In Pursuit:Of Happiness and Good Government*（New York:Simon and Shuster，1988）.

[47] 参见William Julius Wilson，*The Truly Disadvantaged:The Inner City，The Underclass，and Public Poli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3.

[48] James Borchert，*Alley Life in Washington:Family，Community，Religion，and Folklore in the City，1850–1970*（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0），pp.98，215–217.

[49] 我从David G.Green and Lawrence Cromwell，*Mutual Aid or Welfare State:Australia's Friendly Societies*.那里借用了这一节的标题。该兄弟会是美国兄弟会的澳大利亚（和英国）版本。

[50] *Statistics of Fraternal Benefit Societies*（1906—1986）.关于领先的秘密社团的衰落，参见：Noel P.Gist，"Secret Societies: A Cultural History of Fraternalism，"pp.42–43；Lynn Dumenil，*Freemasonry and American Culture*，1880—1930，p.225；以及Alvin J.Schmidt and Nicholas Babchuk，"Formal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and Change Over Time: A Study of American Fraternal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Action Research 1*（January 1972），p.49.

[51] 参见Gunnar Myrdal，*An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1944），p.953；Edward Nelson Palmer，"Negro Secret Societies，"*Social Forces 23*（December 1944），p.211，以及William A.Muraskin，*Middle-class Blacks in a White Society*，p.29.

[52] 参见Guy B.Johnson，"Som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gro So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0*（November 1934），p.336；以及Gunnar Myrdal，*An American*

Dilemma: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p.952.在过去30年里，对志愿组织的一些调查也记录了兄弟会成员的百分比。在加利福尼亚州长滩市中部，一份1966年的调查发现，14.6%的白人属于兄弟团体，相比之下，非裔美国人是27.5%。S.John Dackawich，“Voluntary Associations of Central Area Negroes，”*Pacific Sociological Review 9*（Fall 1966），p.77。在1967年佛罗里达州坦帕市，8%的非裔美国人属于“互助”支部，而11%属于“常规”支部。白人的百分比没有制成表格。Jack C.Ross and Raymond H.Wheeler，*Black Belonging:A Study of the Social Correlates of Work Relations Among Negroes*（Westport:Greenwood Publishing Company，1971），pp.106–8。在1969—1970年的德克萨斯州奥斯丁市，兄弟会成员的数据是非裔美国男性为16.9%，而非裔美国女性为13.3%，对应白人男性为10.3%，而白人女性为2%。J.Allen Williams，et al.，“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Minority Statu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nglo，Black，and Mexican American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October 1973），p.644。在1972年的纽约市，兄弟会代表有7%的非裔美国男性和2%的非裔美国女性，相比之下白人男性为12%，而白人女性为3%。Steven Martin Cohen and Robert E.Kapsis，“Participation of Blacks，Puerto Ricans，and White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s:A Test of Current Theories，”*Social Forces 56*（June 1978），p.1063.

[53] 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麦达尔对非裔美国兄弟会是模仿的解释。尤其参见Betty M.Kuyk，“The African Derivations of Black Fraternal 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5*（October 1983），pp.559–592.库伊克（Kuyk）援引了非裔美国人兄弟会从他们的祖先那里大量借用仪式和组织形式的证据。

[54] John Chodes，“Friendly Societies:Voluntary Social Security and More，”*The Freeman 40*（March 1990），p.98；以及Walter Basye，*History and Operation of Fraternal Insurance*，pp.113–122.

[55] Richard De Raismes Kip，*Fraternal Life Insurance in America*（Philadelphia:College Of set Press，1953），pp.182–83；以及J.Owen Stalson，*Marketing Life Insurance: Its History in America*（Bryn

Mawr:McCahan Foundation，1969），pp.460–461.一个寻找各种互助会广告的好地方是兄弟会会刊。

[56] 关于20世纪20年代合同实行的衰落，参见John Duffy，*The Healers:The Rise of the Medical Establishment*（New York:McGraw，1976），pp.198–199.

[57] 即联合养老金制，是一种集资办法。所有的参加者共同使用一笔基金，每当一个参股者死后，剩下人得到一份增加的份额，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或过了一定时间依然活着的人获得剩下的所有金额。由于是一种寿险和赌博的混合物，被宣布为非法。——译者注

[58] 参见Roger L.Ransom and Richard Sutch，"Tontine Insurance and the Armstrong Investigation: A Case of Stil ed Innovation，1868–1905，"*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June 1987），p.390.

[59] 参见Walter I.Trattner，*From Poor Law to Welfare State*，pp.202–205.

[60] 关于互助会对工人事故和伤残保险赔偿的缓冲作用，参见US Department of Labor，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Monthly Labor Review 25*（July 1927），p.20；*Monthly Labor Review 28*（January 1929），p.74；以及Pierce Williams，*The Purchase of Medical Care Through Fixed Periodic Payment*（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32），pp.278–279.

[61] 参见Michael B.Katz，*The Undeserving Poor*，pp.190–191.

[62] Herbert G.Gutman，*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1750–1925*（New York:Pantheon，1976）；Daniel Patrick Moynihan，*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Washington，D.C.: Office of Policy Planning and Research，US Department of Labor，1965）；and William Julius Wilson，*The Truly Disadvantaged*，p.65.在过去的10年中，古特曼之外的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发现了证实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同时存在于北方和南方的非裔美国人双亲家庭的流行。对于文献的总结，参见James Borchert，*Alley Life*

in Washington，pp.57–99；and William Julius Wilson and Kathryn N.Neckerman，“Poverty and Family Structure: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Evidence and Public Policy Issues，”in Sheldon H.Danziger and Daniel H.Weinberg，eds，*Fighting Poverty: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232–259.

[63]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pt.1*，，p.15；US Department of Labor，*Mothers'Aid*，1931，p.3；*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53*（August 1990），p.37；以及Nathan Glazer，*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p.43.人类学家卡洛尔·史塔克（Carol Stack）提供了涉及衡量“家庭生活的稳定性和集体力量”的一个相当有用的框架。史塔克（他的观点类似于《调节贫困》中的观点）把家庭定义为“由亲戚和日常来往的非亲属组成的最小的组织和持久的网络，并为其内部的孩子们提供需求并保证他们的生存。”Carol B.Stack，*All Our Kin:Strategies for Survival in a Black Communit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4），pp.31，90.

[64] 派文和克劳德不仅是描述，而且是赞扬了他们的理解，因为今天的穷人有更大的意愿去寻求对政府援助的依赖，而不是靠自己的资源或者接受可用的工作机会。Frances Fox Piven，Richard A.Cloward，Barbara Ehrenreich，and Fred Block，*The Mean Season*，pp.21–22.目前的（至少是派文和克劳德所描述的）态度和詹姆斯·博切特（见上文）在他对前福利国家时代的非裔美国人和白种贫民窟居民的描述所展示的截然不同，他们强烈地厌恶慈善和贫困救济依赖。用依赖的关系替代互惠的一个副产品一直是著名的“工作伦理”的衰落。许多历史学家都注意到了在穷人和中产阶级中从前占支配地位的工作伦理价值。尤其参见Daniel T.Rodgers，*The Work Ethic in Industrial America*，1850—192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p.168–70.在许多方面，更多地接受依赖关系的更大接受遵循着社会各阶层（农民、存贷管理人员等）之中的一个更大趋势。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

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Section 3　福利国家、金融危机与债务危机

THE WELFARE STATE，THE FINANCIAL CRISIS，AND THE DEBT CRISIS

> 当纽约时报最近问他在当时是否可以做些什么能使得结果有所不同的时候，他回答：“如果我有更好的先见之明的话，我可能会把事情做得稍微好些。但是老实说，如果我能完全预见这一切的话，那么在一开始我就绝不会接受这份工作。

福利国家本质是庞氏骗局

麦克·坦纳

“现收现付”之所以对政客深具诱惑，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在系统崩溃之前“光荣退休”。随着融资系统逐渐成熟，向系统贡献财源的工作人数会逐渐减少，这导致国家社保系统的收支鸿沟日益扩张。在世界各地，政府的养老金系统和政府运营与维护的医保系统都趋近崩溃的边缘。大量无准备金的负债将让今日的年轻人在未来不堪重负。本文作者麦克·坦纳（Michael Tanner）是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曾出版《右派利维坦：大政府如何搞垮共和党革命》《福利制度之无能：公民社会中的互帮互助》等书。

撒切尔夫人曾讥讽现代福利国家所遇到的困境：“他们总是能花光别人的钱。”对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说，此话一语成谶。所谓的“欧猪五国”（PIIGS，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正遭遇着最紧迫的经济危机，新闻头条也充斥着关于危机的报道。即便像法国和德国这样经济相对坚挺的国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尽管法、德两国未像其他国家那样，使用昂贵的经济刺激手段来应对经济衰退，法国的赤字仍在2010年达到了本国GDP的7.1%，而德国的赤字也攀升至GDP的4.3%。赤字加深了政府的债务，而这些债务每年都要吃利息。法国的国债总额占GDP的81.7%，德国的国债总额占GDP的83.2%，英国国债最高时曾占GDP的68%。实际上，以目前英国国债的上升速度，到2040年，仅支付国债利息一项，就需要花掉英国GDP的27%。

如果将国债细化到个人身上的话，每一位德国在职人员身负42000

欧元的国债；每一个英国家庭承受着惊人的90000英镑的国债；每一个法国人都负担着24000欧元的国债。

此外，在当前的计算方法下，由于国家养老金系统和社保体制的无资金准备负债不计入国债总额，使得这些国家债台高筑的情况被严重低估。欧洲国家的平均无资金准备负债占据了GDP的285%。在某些国家，这些隐性负债在未来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以希腊为例，假如希腊承担起未来的一切无资金准备债务，其债务总量就将超过其GDP的875%，接近年生产总值的9倍。如果将当前法国承诺分发的养老金考虑在国债内，法国的债务总量就会大涨到当年GDP的549%。而德国若是完全负担起无资金准备债务，其债务总量将会飞升至GDP的418%。

这样的预算失衡（政府预算和税收之间差额的当前估值）必将求诸以下办法来综合解决：幅度惊人的加税、直接撕毁承诺（取消债务，削减福利或者两者皆有）或使用通货膨胀手段间接逃债，即由中央银行发行更多的货币来填补缺口使债务贬值（这样的通货膨胀会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将在穷人身上强加与之不相称的经济负担，而他们恰恰是最付不起“通胀税”的人）。诺丁汉大学教授理查德·迪士尼（Richard Disney）预测，若使当前社会福利政策保持原样，欧洲国家必须将税收提升GDP的5%~15%（注意：这不是指当前税收的5%~15%，而是指GDP的5%~15%）来保持收支平衡。这意味着，税收将吞噬每年GDP的45%~60%。而这仅仅能够避免新的债务，无法缩减已有债务。

简而言之，欧洲国家不可能通过加税的手段来解决危机。

上文所讨论的数字尽管十分惊人，但是过多关注地税收和债务会导致一叶障目。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反复强调，不管是通过债务还是税

收，真正的议题不是如何开源，而是如何节流，缩减政府开支。

如今，欧盟各国政府开支平均占GDP的52%有余。虽然政府开支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福利开支——政府毕竟还起到他的重要作用——社会福利开支仍然是欧洲国家的政府支出的主流。转移支付开支如今是大多数欧洲国家最大的开支项目，而社会福利支出占欧盟国家总支出的比例超过42%。巨额债务只是表象，福利制度才是祸根。

美国的状况同样糟糕。事实上，只有希腊和爱尔兰两个欧洲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总额的百分比超过美国。美国的负债总额也同样不容乐观，如今已超过15.3万亿美元，占GDP的102%。只有4个欧洲国家比美国负债更多：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即便保守估计，根据奥巴马医保法案中对老年人医保开支的预测，未来社保和医保造成的无资金准备负债，将导致美国欠下72万亿美元的债务。但更现实的数据则表明，届时美国承担的负担至少将达到137万亿美元。所以即使是做最好打算，这样计算的美国国债总数也将超过GDP的480%。而在最坏的打算下，美国收支间的鸿沟将达到GDP的911%。也许美国对希腊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目前，虽然福利制度对美国的影响与欧洲国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美国福利体系仍在快速扩张。美国联邦政府目前的开支超过GDP的24%，而到2050年，这一数字预计会增长到42%。如果加上美国各个州和地方政府的开支，各级政府的总开支将会超过GDP的59%，这比目前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的名言所说："任何无法永久维持的事物必将消亡。"现代福利制度不可能仅仅通过增税来满足自身日益攀升的开支。希腊、葡萄牙、意大利这些国家也不可能一直依赖法国和德国这些经济情况相对乐观的国家的救助，因为法国、德国等救援国总有一天也要面对

自己堆积如山的债务。

值得庆幸的是，福利国家有替代品。以福利国家三大组成（养老金、医保系统和贫困救济金）为例，自由市场足以提供可负担的——且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

例如，政府运作养老金项目的做法是收取在职职工的钱，并将之用于支付给退休者。然而，在老龄化社会里，这样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养老金系统虽然在建立之时在政治上颇受欢迎，但那是因为它基于“现收现付”的模式，有着与庞氏骗局别无二致的资本结构。随着退休领钱的队伍愈发壮大，支撑养老金的在职人口随之减少，系统就会岌岌可危。为了避免全面崩溃，政府要放弃这种“现收现付”的制度，使个人通过投资各产业来养老。

美国政府告诉美国人，他们的社保税被“投资”到了一个“信托基金”。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联邦政府用明日税收支付明日福利而开出的欠条。

美国政府宣称的“投资”根本不存在。当社保系统收入有余，这部分钱就被“借去”为当下政府的开支和国债买单，政府只需开一张向未来工作者收税的欠条。当借债的利息支出都超过税收时，这些欠款必将需要增税才能还清——真相大白的时刻用不了几年就会来到。

越来越多的政府意识到国家养老金计划是缺乏根基、不公正的，也是无法维持的。现在，已经有超过30国家改革养老金项目，允许工人抽出社保税的一部分作为储蓄或者投资。

在国家医疗系统的改革上，各国的趋势是逐渐摆脱集中式控制，并引进更多市场化的特色。这样的改革可以避免由政府控制带来的排队、

成本上升、使用权有限和限制供应问题。而市场带来的好处，包括健康的竞争、消费者的选择权和更多不通过税收来支付的医疗服务。像瑞士这样的国家，或者更保守的荷兰、法国等国家，都已经放松政府管控，注入市场机制，包括引入病患分摊成本、商品服务市场定价等机制，鼓励保险商和供应商间的竞争。

到目前为止，政府改革对于救济穷人的福利项目仍然视若无睹。当然，有些国家已经不得不对其救济标准进行缩水，有些则给福利追加条件，比如要求接受福利者正在工作或者至少在找工作。但是，还没有国家认真反思过“帮助弱势群体，国家首当其冲”的想法。

然而，彻底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在政府窘困之时维持福利国家的权宜之计。撇去钱不谈，福利制度会腐蚀社会结构，危害社会繁荣与和谐的基础。与消除贫困的初衷恰恰相反，收入转移、政府公屋和其他收入再分配的计划都是在鼓励和延续下层人士无法自力更生的恶性循环。这样下去，常年领取福利的阶层将不能为经济增长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维持福利的延续。

通过渐进的方式，提供社会福利的责任应该由政府转移到民间，特别是通过互助协会、自救组织和救急慈善等方式。无论是在处理天灾人祸、技术培训还是摆脱贫困上，互助协会和慈善组织都更有效率。现代福利国家的悲剧之一，就是这些有效率的组织被逐渐排挤和取代。

如果说福利国家在满足公民需求上的成败尚有讨论的余地，那么福利国家在财政上无力延续的事实已经无从争议，是时候寻找不让下一代破产的解决方案了。幸运的是，还有许多自愿性质的解决方案能更好地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全世界的公民和政府都应该开始让强迫性的、家长作风的、充满操纵却又缺乏延续性的福利国家向有效、公平、高效并可

持续的民间解决方案过渡。

“买得起房”的权利如何创造出整垮世界经济的泡沫

齐汉·诺伯格

瑞典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齐汉·诺伯格（Johan Norberg）展示了政府意欲使得房价更加可被大众承受得起的政策是如何创造出大规模的房产泡沫，进而导致了全球金融系统崩溃。诺伯格是加图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著有大量作品，包括《当人类创造世界》和《捍卫全球资本主义》，以及很多的视频文档，包括《用药过量：下一次金融危机》和英国第4频道的《有益的全球化》。这篇文章是从他的书《金融大溃败：美国对于自有住房和低息贷款的迷恋是如何导致经济危机的》（华盛顿：加图研究所，2009年）中摘取的第二章内容。在原书中，他给出了故事的更多细节，展示了政府对市场一连串的干预——包括美联储的低息贷款，政府为推动住房贷款提供的创造性融资，受政府资助企业（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抵押资产的证券化，以及鼓励投资高风险证券的银行管理制度——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的崩溃。

“来看看我们

在梦幻之地的胜利”

——“地风火”乐队在2006年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的圣诞晚会上的演出。

当房利美和房地美在2008年崩溃的时候，布什政府立刻发布一则消息，即他们在数年之前就预料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挽救，而民主党在国

会是如何阻碍了他们的计划。白宫官员甚至在“谈点备忘录”网站写了一篇名为《受政府资助的企业——我们早告诉过你们》（GSEs—We Told You So）的文章。这篇报告来自联邦住房企业监督办公室（Office of Federal Housing Enterprise Oversight）监管者小阿尔曼多·法尔孔（Armando Falcon Jr.），他的工作是监督房地美和房利美。该报告发布于2003年，在报告中，他警告这两个受政府资助的企业所进行的不负责任的借款行为和风险管理将可能导致其自身的破产。据法尔孔说，这可能会产生多米诺效应，从而造成市场上的流动性短缺。

布什的助手们在他们的“谈点备忘录”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细节：在法尔孔发表他报告的同一天，他收到了白宫人事部门的一个电话，告诉他他被解雇了。[1]

布什总统的目的是制造一个“所有权社会”，公民们通过所有权控制自己的生活和财富，这将增强公民的独立意识和责任感。然而，它并不意味着基于私有产权的自由市场——它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意愿，通过政府的手段使得所有权相对于市场上的其他合约关系来说更加有利。布什政府的一个关键目标就是增加房屋自有率，而他要达成这个目标的两个最佳伙伴就是房利美和房地美。

在2002年6月的一个晴天，布什总统访问了在公园广场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个贫民区）居住的警官达宁·韦斯特的家。韦斯特警官刚刚在那里买了一所房子，多亏了政府贷款帮他支付了首付款。总统曾访问了他并解释了黑人和拉丁裔人不能拥有自己房子的问题和白人是一样的，并且告诉他自己打算对此做些什么。少数族裔拥有自己住房的数量到2010年将会增加550万，这将通过房地美、房利美、联邦贷款和政府补贴的方式来解决。用布什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这意味着我们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来鼓励你们拥有自己的住房。[2]

事实上，共和党支持了民主党官员亨利·西斯诺斯（Henry Cisneros）的几乎所有决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布什发放了新的联邦补贴给第一次购房者，对于他们来说，布什希望即使他们没有一分钱存款作为首付，联邦保险也能为他们提供保险。2004年，正是受政府资助的企业设立新目标的时候。西斯诺斯要求42%的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抵押贷款要提供给低收入群体，而科莫（Cuomo）更将其提高到了50%。布什政府在2008年再一次将其提高到56%。一个更加显著的变化是，提供给超低收入群体的抵押贷款比例从20%一路上升至28%。

“没有人想要阻止泡沫。”劳伦斯·林赛（Lawrence Lindsey）说，她是布什的高级经济顾问。“这与总统自己的政策相抵触。”[3]而在一定程度上，住房政策也有了自己的势头。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更容易地获得抵押贷款，他们中就会有更多的人进入房地产市场，使得房价也飞涨起来。这反过来也就使还没有投资进入市场的人更加难以拥有自己的住房，这就进一步使得政府制定新的干预政策来扩大抵押贷款，从而进一步推高了房价。然而，巨大的抵押贷款看起来是无害的，只是因为房价一直在上涨，而你完全可以轻易地抵押旧房子而获得新的贷款。

当局对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态度直到出现了惊人的丑闻之后才发生改变。2003年6月，就在监管者发布声明称房地美的账目是“准确而可信的”之后数月，人们就发现这个企业藏匿了前3年里总计69亿美元的利润以备困难时期使用。对受政府资助企业的账目进行了仔细审查，紧接着又发现房利美也修改了自己的账本。不过，房利美是通过夸大利润以保证其管理层可以拿到全额的奖金。一系列的其他不规范事件也被曝光了，接着是高级管理人员被立即解雇。

这就变得很惊人了，曾经被很多人看作一种慈善团体——布什总统喜欢说他们是凭良心在做生意——受政府资助的企业看来是从在2001年破产的安然能源企业中学到了一些记账技巧。就在房地美的丑闻爆发前几天，它的监管者——联邦住房企业办公室（OFHEO）就在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提到：

房地美的财产性风险管理程序和系统是有效的。（风险）管理有效地传达了一个诚信与道德价值的恰当信息。管理的哲学和运作方式对于公司来说具有普适的效果。其组织结构和责任分配为可问责性和控制做了必要的安排[4]。

现在，联邦住房企业办公室不得不反过来谈论受政府资助企业中发生的大规模欺诈行为，对这些企业施加了超过5亿美元的罚款。会计欺诈强化了布什政府内部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怀疑。格林斯潘尖锐地批评他们将经济体推入风险之中，而布什总统恢复了小阿尔曼多·法尔孔作为房利美和房地美监管者的职位，他是“两房”的批评者，并且曾经被解雇。布什政府决定加强对这两个企业的监管，并且希望在危机事件中进行一个银行式破产清算过程，从而确保联邦政府不再为他们的债务担保。这对于这些企业的商业模式是个巨大的冲击，而这个模式（用格林斯潘的话说[5]）曾经仅仅是建立在利率的“巨大、肥厚的差距”之上的，因为他们可以受益于联邦政府的担保而获得极低利息的资金，而另一方面又以市场利率贷出它们而获得利润。

但是当局还不会下定论。在1999年的一个投资者会议上，房利美的首席执行官富兰克林·雷恩斯（Franklin Raines）就宣称，“我们以像管理我们的信用和利率风险一样的力度管理着我们的政治风险。”[6]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可以说这反倒是一个保守的说法。随着房利美逐渐失去了对其借出贷款的控制，他花费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和金钱去监控所有威

胁到其金融地位的政治风向。在过去的几年里，它还用其利润建立了有当地办公处的游说组织，以及没有其他机构能够匹敌的政客网络。在过去的10年里，房利美花费了1.7亿美元用于游说和给政治候选人的捐赠。[7]“两房”常常在他们当地的办公处雇用政客的亲戚，而对其友好的政客本人在离开当选的职位之后，也可以在受政府资助的企业里获得一份薪水丰厚的工作。作为政治支持的交换，房利美和房地美定期让国会成员宣布巨额的面向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发展计划——实际上，政治决策从来不是必须要通过政治决策制定程序的。相反，要是有国会议员想要扫除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特权的话，他会被淹没在愤怒的电话和信件里，而选民们则会收到自动发送的手机短信：“你们的国会议员正努力让购房的抵押贷款变得更贵。去问问他为什么他要反对自有住房的美国梦。”[8]

这个策略非常成功，这两家公司的批评者被一次次地击退。1999年，克林顿总统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经关注过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问题，但是他的改革建议被驳回。他们甚至可以藐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则，本来一个企业如果不提交年度财务报告的话，其股票将被取消交易资格。当房利美未能提交的时候，纽交所引入了一种例外机制——当“对企业股票摘牌将与国家利益严重冲突”的时候就可以适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核准了这次豁免，而房利美可以维持其上市公司的地位。[9]

很多人都尝到过房利美和房地美愤怒的滋味，共和党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理查德·贝克（Richard Baker）就是其中一人，他从“两房”的监管当局获得了他们付给高级管理人员的薪资水平。房利美和房地美威胁他，如果他将这个信息公之于众，他们将控告他，导致他将这个信息埋藏了一年之久。贝克现在离开了国会，他告诉《华盛顿邮报》在此之前他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在其如日中天的时候展示了他们在政

治上的傲慢，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私有团体展示过这样的政治影响力。”[10]

当布什政府背弃他们之后，房利美和房地美发动了他们的全部游说工具来发动对改革提议的暴力攻击。他们动员了住房和不动产金融行业，以及他们经常捐助的激进组织，还在电视和广播上发动了超大规模的广告攻势。“但这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负担新的住房了。”一个被拒绝贷款的女人在其中一个电视宣传片中总结了那些改革提议的后果。房利美和房地美赢了，民主党奋力反抗，设法从众议院的法案中删除接管的规定，导致该法案大打折扣，以至于政府不再想支持它。在参议院，犹他州参议员罗伯特·伯奈特（Robert Bennett）最终设法弱化了关于证券信息披露和资本需求的条款。

伯奈特参议员的第二大捐赠者就是房利美，他的儿子在犹他州的房利美上班。

任何人都能看到它的来临

对于“两房”来说，他们击败布什政府就像希腊指挥官皮洛式（Pyrrhus）在阿斯库伦城打败罗马人时一样。他们曾经享受两党广泛的支持，但是现在政府却在反对他们，他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依赖国会上的民主党，只有他们希望以更快的速度扩张这两个企业的最流行的业务，即为低收入和少数族裔人群提供贷款。“两房”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就是培养民主党人的支持，让他们放开所有信用检查和借款方面的限制。他们也同样有由于会计丑闻输掉的时候，这使得其他放贷企业从他们这里夺走一部分市场份额。这时，大多数能够应付普通市场利率的低收入者都已经在很久之前获得了一份抵押贷款。而受政府资助的企业因此就只

能向更加有风险的方向进发以收复失地。

丹尼尔·马德（Daniel Mudd）是房利美的首席执行官，他对于未来的战略毫不迟疑。他对员工说："要么勇敢地承担风险，要么就滚蛋。"一个前雇员向《纽约时报》解释说：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开始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收购住房质押贷款，但是我们得到的命令就是与时俱进，并且服务于低收入借款者，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做的。"在2004年中期，房地美的风险总监大卫·安尊克尼斯（David Andrukonis）曾告知其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赛朗（Richard Syron），信用审查已经变得越来越宽松和具有风险，这把企业和国家都置于巨大的金融风险之中。但是赛朗拒绝听取警告，沮丧地向安尊克尼斯解释说房地美再也无法承受对任何人说不。[11]

即便是布什政府指责了房利美和房地美过于轻率地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间接地进一步帮助"两房"继续下去。2004年10月，就在贷款疯狂的顶点，他们仍旧宣布将大大提升对低收入群体抵押贷款的目标数量。就如前面提到的，这种抵押贷款的份额每年都在增长，从2000年的50%到了2008年的56%。而对非常低收入群体的贷款份额则从20%上升到了28%。

那时在房利美和房地美中弥漫着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他们的高级管理层已经放弃了满足他们主人的全部努力：股票持有者希望获得长期的利润，而政治家们希望他们变本加厉，这两者根本无法调和。一个雇员描述了办公室中讨论最多的是如何集中到关于危机爆发之前贷款还能持续多久的话题：

不需要多少眼力就能看出贷款的质量出了什么问题。任何人都已经看到它了，但是外界却没有人就这一点来质疑我们。[12]

事实上，不愿意正视这些发生的事是有政治上的原因的。其意愿是美好的，而目标是几乎无可挑剔的。一直到2008年7月，保罗·克鲁格曼这个马上就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左翼经济学家对“两房”的批评者进行了攻击，指出这二者与高风险贷款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没有贷出一笔次级贷款。[13]克鲁格曼将事情搞混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确没有借钱给次贷借款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放钱的一方；但是他们是购买贷款的一方，而这些贷款逐渐增长的份额都是次贷。房利美和房地美也试图通过将“次级”定义的范围缩得比市场的其他参与者更窄，从而掩盖他们的高风险借款。2007年7月，全美金融公司的风险总监就在一个电话会议里骄傲地对分析师说他们的机构就在向房利美出售“远低于”标准（即使是最宽松的次贷标准）的抵押贷款，但却被房利美评为“优级”。[14]

房利美和房地美在2004年左右放出了他们将购买任何贷款的消息，这是银行和其他机构开始发放次贷和准优级（Alt-A）贷款的主要原因。“市场知道我们需要这些贷款。”一个房地美的发言人解释说。[15]“准优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比优质贷款更有风险、比次贷有较低风险的贷款类型。这种贷款通常被贴上这个标签，因为没有借款者收入的文件，它们的另一个名字是“骗子贷款”。实际上，它们通常都表现得与次贷一样高风险，次贷和准优级也被建议合在一起以不那么隐晦的方式归于同一类：“垃圾贷”。2003年，垃圾贷占据了美国抵押贷款8%的份额，但是在2004年就上涨至18%，在2006年的三季度进一步变成了22%。房利美和房地美在2005—2007年间有40%的抵押贷款是次贷或准优级。[16]

宏伟的目标迫使房利美和房地美改变他们的战略。除了只是收购抵押贷款并将其重新打包成证券之外，他们现在还从其他企业那里购买越来越多的这种证券。事实上，房利美和房地美很快就变成了这种证券中

最安全“分券”的最大买家了。所谓最安全就是这一特定部分有着最高的信用评级。许多评论家都认为这是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在世界范围内失控传播的决定性原因。原因在于最安全分券的收益仅仅比银行利率存款高一点，这意味着投资者们不会挤着去购买它。但是对于房利美和房地美来说，他们能够依靠政府的背书来获取便宜的借款。于是，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个有吸引力的生意了。一旦他们为这种分券融资，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更加容易地找到投资者来购买他们更有风险的那些证券，而这些则会产生更大的回报——有时甚至高达20倍以上。这就促使诸如新世纪（New Century）和阿姆莱奎斯特（Ameriquest）这样的公司专门针对性地设计他们的证券让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这些证券所基于的抵押贷款恰好总是低于41.7万美元，这一点绝不是巧合，因为这就是成为“两房”的证券投资组合部分所容许的贷款上限。[17]

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于住房市场的联合财务风险是巨大的。2007年末，其负债和他们担保发行的抵押担保证券的总和与美国国债数量相等。对于他们担保或者通过证券借出的每100美元，他们只有1.2美元的权益。[18]2008年8月，“两房”所拥有的垃圾贷和基于垃圾贷的证券总值达到了超过一万亿美元——这比他们整个抵押贷款证券投资组合的五分之一还要多。[19]以《黑天鹅》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话来说，他们是“坐在了炸药桶上了”（《黑天鹅》讲述了人们是如何低估小概率事件的风险的）。然而，他们的分析师队伍却一直宣称风险还是很小的。他们有精致的模型来管理风险，也就是除了一个风险——房价下跌之外的所有风险。[20]

房地美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赛朗在回顾在什么事情上出错了的时候，他将不良抵押贷款归咎于政治家们面临压力。他们将房屋自有权范围扩大，将其推向无法负担购买住房的家庭。这也正是受政府资助的企

业为其拥有的特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15年前，也正是赛朗在位的时候，波士顿联邦储备（Boston Fed）开始系统地放松银行的贷款信誉要求；而在房地美，他主导了对次贷市场的大举扩张。当纽约时报最近问他在当时是否可以做些什么能使得结果有所不同的时候，他回答：“如果我有更好的先见之明的话，我可能会把事情做得稍微好些。但是老实说，如果我能完全预见这一切的话，那么在一开始我就绝不会接受这份工作。”[21]

注：

[1] 参见Jo Becker，Sherly Gay Stolberg，Stephen Labaton，“White House Philosophy Stoked Mortgage Boni re”，*New York Times*，December 21，2008.

[2] 参见G.W.Bush，“President Calls for Expanding Opportunities to Home Ownership: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homeowner-ship，”June 17，2002，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6/20020617-2.html.

[3] 参见Jo Becker，Sherly Gay Stolberg，Stephen Labaton，“White House Philosophy Stoked Mortgage Bonfire”，*New York Times*，December 21，2008.

[4] 参见Office of Federal Housing Enterprise Oversight，“Report to Congress”，Washington，DC，June 2003，p.38.The OFHEO used similar language about Fannie Mae on p.36.

[5] 参见Binyamin Appelbaum，Carol D.Leonnig，David S.Hilzenrath，“How Washington Failed to Rein in Fannie，Freddie”，*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14，2008.

[6] 参见Peter J.Wallison，Charles Calomiris，“The Last Trillion-Dollar Commitment: The Destruct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American Enterprise Financial Services Outlook*，September 2008.

[7] 参见Lisa Lerer，“Fannie，Freddie Spent$200M to Buy Influence”，*Politico.com*，July 16，2008.

[8] 参见Charles Duhigg，“Pressured to Take More Risk，Fannie Reached a Tipping Point”，*New York Times*，October 5，2008.

[9] 参见Binyamin Appelbaum，Carol D.Leonnig，and David S.Hilzenrath，“How Washington Failed to Rein in Fannie，Freddie”，*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14，2008.

[10] 同上。

[11] 参见Charles Duhigg，“Pressured to Take More Risk，Fannie Reached a Tipping Point”，*New York Times*，October 5，2008.

[12] 参见Charles Duhigg，“At Freddie Mac，Chief Discarded Warning Signs”，*New York Times*，August 5，2008.

[13] 参见Binyamin Appelbaum，Carol D.Leonnig，David S.Hilzenrath，“How Washington Failed to Rein in Fannie，Freddie，”*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14，2008.

[14] 参见Paul Krugman，“Fannie，Freddie and You”*New York Times*，July 14，2008.

[15] 参见Seeking Alpha，“Countrywide Financial Q2 2007 Earnings Call Transcript，”July 24，2007，http://seekingalpha.com/article/42171-countrywide-financial-q2-2007-earnings-call-transcript.

[16] 参见Carol Leonnig，“How HUD Mortgage Policy Fed the Crisis”，*Washington Post*，June 10，2008.

[17] 参见Peter J.Wallison，Charles Calomiris，“The Last Trillion-Dollar Commitment: The Destruct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18] 参见Jody Shenn，“Fannie，Freddie Subprime Spree”，*Bloomberg.com*，September 22，2008，www.bloomberg.com/apps/news?pid＝20601109&sid＝a.6kKtOoO72k&refer＝home.

[19] 参见James Lockhart，“Reforming the Regulation of the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Statement before the US Senate Banking，Housing，and Urban Affairs Committee，February 7，2008.

[20] 参见Peter J.Wallison，Charles Calomiris，“The Last Trillion-Dollar Commitment: The Destruction of Fannie Mae and Freddie Mac”.

[21] 参见Nassim Nicholas Taleb，The Black Swan: The Impact of the Highly Improbable，（London:Penguin Books，2008，pp.225–26.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Section 4　贫困与福利国家

POVER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 如果我们用长远眼光来看人类历史，用现代标准判断我们祖先的经济生活，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普遍贫困是历史中的常态，过去两个世纪里的财富爆炸是需要解释的异常现象。

贫困、道德与自由

汤姆·戈·帕尔默

几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于贫困及其正确的解决办法的认识在不断演变。本文从道德哲学、经济学、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角度，评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理解的贫困与财富的性质与起源，并向读者展现他们对于自助、互助、慈善和国家强制在消除贫困中分别起怎样作用的看法。本文有一个篇幅更长的版本，最初发表在彼得·霍芬博格（Peter Hoffenberg）和威廉·A.加尔斯顿（William A.Galston）主编的《贫困与道德：宗教与世俗的视角》（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中。

“古典自由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指的是一种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思想传统，它将个人自由放在政治考量的核心，并认为自由（用约翰·洛克的话讲）是每个人享受“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他自己的意志。”[1]

尽管古典自由主义者时常在自由的基础以及国家权力合理范围的问题上有严重分歧，但一般都同意自由无需辩护的理论。也就是说，干涉他人自由必须要有合理性辩护，而他们的自由行动本身是无须辩护的。运用权力需要辩护，运用自由则不需要。[2]

通常，古典自由主义思想被人们接受的3个核心理念是：

1.以许多不同方式表达的信念——“个人拥有权利，有些事是任何人或者团体都不能对个人做的（做了就会侵犯他们的权利）”；[3]

2.社会秩序与和谐能够自发产生，无须有意识地干预或者推行计划的认识。社会秩序与和谐是人们在权利（财产）的基础上自由互动而没有预期到的结果。权利受到促进契约的法律规则的明确界定、保护和组织；

3.认同受宪法约束的政府，政府被授权执行正当行为规则，但其权力严格受限。

因此，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传统主要出自3个学科——道德哲学、社会科学和政治学（或法学），心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作为辅助性的学科予以补充。这3个元素相互强化，形成了一套结构紧密的有关自由、权利、政府与秩序之关系的理论。

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先贤为这3个基础学科——道德哲学（《道德情操论》）、社会科学（《国富论》）以及政治学或法学（《法哲学演讲录》）都做出贡献的亚当·斯密，将这三大支柱用一段著名的话连在一起：

将一个国家带入最高的富裕程度，只需要和平、轻松的税负和一个不错的司法机构即可；其他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一切阻碍这一自然发展的政府，比如强行将事物引向其他渠道，或者想要在某个时点中止社会进步，都违背了自然，而为了支持自己，它们必然要推行压迫和暴政。[4]

定义

古典自由主义与贫困问题有长期的联系，有一部分原因尤其在于它与经济科学联系密切，一般来说，又把它看作是研究社会秩序和改进的自发形式。古典自由主义者一直坚持认为，“国民财富”的问题逻辑上先于“国民贫困”。贫困只有与财富比较才有意义，而财富必须要有人生产出来。贫困是衡量财富的自然底线，没有财富生产即是贫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对于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所讨论的“贫困的原因”有非常著名的反驳：“贫困没有原因，财富才有原因。”正如历史学家内森·罗森博格（Nathan Rosenberg）和小L.E.巴德赛尔（L.E.Birdzell Jr.）就此问题所说：“如果我们用长远眼光来看人类历史，用现代标准判断我们祖先的经济生活，我们看到的会是一个几乎难以置信的悲惨故事。”[5]普遍贫困是历史中的常态，过去两个世纪里的财富爆炸是需要解释的异常现象。

按照今天的理解，“繁荣”这个词是唯独现代才有的现象。最近，大部分人类仍然在经历着早逝、疾病、无知、难以置信的繁重劳动以及无法稳定获取维持生命所需的充足食物的生活。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过去的描绘是极具误导性的，因为这幅图景几乎完全来源于其他知识分子的写作，即出自于那些极少数能够享受闲暇书写自己生活的幸运儿。这些记录难以代表大多数人的生活。人类在过去大多数时候的生存物质条件与现在相比差异显著。用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史学家迪尔德瑞·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话来讲：

12是关键词。在英国和其他经历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今天的真实人均收入比在1780年左右多了12倍。

……即使是最为保守的估计，平均每人拥有的面包、书籍、交通和纯粹娱乐都比两个世纪前的人均水平多12倍。先前没有一个富裕的时期

能够接近现代的经济增长——巅峰时期的中国或埃及、希腊的荣耀抑或是罗马的宏伟都未能企及。[6]

表4-1 欧洲殖民国家和前殖民地人均GDP水平

1500—1998 年（以 1990 年国际美元计）

国家＼年份	1500 年	1700 年	1820 年	1913 年	1950 年	1998 年
英国	762	1 405	2 121	5 150	6 907	18 714
法国	727	986	1 230	3 485	5 270	19 556
意大利	1 100	1 100	1 117	2 564	3 502	17 759
荷兰	754	2 110	1 821	4 049	5 996	20 224
葡萄牙	632	854	963	1 244	2 069	12 929
西班牙	698	900	1 063	2 255	2 397	14 227
中国	600	600	600	552	439	3 117
印度	550	550	533	673	619	1 746
印度尼西亚	565	580	612	904	840	3 070
巴西	400	460	646	811	1 672	5 459
墨西哥	425	568	759	1 732	2 365	6 655
美国	400	527	1 257	5 301	9 561	27 331
爱尔兰	526	715	880	2 736	3 446	18 183

来源：A.Maddison，*The World Economy*，vol.1：*A Millennial Perspective*，and vol.2：*Historical Statistics*（Paris：OECD，2006），92.

生产性能量的爆发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1500—1998年的人均收入巨变就展现了这一点。从图4-1看公元元年到现在的数据更是令人震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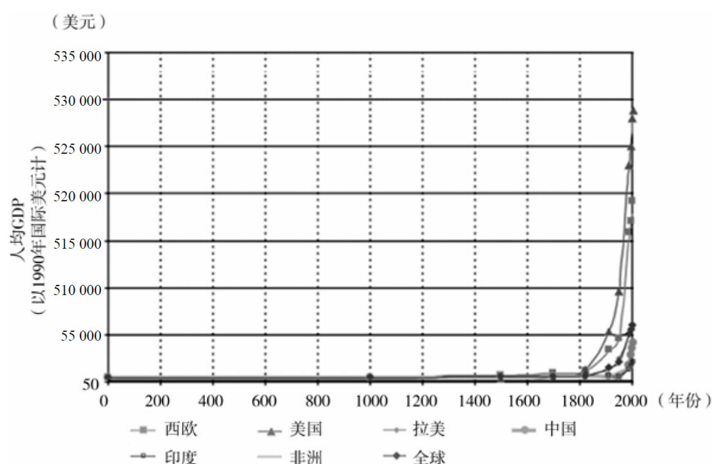


图4-1　全球经济发展

来源：Indur M.Goklany，*The Improving State of the World*（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2007），43.

从18世纪中叶（对于西欧和北美而言，其他国家要在一个世纪以后或更晚）起飞，突然而且持续的收入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收入几乎从一条水平的直线转变成几乎竖直的增长，这才需要解释。

人类最早几代的生存条件——用现在的标准来评判——可以说不仅仅是令人恐惧。古典自由主义史学、经济学和法学研究一直关注于解释这场巨变的原因，而大体的共识认为，关键的变革是有助于生产财富的制度在发展。

古典自由主义者主张，解释财富生产——解释是什么让图4-1中的突然上升趋势成为可能——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这场变革的突然性，而且还有出于阐明概念的理由。贫困是没有发生财富生产的结果，而财富不是没有发生贫困生产的结果。

图4-1所示的财富爆炸的突然性，正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主导话语中对立于一种普遍贫困的常态，而不是根据相对财富水平来定义繁荣的原

因。

古典自由主义者试图解释财富的存在，而不是把它的缺失当作根本疑团。用“贫困的恶性循环”来解释财富缺失的想法，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P.T.鲍尔的批判：

有钱是经济成就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发达国家的存在使这句话的意思十分清楚。所有发达国家最初必然都不是发达国家，它们都是在没有外部捐助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世界并非在创造以来就是两个部分，一部分已经享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资本存货，而另一部分则没有这些设施。此外，许多贫困的国家在现代发展经济学和这个恶性循环的讨论出现的100多年前迅速发展。事实上，如果贫困恶性循环的概念是有效的话，人类仍将生活在旧石器时代。[7]

几乎所有人种都脱离了石器时代。在人均收入增加的国家，穷人受到显著影响，其地位乃至定义都发生了剧烈变化。卡洛·希波拉（Carlo Cipolla）就注意到“工业革命”的影响。不可否认的是，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它的一个主要特征（与其他所有传统农业社会一样）是可悲的大众贫困与极少数巨富的奢华的截然反差。[8]在前工业社会，“穷人”指的是在饥饿边缘的人们：

大多数人生活在维持生命的状态。他们没有储蓄，没有在不幸时可以帮助他们的社会保障。如果他们长期没有工作，唯一的生存希望就是慈善。当时是没有“失业”一说的。失业者就是穷人，穷人又与乞丐同类，而这些词语的混用折射出那些时代冷酷的现实。一到荒年或者经济停滞的年头，贫困的人群便显著增长……前工业时代的人们习惯了乞丐数量的急剧波动。尤其在城市，一到饥荒的年份，穷人的数量便会猛增。饥饿的农民逃离颗粒无收的乡间，蜂拥至城镇中心，因为城里更容

易得到救济，而且富人的宅邸很有可能存着食物。塔迪诺（Tadino）博士的研究指出在1629年饥荒时期的米兰（意大利），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乞丐的人数就从3554人增加到9715人。加士康（Gascon）发现在里昂（法国），“一般的年份里，穷人占到人口的6%～8%；荒年里这个数字上升到15%或者20%。”

没有独立收入是穷人的根本特征。如果他们活了下来，这是因为有收入通过自愿慈善转让给了他们。[9]

工业的大发展让穷人——以大量城镇工人的形式——在受过教育的城镇居民眼前前所未有地突出。但他们已不再是等待救济的饥民盲流。他们的地位发生了决定性变革。工业革命所推动的人口增长并不是由于出生率的增加，而是由于死亡率，尤其是夭折率大幅下降。F.A.哈耶克写道：“如果我们询问人们欠那些所谓资本家的道德行为最多的是什么，答案是他们的生命。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将无产阶级的存在归咎于剥削以前能够维持生活的群体这完全是虚构。现在虚构这个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要是没有他人为他们提供生存的手段，是根本不会存在的。”[10]

古典自由主义者坚持不懈地揭露关于过去的错误想象——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共享着这样的画面，在绿意盎然的田园中，农夫们怡然自得地游乐嬉戏，生活平静安宁、快乐无忧，而且家家户户都享有一栋温暖舒适的小屋。[11]古典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19世纪中期描绘并反驳了这种常见的对过去“黄金时代”的迷恋，这种迷恋至今仍与我们相伴（“啊，50年代那会儿，我们每个人都……”）：

现在将过去称为英格兰的黄金时代已成为一种时髦，而在那时，贵族所求之不得的安逸舒适，对现代的马夫而言却难以忍受；那时，农民

和小商人早餐啃硬面包，这种情况换到现在的济贫院里也会引起骚乱；那时，一周洗一次衬衫已是上流绅士阶层的特权。

而现在，我们当中最穷的人也会认为麦考林时代的生活方式不可忍受，麦考利颇有远见地承认：

轮到我们注定被超越，也轮到我们被人妒忌。在20世纪很可能有……许多舒适和奢侈的东西，那些我们还不知道或只限于少数人使用的东西，以后将在劳苦大众中普及。而且仍然会是这种状况：宣称财富的增长和科学的进步只有利于少数人，却有损于大众。[12]

因为麦考利明白，在“贫困”和“财富”之间没有清晰可辨的天然界限。今日的穷人享受着过去（甚至相对较近的过去）的富人不可企及的舒适设施（如果任何人怀疑这点，他或她该将50年前顶级富翁的牙科治疗体验和今日发达国家中最穷的人的体验比较一下。因此，谁会怀疑，从前的富翁会对今天工业国家中哪怕最穷的人所能享受的麻醉和现代牙科技术眼红得要死呢？）。

比较法在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中并不少见。德·孔狄亚克神父（Abbé de Condillac）在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同年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中，区别了单纯缺乏财富和贫困：“不能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才是贫困，而某人缺少某种他还没有需求甚至还不知道的财富不算贫困。”[13]艺术和科学的进步，以及更多财富的创造引发了新的需求，对这种需求的满足产生了新的消费形式。

亚当·斯密补充了另一个额外的要素。贫困不仅存在于未满足需求的意识中，也存在于将某人的情况以一种使人蒙羞的方式与他人的比较中。羞辱感用来定义何为“必需品”的特征，也就是说，某人缺少了这些东西就被认为是贫困的：

我理解的必需品，不仅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物品，还包括任何依据该国风俗，少了它，有信誉的人就会被认为不体面的东西，哪怕是最底层的人也是如此。比如，一件亚麻衬衫并不是生活必需品。我猜测希腊人和罗马人虽然没有亚麻也能过得挺舒适。但是在现代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一位有信誉的工人如果出现在公共场合而又没穿亚麻衬衫的话，他就会感到羞愧。没有亚麻衬衫暗示着他穷到了可耻的地步，也就是说，除非他混得太差，否则没人愿意沦落至此……所以我理解的必需品，不但包括那些自然的必需品，而且包括那些有关面子的习俗，使其成为最低阶层人民所必需的物品。其他的东西，我称之为奢侈品；……其性质并非维持生命所必需，而没有什么习俗认为少了这些东西就不体面。[14]

在绝对的和比较的概念下，财富和贫困的标准都变化不定。某一年中，某人积累了某些资产就成了富人；在以后更富裕的年代，同样的资产却只是穷人；而在某个社会中的富人，在别的社会中就成了穷人。

与古典自由主义者关注财富作为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一致，因此，他们孜孜不倦地讲述，分析为什么有些人比其他人过得好或差。斯密广为人知的大作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成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前的大多数作者都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统治精英的财富混为一谈。相反，斯密在其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民财富的性质既非军事力量，也非国王宝库里藏着的金银，而是全国劳动力的年度产出除以消费者的数量，这一原则在现代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中得以坚持。[15]

因此，国民财富不是由统治者的武力或国库里的金条来衡量的，而是由任意一国获得财富的机会衡量的：“致富容易的国家理当富裕，或者某些国家中，得到了正确而且明智使用的少量劳动力有能力为任何人提

供大量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16]财富的原因或决定性因素是制度，制度能创造生产财富的激励。那么，贫困被认为是与财富相反的背景，代表了创造财富的失败，而这种失败的原因是那些制度或实践对财富生产的负激励，并且/或者鼓励掠夺性的财富转移，这种转移直接令某些人陷入贫困，而另一些人则大发横财。

机会被理解为从事创造财富的自愿行为的自由。如果机会分布不均，很可能导致财富分布不均，这不是因为“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分配不公平，而是因为某些人得不到生产财富的机会，其后果是这些人能生产的财富较少。古典自由主义者强调，每个生产行为本身就是分配行为。如果生产的自由不平等，那么获得的财富也将不平等。比如，得到了政府垄断授权的人因为没有竞争就能卖高价，由此获得垄断租金，这种过程（现在被称为寻租）既将财富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而且在此过程中，消耗了已产出财富的积累，因为资源被转移到寻租行为本身，远离了价值的生产，因而使得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比其没有寻租行为时应达到的财富水平更少。[17]

如果某些人有权力强迫他人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强权者的利益生产，这将使财富从被强制者处转移给那些施加强力的人，有时以生产力的巨大净损失为代价。奴隶制、农奴制、强制征兵和其他形式的强迫劳动将财富从一些人的手中转移给另一些人。盗窃和其他形式的非自愿转移，将财富从生产者那里没收，通常有利于没收者的利益。[18]限制一些人与其他人竞争，产生了那些具有垄断性权力的人的租金，牺牲了他们的消费者和潜在竞争对手的利益。在某一社会中，如果一些人被法律强行禁止拥有土地，或进行某些特定的交易，或不能以自由协商的价格购买商品，那么很可能会看到被限制了法律行为能力的群体和那些未被限制的群体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

皆是。[19]

贫困的脆弱性

就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贫困的脆弱性依赖于制度设定。如果以暴力或政治权力和强力夺取得到奖赏，强盗和政治野心家将因抢劫勤劳工作者所创造的财富而获利，勤劳的人将陷入贫困，从而会失去进一步生产财富的动力，他们成为所有人中相对贫困的人。文明化的历史就是限制权力和暴力的历史，有多种手段实现这种限制。[20]

如果法律秩序的特征是定义明确受到法律保护并自由转移的财产权，且严厉限制掠夺性行为，贫困将趋于从勉强不至于饿死转变为相对富裕与否的问题，穷人较不富裕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缺乏生产财富或储蓄的能力和意愿，而将其已得到的东西挥霍一空。也即，“性格”（也就是所拥有的美德）[21]是一个因素，不管是在绝对还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来评价勤劳和节俭的人，他们在这样的法律秩序下都不大容易遭受贫困。

在相对自由和繁荣的社会中，相对贫困最好的指标很可能是一个人接受国家救助的程度。他们认为这种救助趋于培养好逸恶劳和不负责任的恶习。典型的例子是在相对繁荣的英格兰实行的“济贫法”，特别是为工作的穷人提供补贴的“院外救济”的“斯品汉姆兰体系”（Speenhamland System）。[22]正如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访问英格兰后所写的《贫困回忆录》（*Memoir on Pauperism*）中认为，在富裕国家，比如英国，其在“济贫法”改革之前，“法定慈善”的可利用性本身就是产生贫困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因为这种制度已经创造了一个永久性的贫民阶层。他的调查致力于解决一种表面上的矛盾：“看起来最为贫困的国家在现实中却是导致穷人最少的国家，而在那些因富裕而最受人敬仰的人民中，人

口中的一部分却不得不靠他人的施舍过日子。”[23]

托克维尔从他的调查中得出结论：“任何在永久性基础上建立法定慈善的措施，并以此形成的常设管理形式，都会创造一个游手好闲的阶层，他们靠剥夺勤勉的劳动阶层为生。”[24]除了产生一些人依赖于他人的激励外，“济贫法”还刺激了劳动者努力控制“院外救济”人数的运动，以免新来者成为地方纳税人的负担。托克维尔谈到：

法定慈善不但影响穷人的道德，同样影响穷人的自由。这很容易得到证明。当时，地方政府受到严厉的强制，必须救济穷人，但他们只对住在本辖区内的人有救济义务。这是唯一公平的方式，以求在法律形成的公共负担和将之以成比例的手段地分配给那些必须承担的人之间达到平衡。既然在一个拥有组织性的公共慈善的国家，个人慈善几乎微不足道，任何人因其不幸或恶习而无法谋生都值得谴责，他一直留在出生地，接受死亡的痛苦：如果离开，他将进入敌人的领地。教区中的私人利益，远比组织纪律最好的国家警察能做到的更积极、更强大，警察们关注他的到来，跟踪他的每一步，而且如果他打算建立新的居住地，警察们将报告当局，把他驱逐出境。通过他们的济贫法，英国冻结了1/6的人口。他们像中世纪的农奴那样被束缚在土地上。所以，一个人被迫违背他的意愿留在他的出生之地，法定慈善甚至打消了他搬家的愿望。[25]

一种类似的由福利国家主义开启的控制机制深刻地解释了限制跨国移居自由的狭隘政策，因为移民通常被福利国家的原住民视为寄生虫，预示着将要消耗当地的财富，而不是为了互惠而来的潜在的财富生产者。[26]

政治经济制度化意味着获取财富

一个主要的促进生产的因素——其实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促进因互惠而自愿合作的制度性框架。财富生产是制度性变革的结果，这种变化创造了提高生产力和通过交易互利的动机。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言："这种大胆的新概念有强大的道德内容。人们第一次发现了不必非要以剥削方式获得财富的可能性。在个人层面上，自愿交换的观念是说在任何交易中，双方都期待着赢利。但同样的这点运用于整个社会的层面时，意义甚至更为引人注目。国家获得财富的道路是贸易，而非征服。"[27]源于这种洞见，古典自由主义者区分了获得财富的两种不同的手段：生产和交换的"经济手段"和实施武力的"政治手段"。[28]赫伯特·斯宾塞区分了两种典型的社会，即"军事社会"和"工业社会"，前者以命令和等级制为特征，后者则是合作和契约。[29]

因为法律上的特权会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差异，古典自由主义者致力于识别和消除这些损人利己的特权。[30]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坚决反对限制贸易准入的行业特权；反对因种族、民族、宗教信仰和性别对财产所有权或贸易准入设置的障碍；反对针对便宜进口商品的保护主义壁垒，这种壁垒对消费者提价却让极少数国内厂商获利；也反对广泛的大批阻挡人们改善其境况的努力的障碍。法律上的平等，贸易上的自由，以及职业对有才干者开放是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家关于社会进步的口号。[31]

古典自由主义者为其努力取得的成果感到自豪。E.L.戈德金（E.L.Godkin）作为古典自由主义新闻记者，于1900年在《国家》里写到："这个时代巨大的物质进步很大程度上正是要归功于自由主义的原理和规则。人们从政府令人烦恼的干预中解放出来，致力于他们自己本能的任务，即改善处境，他们所取得的神奇成果把我们包围。"[32]

财富与不平等

正如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贫困不是贫困的“原因”（在“贫困的恶性循环”讨论中P.T.鲍尔批评了这种说法），他们也不认为财富的存在是贫困的原因，如某些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者坚持不给予穷人商品和服务是这个人容贫困的“原因”。[33]实际上，自愿地获取财富是他人富裕的原因，而非他们贫困的原因。根据“萨伊定律”：“是生产打开了对产品的需求”，可推定某一个人、某一群体或某一国家的财富将有利于与之交易的人。[34]

有一位积极的制造商，或者一位聪明的商人，如果在波兰或威斯特伐利亚的遥远角落里一座半野蛮的荒凉小镇上，他能够做什么？尽管不用担心竞争者，他也几乎卖不出东西，因为能生产的也很少。而如果在巴黎、阿姆斯特丹或伦敦，即使他自己的行当有100个零售商竞争，他也有机会将生意扩展到最大程度。理由显而易见：他周围的人要么无穷无尽地大量生产，要么用他们各自的产品采购，也就是说，用从销售他已生产的商品中产生的货币采购。[35]

制度能创造激励，而激励则形成行为。正如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所说：“制度提供了一个经济体的激励结构；随着这个结构的发展，它形成了经济增长、停滞或衰落的变化方向。”[36]

结果通常不是选择的目标；一个人能选择过程，而非结果。看起来像是选择了某种结果（比如更高的工资），实际上，还是选择了一种过程（禁止创设或履行低于某一特定工资的劳动合同）。过程并非总能产生选择者所希望的结果。丹尼尔·夏皮罗指出：“制度不能通过其目标进行充分描述。”[37]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基于干预不能产生承诺的效

果，批评了对自愿交换的大量干预。比如，最低工资法不能提高工资——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的增长才能提高工资，这种不受立法命令的控制，这种法律禁止那些边际生产价值较低的人（典型的是非熟练工，没受过教育的人和年轻人）用可能打动买主的价格提供他们服务的方式，这样既增加了失业，又迫使人们从自由市场转入黑市。[38]

以权利和完全平等为特征的社会仍然会显示出收入的不平等，就像不自由的社会那样（如曼瑟尔·奥尔森在他的论文“苏联式独裁理论”中所证明的，没有什么社会秩序能消除收入的差距。它们通常只是掩盖了这种不平等）。[39]自由社会的不同之处是普遍的精英循环——艺术、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精英。维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在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的“精英循环”所做的普遍性研究中，他注意到与军事社会相似，自由的、工业化的社会也以精英循环为特征，但却是基于完全不同的过程。在一个军国主义（“好战”）的社会，战争提供了“普通士兵成为将军”的动力，但是在“工商业社会”，最穷的人要获得财富需要自由和“工商业充分程度上的发展以使数量可观的市民获得真正的机会”。[40]基于生产和自愿交换的商业关系趋向于产生动态不平等的体系，而非保持纹丝不变的不平等体系。也就是说，个人和家庭可能在财富的相对范围内起起伏伏，同时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一直增加。[41]

古典自由主义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在分析自由社会里永远变动不居的“财富分配”所得出的关键区别是“所有权”（一个法律概念）和“财富”（一个经济概念）之间的区别。自愿的交换不仅构成对所有权和财富的真正分配，而且是在参与交换的缔约方中。当亨利·福特从供应商那里购买了钢铁、橡胶和玻璃，并雇用了工人来制造汽车，他不仅导致了财产从那些直接参与交换的人中易手，而且还抬高了这些资源的价格，从而引起了那些用以制造马鞍资源的价格下跌，并通过提高劳动的边际生

产价值增加了工资。所涉及的财富的转移远不止在这些交易中换手的财产价值。价值的改变决定了资产的意义，即对其所有者而言代表的财富；其价值经常改变——新的生产过程、品味改变等的引进，会使某些人的财富增加，而另一些人减少。

因此，市场经济看来是一种平衡的过程。在市场经济中，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在它之前，那些现代政客们建立的表面上相似的过程在相比之下都黯然失色，无关紧要。市场把财富给那些能掌握它的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理由，但是政客们却将这些财富给予他们的选民，作为规则，这些人没有这种权力。[42]

古典自由主义者拒绝了财富的“自然资源”理论，代之以工业的方式。财富并非我们所发现的，而是我们所生产的。因此，颇有影响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区分了“现存的材料”（这在现在称之为“自然资源”）和“财富”：“人们能做的一切都是，对现存的材料进行再生产，变为另一种形式，这样可能会给其从前未有的效用，或仅仅是扩大了其从前具有的效用。因此，这是一种创造，不是物质的创造，而是效用的创造，我称之为财富的生产。”[43]

比起那些资源少得多却由能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管理的社会，许多自然资源丰富的社会，人口却远为贫困。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是财富的重要决定因素，这是发展经济学的老生常谈，其历史可追溯到数百年前。[44]古典自由主义的特点是相信凭借法律制度，明确定义基于合同和法律体系的自由交换的权利并给予法律保护，可培育财富的生产，并消灭绝对的贫困，或者能形成一个亚当·斯密的“和平、低税和过得去的司法当局”。[45]而且，生产和交换的自由削弱了等级制、种姓制和其他僵硬的不平等形式。

但是，通过自由市场生产财富绝非古典自由主义者对贫困的唯一回答。这种交换只是与贫困作战的大量广泛的合作行为的组成部分之一。

自助、互助、慈善与公共救助

法律上的平等是古典自由主义传统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古典自由主义者是扩展平等理念的先锋，将平等扩展到男女之间，以及所有的种族、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他们倡导女性参加工作的平等权利，消除基于性别排斥女性工作的法律，倡导女性独立地获取、拥有和处置财产。这不仅是为了道德一致性的理由，也改善了许多女性的地位，消除了她们对男性的被迫依赖。正如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废奴主义者和女权活动家萨拉·格里姆克（Sarah Grimké）所说："要改善和提高女性的处境，让她得到合适的环境发挥作用和承担责任，几乎没有比法律更大的障碍了。制定的法律摧毁了她的独立，粉碎了她的个性。法律虽然是为她的政府设计的，她却对制定法律没有发言权，而这些法律夺走了她的某些基本权利。"[46]

展现才干的自由改善了很多人的境况，包括受压迫者、一无所有者、地位低下者和贫穷者。自立障碍的消除和积极主张个人责任促进了自立自助。

但也有其他的手段。首先，与古典自由主义广为相关的是倡导慈善作为改善大量穷人的手段。慈善最好由自愿的团体提供，以帮助那些因为运气太差而陷入困境的人，或者那些需要他人帮助的人。对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关键是避免永久性依赖的情况。因此，伯纳德·柏桑奎（Bernard Bosanquet），英国慈善组织协会的支持者，深刻地批判制度化的贫困，批判将穷人视为一个阶级的制度，这表现为，将之视为现代

思想中的道德观念，视为同情心和自我牺牲的永久性对象。曾有这样的说法："贫困成为了统计数字"。"下等人"成为了一个社会阶层，具备刺激他人善心的被动的社会功能。[47]慈善的目的不是导致进一步的依赖，而是培养慈善受惠者照顾他自己和他家人的能力。柏桑奎认为基于命令和中央计划的经济社会主义会产生自私自利，而自愿合作则产生对他人的尊重和同情。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活体验看来验证这种预言。[48]甚至在现代福利国家的情况中，如诺曼·巴里（Norman Barry）所说："现在的经验表明，福利制度远非鼓励具有共产思想和关心社会的'个人'，而仅仅是在一种不同的情况下再度产生传统的'经济人'"。[49]

在首先通过废除个人自由展示能力的障碍以促进自立自助之后，古典自由主义者积极地推动并参与各种"友好团体"、"兄弟会"和"互助组织"。这些社团将没多少办法的人的努力成果和他们面临的风险都集中起来。友好组织在其社会运动的高峰时期，活跃的成员有数百万，这让现在更为知名的当时的工会运动相形见绌。虽然其中有些团体的根源甚至可溯及古罗马时代的丧葬协会，但它们前所未有的兴旺繁荣却是在18、19和20世纪的中早期。如奥托·冯·基尔克（Otto von Gierke）1868年观察"互助协会法"："在我们的世纪，自发的创造性权力回到了人民手中，自由个人的互助协会从未完全灭绝，如今已经发展了大量的不同分支，能够适应最为广泛的目的。"[50]

这种互助协会不仅对疾病、事故、死亡和其他灾祸提供保险，而且还会促进良好的品行和美德，比如礼貌、尊重妇女（殴打妻子的男性成员通常将被驱逐出会）、节制和慈善。通过自愿的联合，它们超越了常与古典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责任，自愿地包括了形式多样的集体责任和互动合作。这些通常是古典自由主义对自由和社会秩序的观念中不受重视的部分。大卫·施密茨（David Schmidtz）曾表示"正是内在化

的责任感（而非个人责任本身）让人们的生活得更好；引导人们把他们自己作为一个群体的责任机制也有助于内在化责任感，即使是以集体的方式。这样也能使人们的生活更加美好。”[51]在古典自由主义实现社会的秩序和发展的方法中，互助是历史上的关键因素。与婚姻类似，古典自由主义者并不会将这种组织视为对自由的限制，而是对自由的实践。

互助组织可能是有史以来文字记录最少的伟大社会运动的代表（参见大卫·格林和大卫·贝托在本书中的文章）。因民间结社的障碍减少或消除，它们在许多国家兴起，因以基于精算的可靠保险政策的营利性公司与它们竞争，它们日渐式微。实际上，某些互助组织转型成了保险公司，如美国现代伍德曼保险公司（the Modern Woodmen of America）、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和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ropolitan Life）[52]，而福利国家取代了它们。[53]

劳动阶层的人们会区别值得同情的贫困和不值得同情的贫困。将资源集中的互助穷人群体并不承认任何无条件获得帮助的权利，而要区分哪些值得帮助和哪些不值得，不值得的人要么因为在他们有能力提供帮助时对别人袖手旁观，要么因为他们自作自受才穷困潦倒。

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和自愿组织的领导人一样，关注培养那些能适合在文明社会中取得成功的性格特征。用格林的话来说，互助组织的成员“不是由于物理空间上的接近，而是由于他们对共享理想的热爱而团结。社团的中心目的是促进良好的品行，某些自由主义的提倡者趋于认为良好的行为和对更好生活的渴望是理所当然。”[54]的确，从互助组织获得救助是权利问题，但不是一种不劳而获或无条件的权利。

互助让穷人能逃避与慈善相伴而来的家长式的傲慢施舍，通常只有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下才寻求慈善。贫困困苦是个人要努力避免而不想欣

然接受的一种状态。

慈善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它通常在帮助穷人的序列中只排名第三，在自助和互助之后。征税以进行转移支付被认为是最不可取的手段，只有在其他改善大量的穷人的方式都不可用或不充分时才能采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文章《劳工的主张》（*The Claims of Labour*）中写道：

不管在这个国家或是在其他大多数国家，施舍金钱救济穷人从来不是一种罕见的美德。已经有大量的慈善机构和对穷人的捐款。如果新形式的苦难或者以前被忽视的穷苦阶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么以前怎么帮助其他人，现在就怎么帮助他们，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55]

长期以来，施舍救济被认为与神圣的义务相关，并且不出意外的话常由宗教机构来组织。在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中，通常把救济穷人理解为一种慷慨和富有同情心的活动。[56]因此，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救助危难之人的道德义务是不幸带来的一种结果，并且以推动各种各样广泛的自愿安排来提供这种救助。自愿的救助是美德，值得赞扬，但强制性的不是。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可找到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虽然行善的情感在道德高尚的行为中是一种必要的元素（“如果没有伴随着自我认可的感情，任何行为都不能恰当地称之为美德”），[57]但公平的因素压倒了善行和慈善：他指出“我们感到自己受到更加严格的约束，依照正义行事要超过依照友谊、仁慈或慷慨行事。实行上面提及的这些美德，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听任我们自己选择，但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们感觉受到为了奉行正义，某种特殊方式的束缚、限制和制约。”[58]亚当·斯密说：“因而，我们必须始终小心地区别：什么只是该受责备的，或是恰当的谴责对象，而什么是需要使用强力来惩罚或阻止的。”[59]这段话代表了他之后大多数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核心道德承诺

之一。

后来的功利主义者提出将财富从富人那里重新分配给穷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拿走了对前者价值微不足道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对后者却价值更大。这种说法受到古典自由主义者坚决的反对，他们在这种观念中看到了对自由与繁荣的社会赖以为存的普遍规则的威胁。[60]因此，用斯密的话说："个人决不应当把自己看得比其他任何人更为重要，以致为了私利而伤害或损害他人，即使前者的利益可能比后者的伤害或损害大得多。穷人也决不应当诈骗和偷窃富人的东西，即使所得之物给前者带来的利益比所失之物使后者受到的损害更大。"这样做会违反"某一条神圣的规则，就是在大致遵守这一规则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类社会的所有安全与和平。"[61]

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对功利主义者再分配的主张直言不讳：平均收入或财富以最大化福利将有效地消除与财富相关的更高级的文化消费，而再分配的鼓吹者一直强调这种文化，呼吁税收转移以支持文化建设。德·茹弗内尔谈到："所有再分配的极端鼓吹者都同时要求政府慷慨解囊以支持文化活动的上层建筑。"[62]他指责他们自相矛盾，因为功利主义者为福利最大化再分配收入的主张被政府转移财富支持受优待的文化机构："因此出现了矛盾，而且是极为明显的矛盾。那些因为这种（文化）支持计划而自发矫正其再分配方案的人，实际上是否认了资源和行为的理想化分配是能最大化满足感的分配。"[63]

J.S.穆勒指出"对上等阶层强加一种道德或法律的义务，要他们为下等阶层的良好行为和幸福生活负责"不是自由社会的特征，而是不自由社会的特征。正如他所说："新慈善家（指强制救助的鼓吹者）所争取的理想的社会状态"是"俄国农民"的状态。他继续说道，"其他的劳工们不仅仅是耕种土地，他们也是大企业的工人，也会参与生产制造业；我们本

国的法律，或者是我们当代的法律，会强迫雇主替什么人提供健康的食物，以及充足的住所和衣服？这些人是谁？是西印度庄园的奴隶。”[64]

强制性的救助在古典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中不仅与傲慢的施舍相关，而且与家长制的控制体系相联系。济贫法的经验和与之相关的行为控制仍然令19—20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记忆犹新。穆勒说道：“欧洲有些政府认为负责人民物质上的幸福和舒适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但是家长式的照顾与家长式的权威紧密相连。在这些国家中，我们发现对婚姻的严厉限制；除非让当局满意于他挣钱养家的合理前景，否则不许他结婚。”[65]

对这种控制的恐惧激发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对“福利改革”方案的大量反对，或至少是焦虑不安，该方案要求把为国家劳动作为接受救助的条件。

关于强制性再分配的主要顾虑与对济贫法的批评密切相关，而关于福利政策和“外国援助”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类措施是否的确改善了穷人的状况，或只是使得鼓吹实施这些措施的人自我感觉良好，仿佛他们已免除了道德义务，不是通过帮助他人，而是通过政策呼吁。对绝大多数古典自由主义者而言，评估政策重要的是看实际后果，而不仅仅是阐明的意图。[66]因此，当谈到再分配计划时，基于强制的国家救助是否实际表现为穷人状况的改善？这一问题一直是古典自由主义者关注的中心。

在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优先顺序的列举中，威廉·勒普克（Wilhelm Röpke）表示：“我们的规则和标准同我们完全乐于接受的理想应该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责任获得保障，以互助作为补充。”[67]某些古典自由主义者接受国家提供最基本的救助，勒普克则与之不同：

当今时代，我们不能没有某些最基本的关于社会保障的强制性国家制度。公共养老金、医疗保险、事故保险、寡妇补助金和失业救济——在关于一个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原则中，自然会有所有这些政策的一席之地，不管我们对之有多么不热心。需要讨论的不是它们的原则，而是它们的程度、组织和精神。[68]

因此，许多古典自由主义者已经接受了某些国家救助政策，只是有些勉强，并将之作为帮助穷人最不得已的手段。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了两条理由，为了达到帮助穷人的目的，可支持有限程度的政府强制。第一条理由是行使法律强制以迫使人们为了自己的养老去购买年金，因为“挥霍无度的人不用承受自己行为的苦果，却给他人强加了成本。也就是说，我们不愿意看见贫困的老者遭遇悲惨的困境。我们应该通过私人和公共的慈善帮助他们。既然不能自己养老的人会成为公共负担，那么强迫他们购买年金就是正当的，不是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其他人的利益。”[69]他随即指出：“这一主张的重要性明显是依据事实。”第二条理由是实施法律强制以迫使纳税人作为一个阶层支持那些陷入困境的人，这也是由于政府强制提供一种集体的（或公共的）利益是自由主义范围中可接受的：“私人慈善不充分可以得到证明，因为人们能从中获得好处，而不仅是那些作出捐赠的人……我为贫困的景象感到不安。我将从减轻贫困中获益；但不管是我或其他人为减轻贫困付出，我都同样获益；因此，我受惠于其他人的慈善行为。”用弗里德曼的话说，这种考虑会建立“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人生活水平之下的最低标准”。[70]

F.A.哈耶克虽然不是热衷于福利国家的人，但他也认为，基于提供公共利益，某些政府提供的有限福利是与古典自由主义原则兼容的：“所有现代政府都已为贫困者、不幸者和残疾人提供救助，并认为医疗和知

识的传播是与它们相关的问题。没有理由认为这些大量的纯粹服务性的行为不能增进普遍的财富增长。共同的需要只能由集体的行动满足，而无须限制的个人自由就可提供这种行动。”[71]

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公共利益主张遭到了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的反对，他提出了一种逻辑更一致的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国家主义的解释。在讨论了公共利益的经济学和伦理后，诺奇克得出结论：“既然强迫财产所有者违背其意愿进行捐助会违背道德准则，那么这种强制行为的支持者应该试图劝说人们忽视那些不赞同自愿捐助计划的少数人。或者，是那些不想觉得自己是‘冤大头’的人迫使相对多数的人进行捐赠？即使他们本来能够不做这种选择。”[72]

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关于这些话题的争论十分活跃，他们集中于若干问题，比如政府机构的能力和可信赖性如何——即使在民主监督之下——或许，是否有任何强制从根本上符合自由主义的原则，以及是否哪怕国家提供“安全网”也会启动培养依赖性的进程，并取代与古典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的互助协会网络。

法学理论家A.V.戴雪（A.V.Dicey）明确表达对国家救助的恐惧，这种恐惧普遍存在于古典自由主义者之间：

尤其以立法形式进行的国家干预，其积极效果是直接的、即时的，也就是说，是有目共睹的；而它的恶果却是渐进的、非直接的，而且远离视野的……几乎没人意识到这一不容否认的真理，即国家的救助毁掉了个人自立自助。因此，人类的大多数几乎必然不可避免地期待着干预的不当青睐。在某一特定的社会中，这一自然倾向只会因存在着有利于个人自由的观念或成见而受到阻碍——也即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思想，比如1830—1860年间的英格兰就是如此。所以，仅仅是对自立

自助的信心的下降——而这种下降的发生是必然——已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倾向立法的增长。[73]

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中，将国家提供的服务的增长和用强制手段替代自愿行为的措施的增长视为“新托利主义”和“奴隶制来临”。[74]与18世纪末期的其他古典自由主义者相似，他将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都是以集体主义为共同根源的产物。[75]

对国家救助的恐惧不仅限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这曾是，且至今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谈到：“致力于帮助因命运而较不得势的阶层减少他们的不幸，帮助他们尽力跻身于国民中的幸运儿之中，没有什么政府的职责比这更为引人注目和崇高神圣。但请记住，如此众多的人类的所有苦难正是源于这种社会组织的种种缺陷，而强加保障和平均分配生命中美好事物的任务是完全忽视了人类的状况，是抛弃了人类自由的内在责任，并且是通过虚假的希望激发的糟糕的激情。”[76]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对济贫法嗤之以鼻，因为它毁掉了慈善，使人心冷酷：“有什么东西能如此有效地抑制和毁灭真正的同情心——所有满怀希望却最为节制的乞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每个人都讨厌这样的乞丐吗——他虽然发现在救济院得到救助更为方便，却宁愿在饥寒中苦苦挣扎中找到不仅是一只扔给他少量食物的手，而且还有一颗充满同情的心。”[77]

剩下的问题是对穷人的道德责任的程度问题。从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里并不容易回答这些问题，原因很简单：古典自由主义思想会区分（而很多其他的传统不区分）——哪些义务和责任能够强制执行，哪些不能。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可能接受什一税（Tithing）或天课（Zakat）的义务，但会坚持这种义务不能强制履行，这是一个人宗教

信仰的表达，因而是道德的、非法律的义务。古典自由主义普遍性的趋势已广泛地促进了对个人本身的关注，而不是对宗教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的关注。不得伤害他人的责任适用于所有人，不管他们是否是某人自己共同体中关系密切的成员，也不管他们是否是居住在遥远国家的完全陌生的来客。如亚当·斯密所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纯粹的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仅仅阻止我们去伤害我们的邻人。一个仅仅不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的人，的确只有非常少的积极美德。然而，他却履行了所有被特别地称为‘正义’的全部规则，并做了与他地位相等的人能够正当地强迫他去做、或者他们能够因为他不做而惩罚他的一切事情。我们经常可以以静坐不动和什么都不做的方式来遵守关于正义的全部规则。”[78]在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里，积极义务通常通过某人的行为获得（它们是后天的，而不是先天的）。[79]就其本身而言，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有，或被赋予对特定的人（由于他们相对贫困）有可强制执行的特殊义务。因为致力于消除不正义，古典自由主义者以某些人对他人施加伤害的形式，领导了废除强迫劳动和奴隶制的国际运动。[80]这些运动促进了人类最穷和受到最大伤害的成员的自由和幸福。同样地，对自由贸易的道德紧迫感使他们将大量注意力集中在拒绝为改善穷国人民的福利提供机会这一问题上；这些人在有利于比他们富得多的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下成了牺牲品。他们从对行为的强制性控制中解放穷人，这对穷人大有好处，同样对所有从事贸易的人也大有好处；古典自由主义者看到了互惠贸易中的收益——消除对某人自由买卖的能力的限制，并不是对他人做出让步。19世纪的德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约翰·普林斯·史密斯（John Prince Smith）认为：“废除进口关税，主要是对我们自己做出的经济上的让步，而不是仅仅对外国的让步。”[81]

同样的逻辑已运用于移民，因为古典自由主义者广泛地推动迁徙自由，正如贸易自由那样。[82]就此而言，古典自由主义者是通过言论、贸

易和旅行自由实现“全球化”的积极支持者。社会主义者和福利国家主义者却积极地捍卫对移民的限制。他们用铁丝网、武装巡逻以及其他的暴力形式限制移民，将绝望的穷人拒之于富国之外。而在这些国家他们本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命运。古典自由主义者一贯反对这样的限制，支持贸易、旅游和移民自由，他们认为这种自由是国家再分配计划的极佳替代品。他们通常主张，国家再分配计划无法成功地将人民从贫困提升到富有。

尽管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之间常有重大的分歧，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创造更多的财富是缓解贫困的解决之道。并且，因为结果本身通常不是选择的对象，公正和有效的制度才是增加财富和减少贫困的关键。此外，虽然许多人对国家向穷人提供救助留有余地，但都同意缓解贫困的手段有优先顺序，级别依次是个人责任及自救、互助、慈善和最不可取的方案——国家强制。

注：

[1] 参见John Locke，*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ed.Peter Laslet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Second Treatise*，VI，pp.57，306.请注意，洛克的术语“财产”包括的范围远不止它在当代英语中的含意，在当代英语中此词仅表示洛克称之为“不动产”的东西。相反，洛克指的是“生命、自由和不动产，我统称为财产。”同上，*Second Treatise*，IX，pp.123，350.同样比较詹姆斯·麦迪逊的文章“论财产”。“这个词在其特定应用中表示‘一个人排除所有其他个人声称并利用控制世上的外部事物的所有权。’在其更广、更公正的含义里，它包含了一个人可能赋予价值并拥有权利的所有事，其他所有人对其没有可能的优势。”*National Gazette*，March 29，1792，http://press-pubs.uchicago.edu/founders/documents/VIchI6823.html.

[2] 参见Anthony de Jasay，“Liberalism，Loose or Strict”，*Independent Review 9*，no.3（Winter 2005），pp.427–432.

[3] Robert 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New York:Basic Books，1974），p.ix.

[4] 杜格尔德·斯图尔特在他已丢失的稿件“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汇总”中引用了这段话，参见Adam Smith，*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ed.W.P.D.Wightman and J.C.Bryce，vol.3 of the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Adam Smith*（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82），p.322.

[5] 参见Nathan Rosenberg and L.E.Birdzell Jr.，*How the West Grew Ric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World*（New York:Basic Books，1986），p.3.

[6] 参见Deirdre McCloskey，“1780–1860:A Survey”，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vol.I: 1700–1860，ed.Roderick Floud and Deirdre McCloske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42.

[7] 参见Peter Bauer，*From Subsistence to Exchang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0），p.6.

[8] 参见Carlo Cipolla，*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European Society and Economy*，1000–1700（New York: W.W.Norton，1980），pp.9–10.

[9] 同上，18～19页。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对获取营养在消除贫困上所起的作用寄予厚望：

“18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展的相对优厚的扶贫计划，和马尔萨斯等人对这一计划的恶毒攻击，造成了政府转移支付对乞丐和流浪者数量的持续下降起了关键作用的假象。尽管在1750—1834年英国的济贫相当慷慨，乞丐和流浪者的数量在10%～20%之间波动。尽管作为1834年济贫法的结果，转移给穷人的国民收入的比重出现大幅削减，流浪者的数量却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急剧下降。事实是，政府转移支付没有能力解决18世纪和19世纪大部分时间乞丐和流浪者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长期营养不良。即使在救助计划最为慷慨

的阶段，英国人口的最后五分之一也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其缺乏工作所需的足够的能量。

即使在通过进口补充的时候，18世纪末英国的农业也没有足够的生产能力来为80%以上的劳动力提供维持日常手工劳动所需的卡路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的生产力大幅提高，这使得即便是穷人也能拥有相对较高的卡路里水平。以19世纪的标准来看，乞丐和流浪者被减少到相当低的水平，人口最后的五分之一也能获取到足够的卡路里以从事日常工作。”

Robert William Fogel，*The Escape from Hunger and Premature Death，1700–2100: Europe，America，and the Third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41–42.

[10] 参见F.A.Hayek，*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pp.130–131.

[11] 经典的反驳可以在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s January 1830 review of Robert Southey’s 1829 Tory attack on industrialism，*Sir Thomas More；or，Colloquies on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Society*，in“Southey’s Colloquies，”in Macaulay，*Critical and Historical Essays*，vol.2（New York:Dutton，1967），pp.187–224中找到。另见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1760–183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的总结。

[12] Thomas Babingtom Macaulay，*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Accession of James II*（Philadelphia：E.H.Butler，1849），291–292.正如麦考利在其《骚塞谈话录》中指出的，“如果我们预言，在1930年，英伦各岛会有5000万的人口，他们有着比我们这个时代的英国人更好的衣食住行；苏塞克斯和亨廷顿郡会比约克郡西区现在最富有的部分更加富裕；耕种将会被移至本尼维斯山和赫尔维林峰的高峰，农田富丽如园圃；每家每户都有用目前尚未发现的原理建造的机器；铁路取代了公路，行驶取代了徒步；在我们看来很大的债务，在我们孙辈眼里只是小事一桩，只消一两年就能付清，许多人会认为我们疯了。”（223页）

[13] Étienne Bonnot，Abbé de Condillac，*Commerce and Government*

Considered in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trans.Shelagh Eltis（Cheltenham:Edward Elgar，1997），p.103.

[14] 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vol.2*，ed.R.H.Campbell and A.S.Skinner（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81），pp.869–870.

[15] “由于这个产物（或者说用它来购买的产品）与消费它的人数之间保持着一个时大时小的比例，这也就将是一个国家随时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得到的供应的好坏。”（《国富论》，谢祖钧译——译者注）Adam Smith，*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vol.I，ed.R.H.Campbell and A.S.Skinner（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1），p.10.

[16] 参见Adam Smith，*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ed.R.L.Meek，D.D.Raphael and P.G.Stein（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1982），p.567.

[17] 参见Gordon Tullock，“The Welfare Costs of Tariffs，Monopolies，and Theft，”*Western Economic Journal 5*，no.3（June 1967），pp.224–32，以及Anne Kruege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nt-Seeking Socie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4*，no.3（June 1974），pp.291–303.

[18] 对于20世纪最惊人的案例的详细描述，参见Götz Aly，*Hitler’s Beneficiaries:Plunder，Racial War，and the Nazi Welfare State*.

[19] 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W.H.哈特解释了种族隔离制度的起源和功能。W.H.Hutt，*The Economics of the Colour Bar*（London:Andre Deutsch，1964）.白人统治的贸易工会成功地对黑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强加限制，因此消除了竞争对手，并获得了特殊租金。另见Ralph Horwitz，*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 Africa*（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 Publishers，1967）.

[20] 把驯服暴力作为创造储蓄、投资和生产力的一种手段是罗伯特·H.贝茨（Robert H.Bates）的*Prosperity and Viole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ment*（New York:W.H.Norton，2001）一书的主题。

[21] 关于自由主义的美德的研究，参见Deirdre N.McCloskey，*The*

Bourgeois Virtues:Ethics for an Age of Commer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另见：Thomas L.Haskell，“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parts I and II，*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0*，no.2（April 1985），pp.339–61 and no.3（June 1985），pp.547–66.

[22] “1795年之后许多南方的教区，遵循斯品汉姆兰的法官的政策，开始根据基于面包价格和家庭大小的尺度给予院外救济。其中没什么好反对的：只有明智和人道的人才能看到穷人的收入不会低于最低生活保障。但是当局的许多人，混淆了工资收入者的问题和被救济者的问题，承诺弥补劳动者工资低于他们的标准的量。与收入成反比的救济补助是补贴的最坏形式，因为其破坏了工人去要求，或者雇主去提供更高工资的激励。”T.S.Ashton，*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p.89.

[23] Alexis de Tocqueville，*Memoir on Pauperism*（Chicago:Ivan R.Dec.1997），p.37.

[24] 同上，p.58.托克维尔清楚地区分了“自愿慈善”和“法定慈善”，并赞同前者为在“两个阶级之间”建立了一个“道德联系”，“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和激情常常共同作用使他们彼此分开，而即便被环境分开，他们是乐意被调解的。”法定慈善则不同。后者允许救济的存在，但去除了其道德性。法律剥夺了富人的一部分盈余，而不用参考其意见，而他仅仅把穷人视为立法者招致来瓜分他财富的贪婪陌生人（60页）。

[25] 同上，62–63页。

[26] 参见比如，Jason L.Riley，*Let Them In: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esp.91–125里面的研究。莱利总结说，“如果保守派担心僧多粥少——而且他们对任何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感兴趣——他们应该努力去限制福利支出，而不是移民。”（125页）

[27] Benjamin M.Friedman，*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Alfred A.Knopf，2005），p.39.

[28] 参见，比如，Franz Oppenheimer，*The State*（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14）.

“有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人依靠它们获取物资满足他的欲望的必要方法。它们是劳动和抢劫，即一个人自己的劳动力和强行占有别人的劳动力。”（24页）另见：Vilfredo Pareto，*Sociological Writings*，ed.S.E.Finer（Totowa，NJ:Rowman and Littlei eld，1976），特别是对“掠夺”的讨论。

[29] 参见Herbert Spencer，*Structure*，*Function and Evolution*，ed.Stanislav Andreski（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1），pp.153–165.

[30] 参见国家强制种族基础的劣势的内容，Walter Williams，*The State against the Blacks*.

[31] 亨利·萨默·缅因（Henry Summer Maine）从基于家庭成员的继承关系到作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的个人自由和公民社会描述了“进步社会运动”。参见Henry Summer Maine，*Ancient Law*（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2003），p.170.

[32] E.L.Godkin，“The Eclipse of Liberalism，”*The Nation*，August 9，1900.他延续了一个非常悲观的脉络，“但现在看来，其物质享受已经蒙蔽了当代人的眼睛，这是其发生的原因。在全世界的政治上，自由主义是一种在衰退，几乎是一种已死去的力量。”

[33] 参见G.A.Cohen，“Incentives，Inequality，and Community，”in *The Tanner Lectures on Human Values*，vol.13，ed.B.Peterson（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1992），pp.263–329，以及Phillip Green，*The Pursuit of Inequality*（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1）.

[34] 参见Jean-Baptiste Say，*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Augustus M.Kelley，1971），p.133.

[35] 同上，137.另见：Jean-Baptiste Say，*Letters to Mr.Malthus*（London:Sherwood，Neely，and Jones，1821），pp.3–4：“让我们仅仅回望两百年，并假设一个商贩带了大量的货到现在是纽约和费城的地方；他能把它都卖掉吗？甚至我们假设，他已经在那里成功地创办一个农业或制造业设施；他能在那里卖出他生产的一件商品吗？毫无疑问，不能。他只能

自己消费它们。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恰恰相反？为什么运送到费城或纽约，或者在那里制造的商品一定是以目前的价格出售？在我看来，显然是因为种植者、贸易商、现在甚至是纽约、费城和临近各州的制造商创造或输送了一些产品，依靠他们购买从另外两者那里带给他们的东西。”古典自由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含意是显而易见的，并严重削弱了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重商主义主张的论据。

[36] Douglass C.North，“Institution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5*，*no.I*（Winter 1991），p.97.另见：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W.W.Norton，1981），pp.201–202：“制度是旨在为了最大化原则的财富或效用而约束个人行为的一套规则、合规程序和道德伦理规范。”

[37] Daniel Shapiro，*Is the Welfare State Justified?*p.5.

[38] “国家能够通过立法制订一个最低工资率，但它很难要求雇主按照最低工资雇用所有以前在最低工资率以下被雇用的人。”（《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译者注）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2002），p.180.

[39] Mancur Olson，*Power and Prosperity*（New York:Basic Books，2000），pp.111–34.

[40] Vilfredo Pareto，*Sociological Writings*，p.162.

[41] 对于当代的证据，参见W.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Myths of Rich and Poor*（New York:Basic Books，1999），尤其是对收入的向上流动的讨论（69～78页）。

[42] Ludwig Lachmann，“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in Lachmann，*Capital*，*Expectations*，*and the Market Process*（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1977），p.313.

[43] Jean-Baptiste Say，*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p.62.

[44] 乔伊斯·艾波（Joyce Appleby）在她的一章《作为证据来源的荷兰》

中指出，为什么相对“资源贫困”的荷兰达到了人均财富的极大高度：“荷兰人一直愿意通过保护个人主动性的兴盛来培育市场这个复杂的社会组织。”参见*Economic Thought and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8），p.96.200 Adam Smith，*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p.322.

[45] 参见Sarah Grimké，“Legal Disabilities of Women，”in *Freedom，Feminism，and the State*，ed.Wendy McElroy（Oakland: Independent Institute，1991），p.107.

[46] 参见Bernard Bosanquet，“Institutions as Ethical Ideas，”in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Related Essays*，ed.Gerald F.Gaus and William Sweet（South Bend，IN:St.Augustine’s Press，2001），p.280.

[47] 如古典自由主义的苏联异见人士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在其回忆录里所指出的，“赫鲁晓夫在他的一次讲话里离真理不是很远：‘如果我们国家的人们停止偷盗哪怕一天，共产主义早就建成了。’但他未能理解的事情是，离开了偷盗，苏维埃制度根本无法运作。没有那些粉饰过的数据和操纵，没有一个目标能被达成，而没有这个私人（因而非法）的主动性，我们国家什么也生产不出来。所有那些已成为名胜地、没有数百万营业额的集体农庄和国家农场，如果它们没有被骗子们管理的话，一分钟都不能生存。”Vladimir Bukovsky，*To Build a Castle:My Life as a Dissenter*（London:Andre Deutsch，1978），pp.150–151.

[48] 参见Norman Barry，*Welfare*（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1990），p.120

[49] 参见Otto von Gierke，*Commun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ed.Antony Black（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205.另见Antony Black，*Guild and State*（New Brunswick，NJ: Transaction，2003），esp.pp.167–183.

[50] 参见David Schmidtz，“Taking Responsibility，”in David Schmidtz and Robert E.Goodin，*Social Welfare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p.95.

[51] 参见David Beito，*From Mutual Aid to the Welfare State:Fratern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ervices*，*1890–1967*，p.24.

[52] 大卫·格林重视医学界在促进1991年国民保险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中的参与，该法用由医生和他们的政治盟友控制的垄断取代了由多个劳动人民友好组织创造的竞争市场。参见：David Green，*Working Class Patients and the Medical Establishment*；如格林冷冰冰地所指出的那样，用不自愿的税替代自愿会费来作为支付来源的结果是，“付款增长远比在市场中容易得到。”（115页）。另一个结果是友好组织的衰落，因为劳动人民发现他们在为同样的医疗服务付两次钱——一次给友好组织或附属医疗机构，而另一次给国家。

[53] 参见David G.Green，*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p.46.

[54] 参见John Stuart Mill，“The Claims of Labour，”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4: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Society*，part I，ed.John Robs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7），p.372.

[55] 用伯纳德·鲍桑奎（Bernard Bosanquet）的话来说，“道德……在于社会目的通过自身力量对个人意志的作用。经济社会主义是一种让社会目的不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而是通过那些在公共权力的命令之下的强制性运动或制裁获得开展的安排。”Bernard Bosanquet，“The Antithesis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ism”（1890），in Bosanquet，*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Related Essays*，p.329.另见：Tibor R.Machan，*Generosity:Virtue in Civil Society*（Washington，DC:Cato Institute:1998）.

[56] 参见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82），p.178.

[57] 同上，p.80.

[58] 同上。

[59] 参见同上，p.163：“如果没有这个对普遍规则的神圣考虑，则没有人的行为可以被如此依赖。”

[60] 同上，p.138.

[61] 参见Bertrand De Jouvenel，*The Ethics of Redistribution*，p.42.

[62] 同上，p.44.

[63] 参见John Stuart Mill，“The Claims of Labour，”p.374.

[64] 同上。伯纳德·鲍桑奎注意到了没前途的福利国家提供史：“我们常说一百年前工厂发展的时期是纯粹的经济个人主义的时期。但事实并非如此；或许那时的万恶之首直接从故意松懈或‘社会主义’济贫法那里产生了。提供被虐待的儿童的大多数情况下正是公共机构。”Bosanquet，“The Antithesis between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ism，”p.330.

[65] 参见大卫·斯密特的文章，Schmidtz and Goodin，*Social Welfare and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especially the section on“Consequences Matter，”pp.86–88.

[66] 参见Wilhelm Röpke，*A Humane Economy: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Free Market*（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71），p.177.

[67] 同上，p.175.

[68] 参见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p.188.

[69] 同上，p.191.

[70] 参见F.A.Hayek，*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257.

[71] 参见Nozick，*Anarchy*，*State*，*and Utopia*，p.268.

[72] 参见A.V.Dicey，*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dianapolis:Liberty Fund，2008），p.182.

[73] 参见erbert Spencer，*The Man vs.the State*，in *Political Writings*.

[74] 关于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知识根源，参见Sheri Berman，*The Primacy of Politics: Social Democracy and*

the Making of Europe's Twentieth Century。

[75] 参见François Guizot，“Mémoires pour server à l'histoire de mon temps，”in *Western Liberalism:A History in Documents from Locke to Croce*，ed.E.K.Bramstead and K.J.Melhuish（London:Longman Group，1978），pp.335–336.

[76] 参见Wilhelm von Humboldt，*The Limits of State A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p.40.另见德国自由主义者对俾斯麦的现代福利国家的反对的描述：Ralph Raico，“Der Aufstieg des modernen Wohlfartsstaates und die liberale Antwort，”in Raico，*Die Partei der Freiheit:Studien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Liberalismus*（Stuggart:Lucius&Lucius，1999），pp.153–179.

[77] 参见Adam Smith，*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p.82.

[78] 比较塞缪尔·普芬道夫（Samuel Pufendorf）在“先天的”和“后天的”义务：“现在，义务可以根据其产生的原因，被划分为先天的后天的。前者属于所有人出生后根据他们出生这一事实立即拥有的，考虑到他们的年龄，一旦他们开始有能力理解其力量并通过理性规范他们的行为便充分发挥其作用……后天的义务是那些已经出生的人，或那些由长官的命令或法律吩咐的人自愿承担的义务。”*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SamuelPufendorf*，ed.Craig L.Carr，trans.Michael J.Seidler（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50.

[79] 参见，在*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Turgot*，ed.W.Walker Stephens（New York:Burt Franklin，1971），esp.pp.124–149一书中描述的，安妮·罗伯特·雅克·杜尔哥在法国所做的消除强迫农民劳动（the corvée）的努力。

[80] 参见John Prince Smith，“On the Significance of Freedom of Trade in World Politics，”in Bramstead and Melhuish，*Western Liberalism*，p.357.古典自由主义者对单边自由贸易的价值的坚决主张在近几年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参见Razeen Sally，*Trade Policy*，*New Century:The WTO*，*FTAs*，*and Asia Rising*（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2008）.

[81] 关于最近的著作，参见Philippe Legrain，*Immigrants:Your Country Needs Them*（London:Little，Brown，2006），以及Jason L.Riley，*Let Them In: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82] “全球化”一词有很多含义。例如，苏联让全世界被强加共产主义一党制的项目，这是一种“全球化”。即使是民族主义和反世界主义势力也在推动一种“全球化”，以一种竞争性民族主义的形式，这是一种蕴含着无尽冲突的理念。古典自由主义者已通过自愿贸易、观光、旅行、移民和思想交流促进了某些和平互动的普遍标准。其结果是与各种各样的不同文化形式兼容的，尽管对那些被不同意的各方强加武力任何人是有敌意的。关于古典自由主义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参见：Tom G.Palmer，*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Homogeneity，Diversity，Identity，Liberty*（Berlin:Liberales Institut，2004），http://tomgpalmer.com/wp-content/uploads/papers/liberales2.pdf，and“Globalization，Cosmopolitanism，and Personal Identity，”*Etica&Politica*，no.2（2003），http://tomgpalmer.com/wp-content/uploads/papers/palmer-globcosmoidentity.pdf.古典自由主义者已经被社会主义批评家贬低为“新自由主义者”，这是一个实际上没有古典自由主义者接受的词，部分是因为这个词被用来不仅指自由贸易、旅游和移民，而且常常指由国家支持的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支持的非常狭隘的国家主义发展计划，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历来反对的。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附录　市场的德性

THE MARKET OF VIRTUE

人们曾反复引用这样一个故事：一次，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应邀前往亚洲参观某开凿大型运河的施工现场。他发现工人在用小铁锹运送巨量的土石。专用的渣土运输设备则杳无踪迹。他感到很奇怪，便询问当地官员。得到的回答是：“你不懂，这是一项就业计划。”弗里德曼便说：“哦，我还以为你们是要开凿运河呢。如果你打算创造就业机会，那么铁锹都是多余，干嘛不给他们勺子呢？”

安·兰德与道德革命[1]

大卫·凯利

在这篇文章中，客观主义哲学家大卫·凯利提出了“第四次革命”的概念，以确立现代世界的基础并捍卫资本主义带来的成果。

大卫·凯利是阿特拉斯学会行政主管，该协会旨在促进客观主义哲学的发展和传播。凯利的著作包括：《感官的证据》（*The Evidence of the Senses*： *A Realist Theory of Perception*）、《推理的艺术》（*The Art of Reasoning*）（美国使用最广泛的逻辑教科书之一）、《自己的人生——个人的权利和福利国家》（*A Life of One's Own*：*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Welfare State*）等等。他曾在瓦萨学院和布兰德斯大学教授哲学。在大众媒体上亦著述颇丰，散见于《哈泼斯杂志》《科学》《理性》《哈佛商业评论》《巴伦周刊》等。

我们有能力开始重新建设世界。

——托马斯·潘恩《常识》

正如我们所料，金融市场的危机已经掀起了反资本主义情绪的高潮。尽管政府的管制是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反资本主义者及其煽动者，纷纷在各种媒体上指责市场，并呼唤新的管制。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早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当前的事态似乎清晰的表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将进一步扩大，远远不止于华尔街。

当今的经济体系构成复杂，而政府的管制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和贸易；二是再分配——将收入和财富从一部分人的手中转移到另一

部分人的手中。在这方面，反资本主义者把握住了机会，大声呼求新的补贴，如医保；随之而来的，又会是进一步的税负。经济危机与巴拉克·奥巴马的当选，使得曾经蛰伏的再分配欲求又一次甚嚣尘上。这种欲求从何而来？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追溯资本主义的起源，并且更加细致地审视再分配的理论依据。

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于1750—1850年，这一巨变是3场革命的结果。第一场革命是政治革命：即自由主义——尤其是自然权利学说——的胜利让人们明白，政府的功能应该仅限于保护个人权利，如财产权。第二场革命是经济学理论的出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便是一例。斯密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当个人得以自由地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时，结果并不会导致混乱，而是会生产一种自发秩序，在市场体系下，个人的行动得到协调，从而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如果由政府来管理经济，则不会有这种效率。第三场革命毋庸置疑是工业革命。技术创新使生产力成倍增长。其效果不仅是提高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令眼光敏锐、勇于进取的人赚取了早先不可想象的财富。

那场政治革命，即自然权利学说的胜利，伴随着道德理想主义的精神。这场革命将人民从暴政中解放，使人们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权为自己而活。但是，人们在道德层面上对经济革命的论述则颇显暧昧。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被许多人视为罪恶的渊薮。基督教向来有对自私和贪欲的禁制，因此，对财富的渴望一直被压抑于阴影之中。早期的自发秩序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力主的是一个道德上的悖论，如伯纳德·曼德维尔所说，恶行却能创造公众利益。

市场制度的反对者总是利用人们在道德上对市场的疑虑来大做文章。这些反对者指控资本主义孕育了自私、剥削、异化和不公，正是在道德批判中，反资本主义运动发展了起来。而福利国家则可以算是反资

本主义情绪的温和表现形式，其实质是通过政府计划来重新分配收入，其名义则是“社会公平”。就社会认知水平而言，资本主义从未摆脱道德上的暧昧性。人们认为资本主义能够创造繁荣，同时也是政治和思想自由的必要前提，这些作用便体现了资本主义的价值。但很少有资本主义的捍卫者能够充满信心的断言，资本主义的典型生活方式，即通过生产和贸易来追求自身利益，在道义上也是光荣的，而将其视为高尚或理想的人，则更是微乎其微。

在道德上对市场的反感，其来源并不神秘。它产生自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利他主义观念，对于其他文化来说，也大抵如此。以利他主义的标准而言，追求自身利益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道德尺度以外的中性行为，若要从最坏处讲，便是一种罪过。诚然，在市场上取得成功须经自愿的交易，因而也就必须满足他人的需求。但成功者的动机源自个人私利，这也是事实。而伦理标准不仅关注业绩，也关注动机。

在日常用语中，“利他主义”一词的所指是善良或公共礼仪。但是从历史和哲学上说，其真正的含义是自我牺牲。对创造该词的人而言，利他主义意味着自我在社会大共同体中的湮没。正如安·兰德所说：“利他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人无权为自己而生，为他人服务是个人存在的唯一理由，而自我牺牲则是道德意义上的最高责任、操守与价值。”因此，严格说来，利他主义便是各色“社会公平”理论的基础。反资本主义者用这些理论来为政府的财富再分配计划帮腔。这些计划强迫为之买单的纳税人做出自我牺牲。这些计划意味着将一部分人看作可供榨取的资源，用以实现另一部分人的目的。为什么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应该从道德的高度反对这样的计划？以上就是根本原因。

对社会公平的欲求

对社会公平的欲求，有两种不同形式，我分别称为福利主义和平均主义。按福利主义的要求，个人有获得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权利，包括衣、食、住、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基本服务。社会有责任确保所有成员都获得这些必需品。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制度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这些必需品。因此，福利主义者主张：由于资本主义无法履行道义上的责任，所以如果有人无力获得生活必需品，那么就必须通过政府行为来为其提供。

按平均主义的要求，社会所生产的财富必须公平分配。如果某些人的收入是其他人的15倍、50倍或100倍，那么就是不公平的。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却允许并鼓励这种收入及贫富差距的存在，因此是不公平的。平均主义的特点是运用统计来描述收入分配状况。例如，2007年，美国最富的20%家庭在收入规模上占全民总收入的50%，而最底层的20%家庭则只占3.4%。平均主义的目标是减少这种差距；平均主义者认为任何趋向平均的变化都是迈向公平的步伐。

这两种社会公平在概念上的区别就是福利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之间的差异。福利主义要求人们能够达到最低的生活标准。只要这一底线或“安全网”存在，那么他人能挣多少，贫富差距多大就无所谓。所以，福利主义者主要对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计划感兴趣，比如低于某种贫困线的穷人，或者是病人、失业者，以及其他的遭遇困苦的人。而另一方面，平均主义者关注的则是相对福利。平均主义者常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平均主义者总是支持政府的再分配措施，如累进税，其目的在于对国民收入整体进行削峰填谷，而不仅仅施惠于底层。他们也易于支持产业的国有化，如教育和医药产业，他们主张以完全排除市场的手段运营产业，以使商品的分配平均化，无论每个人最终能分到多少。

让我们依次来分析这两种概念不同的社会公平。

福利主义：强加的义务

福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人们有获得基本商品的权利，如食品、住房和医疗。得到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的。在此假设之下，获益于政府福利计划之人，只是得到了应该得到的东西而已，就像买方付了钱就自然要拿到东西，都是天经地义的。国家分配福利，仅仅是在保障权利，就像保护买家免受欺诈。在类似的情形之下，人无须心存感激之情。

福利权，或者说是积极权利，其概念仿自传统自由主义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但是两者之间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差别。传统的权利是行为不受他人干涉的权利。生命权是一项旨在保护自己的权利。它不是一项避免自然死亡，哪怕是早殇的权利。财产权是自由买卖的权利，是从自然界占有无主物的权利，总之是寻求财产的权利。但绝不是从自然界、从国家获取馈赠的权利，不是某人可以成功获取某物的保证。因此，传统的权利要求他人履行的只是消极义务，只要不干预、不强行限制他人的自主选择即可。例如，不妨这样设想，假如我搬到一个荒岛上去生活，远离社会，那么我的权利便能得到充分保障。我可能不会长寿，生活条件也肯定不会很好，但我可以过自由的生活，不必担心谋杀、盗窃和人身侵犯。

相比之下，福利主义者认为福利权就是占有并享受某些商品的权利，与个人的行为无关，即便个人无力获取这些商品，他也有权让社会为其供给。因此，福利权是在将积极义务强加于他人。如果我有得到粮食的权利，那么他人便有种植的义务。如果我买不起，那么他人便有义务买给我。福利主义者有时会辩解说这种义务是强加于社会整体的，而

非特定的个人。但社会并不是一个实体，更不是社会个体成员的道德中介，因此任何此类义务都会落到我们个人头上。例如，福利权总是通过政府计划来落实，满足福利权的义务便由此转嫁给了全体纳税人。

那么，从道德的角度来看，福利主义的实质就是己之所欲，索之于人。这种索取范围可能是全市，可能是全国。虽然可能不会涉及全人类。但在福利主义的各种版本中，这种索取都不依赖于个人与索取者之间的关系，也无关于个人是否愿意为索取者提供帮助，或者个人对索取者是否值得帮助的看法。这是一种强加的义务。

但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如果我独自住在一个荒岛上，那么我当然没有福利权，因为周围没有人为我提供商品。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生活在原始社会，那里的人们对医药尚一无所知，那么我自然没有得到医疗保健的权利。福利权的内容与特定的物质条件与生产力水平相关。相应地，满足他人索求的义务，也依赖于供应者的能力。我自己都不能生产的东西，你当然不能硬要我去提供给别人。

假如我有能力生产，但就是不想生产呢？假如我有能力挣更多钱，然后交更多税来支援濒临饥饿者，那么我是否就有义务为他人而更加努力地工作呢？我不知道有哪位福利主义哲学家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如果要满足强加于我的道德要求，不仅要靠我的能力，也要靠我的意愿。

这便揭示了福利主义伦理的重点，其并不主张促进人类需求满足的义务，更不用说完全满足人类需求的义务。相反，福利主义所主张的义务是有条件的，即生产者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必须让他人分享财富。这一目标与其说是造福需求者不如说是束缚生产者。其隐含的预设是，一个人的能力与进取精神是社会的资产，因此只有在为他人服务时才可以运用。

平均主义："公平"的分配

再让我们来看平均主义，我们会发现，我们由不同的逻辑思路可以推出同样的原则。决定平均主义道德框架的概念是公平，而不是权利。若观照社会整体，我们会发现，收入、财富与权力在个人和群体间的分布自有其方式。那么根本问题就是：现有的分配方式公平吗？如果不公平，那么就必须靠政府的再分配计划来予以纠正。纯粹的市场经济当然不会达到个人之间的平等。但很少有平均主义者会宣称，严格的结果平等是公平的要求。不过他们经常从倾向结果平等的立场出发进行思考，他们认为偏离平等的结果必须对社会整体有好处方才合理。就如英国作家理·亨·托尼所述："只有在确实为服务社会所必需时，不平等的情况才可被视为合理。"最近的例子有约翰·罗尔斯著名的"差别原则"，即允许不平等存在的条件是，其能够服务于社会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换句话说，平均主义者认识到，严格的平均化会对生产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他们承认，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创造社会财富有同样贡献。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人们必须得到与生产能力相应的回报，以此为激励方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但这种回报上的差异，必须被限制在为公众利益所必需的程度。

这一原则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平均主义者往往认为逻辑上应遵循基本的公平原则：人只有在道德地位不同时才需要区别对待。然而，如果我们要按此基本原则来进行收入分配，我们就必须首先假定社会确实会参与收入分配，这种假设显然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中，收入是无数个人的选择决定的，这些人来自各行各业，有消费者、投资者、企业家还有工人。这些人的选择按供求规律协调。例如，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赚的钱比临时工要多，这绝非偶然。但这绝不是社会有意分配的结果。2007

年，美国薪酬最高的艺人是奥普拉·温弗瑞，她赚了大约2亿6千万美元。这不是因为“社会”决定她能挣那么多钱，而是因为数以百万计的粉丝觉得，她的表演是值得一看的。我们现在知道，即使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收入也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尽管可能存在腐败，且其运行效果往往牵涉到官僚内斗、黑市运营等因素，自发秩序同样会起作用。

尽管没有任何实在的分配行为，平均主义者仍坚持主张，社会有责任确保收入统计分布符合一定标准的公平。为什么呢？因为财富的生产是合作性的、社会性的过程。以贸易和劳动分工为特点的社会在财富创造效率上要高于自给自足的社会。劳动分工意味着许多人都会对最终产品有所贡献，贸易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生产者获取财富的过程中曾助其一臂之力。这样的社会关系大大改变了生产的面貌，因此平均主义者说，参与生产的所有人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整体才是财富的真正来源。至少，这一整体造就了合作型社会与非合作型社会在财富上的差别。因此，社会必须确保合作成果能够在所有参与者之间公平分配。

但是，只有在把经济成果看作一个无法看出个人贡献的佚名社会产品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才是有效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必要制定事后分配的公平原则，但这一假设又显然是错误的。所谓的社会产品，实际上是众多的个别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的聚合。我们当然可以知晓有助于商品或服务生产的任何个人。如果产品是由结成群体的个人生产的，就像通常在公司里那样，那么我们就能够确定谁做了什么。毕竟，雇主不是仅凭心血来潮而雇用工人的。

如果一名工人对最终产品的形成有所贡献，那么他就会被录用。平均主义者自己也承认这一事实。所以他们说不平等如果能够激励人们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那么就是可以接受的。正如罗伯特·诺齐克所注意

到的，为了确保激励作用于合适的人，连平均主义者都必须承认，个人贡献的作用是可以识别的。总之，要在整个经济体系内根据公平的概念来改造收入或财富的统计分布是没有依据的。许多人的头脑中有这样一幅画面：仁慈的父母正在分一块大馅饼，他们希望餐桌旁的每一个孩子都得到公平的待遇。在经济领域中，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幻想。

一旦我们放弃了这种幻想，那么“不平等只有在服务于所有人的利益时才是可以接受的”这一被托尼、罗尔斯和其他平均主义者所信奉的原则又从何谈起呢？如果不能用公平来解释，那么就只能说，这一原则与个人间彼此承担的义务有关。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就回到了作为福利权基础的同一原则。这便是，生产者只有在其劳动能够使他人获益时方可享受劳动成果。你没有生产、创造、盈利的义务，但是如果你打算做这些事情，那么他人的索求便会成为你的桎梏。你的能力、你的进取精神、你的智慧、你的执着、你的目标，以及所有其他的成功所必需的素质，其实是他人的资产，而那些人能力较差，且欠缺进取精神、智慧与执着。但你却必须为他们承担义务。

换言之，各种形式的社会公平的预设都是将个人能力视为社会资产。这种预设不仅要求个人不得利用自己的能力践踏弱者的权利，而且也要求人们具有仁慈或慷慨的美德。其真正含义是，个人必须献身于或至少部分献身于对他人的服务。下面我们就来谈谈问题的症结所在。就尊重他人权利而言，我必须承认他人可以自视为存在的目的，我不会像对待无生命物体一样将他们仅仅当作为我服务的工具。那么，为什么我自视为存在的目的就变得不道德了呢？作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为什么要放弃自我尊严，把自己当作服务于他人的工具呢？

走向个人主义道路

立足于个人主义的道德意味着承认追求个人利益是合乎道德的权利，并从根本上拒绝利他主义。

利他主义者认为，生活只给我们两种选择：要么为自己牺牲他人，要么为他人牺牲自己。后者是利他主义的行为方式，其预设前提是，如果你不想欺凌弱者，那么就只能选择这种行为方式。但是，这是一个虚假的替代方案。在兰德看来，生活既不需要牺牲他人也不需要牺牲自己。理性者的利益并不冲突，要追求真正的自我利益，只需以自愿、和平的方式与他人交易即可。

要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不妨让我们自问是如何判断何为自身利益的。利益是我们争取获得的一种价值，如财富、快乐、安全、爱、自尊或其他一些好处。兰德的道德哲学立足于这样的洞见：最基本的价值、至高的善是生命本身。正是生命体的存在和自我维持的需要，使其通过不断的行动来满足自身的需求，正是生命的活动产生了价值这一现象。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将只有事实，而无价值，这个世界的任何状态都无所谓好坏。因此，最根本的价值标准便是生命，人们根据这一价值标准来判断其利益所在，生命的价值标准不只是苟活，而是不断运用自己的能力来全面满足自己的需求。

人的主要天赋与主要的生存手段是其理性思维能力。正是理性使我们凭借生产而生存于世间，使我们摆脱了狩猎和采集般不稳定的生活。理性是语言的基础，使我们得以合作和传播知识。理性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使其能够依靠抽象的规则运作。而道德的目的是提供符合理性的生活准则，从而为人们的生活服务。

要依靠理性而生，我们就必须承认独立是一种美德。理性是每一个

体的天赋。无论我们从别人那里学多少东西，我们每个人的头脑总是在思考。这是我们自己主动选择的，由我们每个人的心智规划的。因此，理性精神需要我们承担规划和维持自己的生活的责任。

要依靠理性而生，我们还必须承认多产是一种美德。生产是创造价值的行为。如果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依靠自然界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就无法过上安全和充实的生活。人也不能当他人的寄生虫。“如果某些人试图以蛮力或欺诈为生存手段。”兰德提出，“如打家劫舍、坑蒙拐骗或奴役生产者，那么结论仍然不变，这些人的生存，仰赖于其受害者，正是这些受害者的理性思考与生产满足了这些巧取豪夺之徒。这些掠夺者是无法独立生存的寄生虫，他们的行为伤害了有能力独立生存的人，后者所探寻的道路才是真正适合人类的。”

利己主义者通常被描绘成是那些为达所欲而不择手段之徒，他们会说谎、偷窃还要试图支配他人，以求满足自己的欲望。像大多数人一样，兰德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是不道德的。但她的理由并非是其伤害了他人，而是其损害了自我。某物是否符合我们的利益并不是靠主观欲望来衡量的，欺骗、盗窃、权力也不是实现幸福或成功人生的手段。我刚才提到的美德都是客观的准则，其植根于人的本性，因而适用于人类全体。但其目的是使每个人达成、维护、实现并享受那终极价值，同时也是个人生命的最终目的。”因此，道德的目的是告诉我们如何达成我们的实际利益，如何避免损失。

交易者原则

那么我们应如何对待他人呢？兰德的社会道德立足于两个基本原则：权利原则与正义原则。权利原则的意思是，我们必须以自愿交易的

方式与他人和平共处，不可使用武力。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依靠自己的生产成果独立生活，试图靠控制他人而生活的人是一种寄生虫。此外，在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中，我们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这样我们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尊重。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分享社会交往所产生的利益。这些利益既来自财富与知识的交流，也来自更加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些利益源自理性、多产及他人的个性，而这些事物需要自由才能蓬勃发展。如果我依靠武力生存，我就是在根本上攻击我所寻求的价值。

正义原则就是兰德所说的交易者原则：依靠交易而生活，以价值换取价值，既不寻求也不认可不劳而获。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会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向他人索取，他与他人建立的任何形式的关系都立足于自己创造的价值。他也不接受任何为满足他人的索求而强加的义务。珍视自己生命的人不会接受一种无限的责任，而成为他兄弟的看护者。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人希望被看护，无论是由主人还是由“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看护。兰德指出，交易者原则是人类独立、平等相处的唯一基础。

简而言之，客观主义道德将个人本身视作该词的全部含义。言下之意是，资本主义是公正和道德的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立足于承认和保护个人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智慧，追求自己的目的。在任何社会中，人都受制于自然规律。食物、住所、服装、书籍、医药不会长在树上，它们必须由人生产出来。在任何社会中，人也都受制于自身能力的限度，个人能力总是有限的。但资本主义制度所确保的唯一社会性约束是——若欲取之，必先予之。任何人不得利用任何手段来强征他人的生产成果。

结果，市场经济的运作结果，即收入和财富的分布，取决于所有参与者的自愿行动与交往。公平的概念适用于经济活动的过程而非结果。

一个人的收入只要是通过自愿交易而获得的，那便是公平的，这样的收入是创造价值的奖励，该奖励是由那些获得价值的人决定的。经济学家们早已知道，若无市场活动参与者的价值判断，便不存在商品的合理价格。对人们所提供的服务来说，其价格的形成也符合同样的道理。这并不是说，我必须以我的收入来衡量自己的价值，而只是说，如果我依靠与他人的交易为生，我就不能要求他人牺牲自身的利益来接受我的交易条件。

慈善，一种自愿接受的价值

那么穷人、残疾人或者其他类型的无力谋生者怎么办？如果这不是有关社会制度的首要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合理的。以生产能力最低的社会成员所受的待遇为主要标准来评价一个社会，正是利他主义的传统。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但我们没有理由给予穷人或温顺的人以特别的尊崇，或将其需求列为优先。如果我们必须在两种社会之间进行选择，一为没有自由但也无人挨饿的集体主义社会；二为众皆自由，但有少数人挨饿的个人主义社会，那么我主张选择第二种社会，自由的社会即有道德的社会。没有人可以声称自己有权迫使他人为其服务，即使他不这么做就活不下去。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所面对的选择。就历史事实而言，在没有自由的社会中，会有大量的人挨饿，如苏联。

在市场秩序中，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最为迅速。如果你具有完全的工作能力，那么这一点对你的切身利益来说就至关重要。资本的投资与机械的应用，又使劳动能力本不足以谋生者能够得到雇佣。例如，随着计算机和通信设备的普及，现在重度残疾人士也能够找到工作来养家糊

口。

至于那些根本无法工作的，自由社会总能在市场以外为他们提供多种形式的私人援助和慈善关怀，如慈善组织，公益团体等等。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利己主义和慈善事业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存在。鉴于我们能够从与他人的交往中得到许多好处，因此我们很自然的会以博爱的精神对待我们的人类同胞，同情他们的不幸，并在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时给予援助。但是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慈善观之间本身是存有重大分歧的。

对于一个利他主义者来说，慷慨待人在道德上是优先的。给予是一种道德义务，优先于其余的价值，而且接受给予也是接受者的权利。对于一个利己主义者来说，慷慨待人是追求价值的众多方式之一，惠及他人的价值也在追求的目标之列。慷慨待人应该根据其他方面的价值酌情施行，其原则是“能起到帮助效果时就给予。”这不是一种义务，也不是接受者的权利。一个利他主义者往往视慷慨待人为赎罪，其预设为有本事、成功、高产者及富有本身就是带罪的，或者是值得怀疑的。一个利己主义者则将这些特征视为美德，并将慷慨待人看作一种表达方式，用来抒发因这些美德而感到的自豪。

第四场革命

我一开始就说，资本主义是三场革命的结果，每一场革命都是与旧秩序的彻底决裂。政治革命确立了个人权利至上的原则，即政府是公仆，而非主人。经济革命带来了对市场制度的认识。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扩大了智慧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但人类却从未与旧有的道德秩序决裂。将个人能力视作社会资产的道德原则已不适合自由的社会。为了更

好地存续与壮大，我们需要第四场革命，一场道德的革命，从而确立个人为自己而活的道德权利。

注：

[1]　本文经作者许可转载于《新个人主义者》（*The New Individualist*）2009年春季号。

全球化：文化的解放[1]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在这篇文章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驱除了那种认为全球化资本主义会污染、侵蚀文化的杞人之忧。略萨还提出，“集体特性”的概念是不人性的，“人类真正的特性来自抵抗这些因素的能力，来自以自身创造力同这些因素进行斗争的自由行为。”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世界著名小说家和公共知识分子。2010年，他因“对权力结构进行的细致描绘和对个人抵抗、反叛与失败的犀利呈现”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著有小说《公羊的节日》《世界末日之战》《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坏女孩的恶作剧》《狂人玛伊塔》等等。

在全球化所承受的各类责难中，最能蛊惑人心的往往非关经济，而是来自社会、道德、文化诸层面，其中文化层面尤显突出。1999年，这种攻讦在西雅图的骚动中浮出水面。最近，类似叫嚣又回响于达沃斯、曼谷和布拉格，其主张如下：

随着国界的消失以及市场主导下的世界一体化，各种地域性文化、民族文化，以及凸显国家和地域文化特征的传统、风俗、神话及习惯，都将万劫不复。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无法抵抗发达国家文化产品的侵略，确切的来说，是超级大国——美国的文化侵略，大型跨国公司正是其开路先锋。北美文化终将独霸天下，并消灭世上多姿多彩的文化群落。如此一来，不仅是弱小民族，所有其他民族，都将失去其特性和灵魂，都将沦为21世纪的新殖民地——堕落成僵尸，或者符合新帝国主义

文化标准的复刻品。新帝国主义不仅会凭借资本、军事力量和科学知识统治全球，还会强迫全世界人民使用它的语言，按它的方式进行思维、信仰、消遣甚至幻想。

拜全球化所赐，世界正在失去语言和文化上的多样性，世界文化正为美国盗用——这种恶梦或者说反乌托邦幻想并非那些左翼政客所独有。这种因仇恨北美巨人而引发的迫害狂在发达国家和文化高雅的民族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政界也大有市场，无论左、中、右。

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出自法国，法国政府声称法兰西“文化特性”受到了全球化的威胁，于是我们目睹了以保护文化为名义发起的连场运动。这片孕育过蒙田、笛卡尔、拉辛和波德莱尔的土地，这个很早以来就是时装、思想、艺术、饮食及所有精神领域权威的国家，居然会遭到麦当劳、必胜客、肯德基、摇滚、说唱、好莱坞电影、牛仔裤、运动鞋和T恤衫的入侵，无怪乎大批知识分子和政客要陡然警觉起来。这些人的恐惧自然会体现在行动上，例如他们促使法国政府给予本国电影业巨额补贴，要求剧院按配额放映一定比例的国产片，并且限制从美国进口的电影数量。也正是因为这种恐惧，地方政府颁布苛法，对在法语中夹杂英语的公开宣传物课以高额罚金（不过从巴黎街头行人的看法来判断，这项法令并没有得到认真对待）。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若泽·博韦（José Bové），这个反垃圾食品的农民十字军俨然成为法国的大众英雄。他最近被判入狱3个月，其知名度可能因此而再度提升。

尽管我无法苟同这种在文化层面上对全球化所进行的攻击，但是，我们还是要承认，这些主张的背后深藏着无可争辩的事实。本世纪我们所栖息的这个世界不会像20世纪那样千奇百怪，充满地域色彩。节日、服饰、风俗、庆典、仪礼、信仰，这些事物曾使人类在民俗和种群方面充满了多样性，如今它们正逐渐消亡，或者仅为少数群体所保守，而主

流社会则将它们抛弃，并吸纳了其他更适合当代现实的事物。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在经历这一过程，快慢不一，但这本非肇端于全球化。确切地说，这是现代化所造成的，全球化是现代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当然，有人会惆怅这一过程，会念念不忘逝去的旧式生活。从现代人的角度回头审视，往昔岁月似乎尤显趣味盎然、别具一格、多姿多彩。然而现代化进程势在必行。古巴、朝鲜之类的极权政府对任何形式的开放都充满疑惧，因为它们认为开放会毁灭其政权，所以它们攻击现代性，颁布种种禁令，自闭于现代化进程。但是就连这些国家也无法阻止现代性的逐渐渗透，逐渐销蚀它们的文化特性。理论上来说，一个国家还是有可能保留这种特性的，但该国必须下决心与世隔绝，就像某些非洲或亚马逊地区的偏远部落，断绝与他国的一切交往，完全过自给自足的生活。如此保留文化特性将使那个社会倒退至史前时代的生活水平。

现代化使得许多传统生活方式走向消亡，这的确是事实，但与此同时，现代化又创造了无数的机会，为整个社会构筑了至关重要的进身之阶。所以，如果人民能够自由选择，他们时常会与其领袖或传统主义知识分子背道而驰，义无反顾地选择现代化。

对全球化的非难，对文化特性的偏爱，显示出一种毫无历史依据的静态文化观念。有历久而一成不变的文化吗？也许有，但是你得到笃信巫术、居于洞穴、膜拜雷电和猛兽的小型原始部落去搜寻，这些文化过于原始，所以面对开化与消亡日显脆弱。其他一切文化，尤其是那些公认为现代的、生机勃勃的文化，都已演化至相当的高度，只留下些许两三代之前的痕迹。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这样的国家，此类演化尤为明显。他们在过去50年中经历了剧烈而影响深远的变化，要是马赛尔·普鲁斯特、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或弗吉尼亚·伍尔芙这些文学家重返人间，他们应该很难认出生养他们的社会——而他们的作品曾对社会的演

化大有助益。

“文化特性”的说法是危险的。从社会角度来看，这仅仅是一个可疑的杜撰概念，但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文化观念”说已经威胁到了人类最为珍贵的成就——自由。我承认，说同一种语言，出生并生活于同一地域，面对同样的问题，奉行同样的宗教和风俗，这样的群体自然有共同的特点。但强调这些共同特点不可能准确描述群体中的任何个体，反而会抹杀或遮蔽个体的区别性特征。特性这一概念如果不专门用于个人的层次，那必然是化约主义（Reductionist）的，同时也是漠视人性的，必然会以集体主义的抽象意识形态来化约人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化约所有非遗传的、非地理的、非经社会压力塑造的个性。而事实恰恰相反，人类真正的特性来自抵抗这些因素的能力，来自以自身创造力同这些因素进行斗争的自由行为。

“集体特性”的说法是种虚构的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的基础。在许多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看来，集体特性并非基于事实，即使对于最为古老的群落来说也是如此。共同的习惯与风俗对于群体的自我保护来说可能是极其重要的，但供群体成员发挥开拓创新精神以摆脱群体束缚的空间也是巨大的。如果不把个体当作集体中无足轻重的组成部分，而考察其本身，那么个体间的差异要超过集体的共同特点。全球化疾风骤雨般的给全世界人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通过自愿的行为，根据偏好和个人动机来塑造个人的文化特性。过去，人们因语言、民族、教派、家乡习俗而受困于某种特性，仿佛受困于无法逃离的集中营。这种束缚在如今的许多地方依然存在。但是总体来说，此类特性已经无法控制人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当然要欢迎全球化，因为全球化极大地拓宽了个人自由的范围。

一个大陆，两部历史

确立集体特性的企图是诡诈而荒谬的，要说明这一点，拉丁美洲大概是最好的例子。什么是拉丁美洲的文化特性？在那些不可分割的一连串信仰、风俗、传统、习惯以及神话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能赋予该地区单一的、独特的且不可转让的人格？知识分子在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我们的历史便是在他们的论战中熔铸而成的，有时论战相当激烈。其中最有名的一次爆发于20世纪初，那次论战造成了西班牙裔与土著裔的族群对立，其影响波及整个大陆。

对于何塞·德拉·里瓦·阿圭罗、维克托·安德列斯·贝朗德和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卡尔德隆这些西班牙人来说，由于地理大发现和西班牙的大征服，在加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地区并接受基督教之后，拉丁美洲宣告诞生，继而成为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西班牙人并非轻视土著文化，而是将其视为社会及历史现实中的一个方面——而且不是主要方面。正是由于西方所赋予的生机，这方面的文化才完善了自身的特点与个性。

另一方面，土著人则满怀义愤地排斥所谓欧洲人带入拉丁美洲的各种好处。在他们看来，拉美人的特性只有在土著文化与文明中才能找到根基和灵魂。土著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被暴力无情腰斩，受尽了责难、压迫和边缘化。这不仅在3个世纪的殖民时期如此，实行共和之后也未改变。根据土著思想家的说法，真正的“美洲人话语”（取自何塞·莱萨马·利马（José LezamaLima）所著书名）留存于一切面对西方文化的压迫和抵抗至今的文化形式中，如土著的语言、信仰、仪礼、艺术及大众习俗。著名秘鲁历史学家路易斯·E.巴尔卡塞尔（Luis E.Valcárcel）便持这种观点。他甚至公然主张教堂、修道院及其他纪念殖民的建筑物都应被焚毁，因为这些事物是“反秘鲁”的。它们是冒名顶替者，是对纯粹的美洲特性的否定。只有通过溯源土著文化，才能找到真正的美洲特性。拉

丁美洲最有创意的小说家何塞·玛利亚·阿格达斯（José MaríaArguedas），在其史诗般的故事中，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满怀义愤地讲述了盖丘亚文化在西式文明的窒息与扭曲中如何生存于安第斯社会的艰辛历程。

西班牙语学者和土著学者，都进行了出色的历史研究和充满想象力的文学创作，但是若以我们现在的立场来判断，则双方的立论看起来都过于狭隘、过于简单，所以都有失偏颇。谁都无法用自己那套意识形态来框范拉丁美洲的纷繁多样，而且双方都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如今谁敢声称，只有“西班牙”的事物或“印第安”的事物才是拉丁美洲的合法代表？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人出于政治或理性的狂热而试图打造和提炼出独一无二的拉美“文化特性”，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企图将某种文化特性强加给某个民族，等于把这一群体投入监狱，并剥夺他们最为珍贵的自由——选择干什么、怎么干及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自由。拉丁美洲拥有的文化特性不是单一的而是纷繁芜杂的；谁也不能声称自己比他人更合法或者更纯粹。

毋庸置疑，拉丁美洲包含着前西班牙世界和它的文化，在墨西哥、危地马拉及安第斯诸国，它们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但拉丁美洲同样聚居着大批说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居民，他们的身后有着500年的传统，他们的存在与行为对这片大陆如今的面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非洲人也曾随同欧洲人踏上这片土地，那么拉丁美洲不也就有了非洲的特征吗？我们的皮肤上，我们的音符间，我们的个性里，我们的社会中，不也有非洲人留下的无法抹去的烙印吗？塑造拉丁美洲的各种因素，文化的、民族的、社会的，几乎把我们同世界上的所有地区与文化联系了起来。我们的文化特性太多，所以也就近乎完全没有。这就是现实，同民族主义者笃信的截然相反，这些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这也是一份绝佳的证明，令我们认同自己为全球化世界中的成熟公民。

地区性的声音，世界性的影响

对全世界美国化的恐惧，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妄想，根本没有现实依据。诚然，正如中世纪的拉丁语一样，全球化一定会使英语成为当代的通用语。而且英语的影响还将继续扩大，因其于国际事务与交流中，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英语的兴盛，就一定意味着其他重要语言的衰弱吗？绝对不是，事实恰恰相反。随着国界的消失，各国间的依存度也日益提高，这就促使年轻人去学习、吸收其他文化，这不仅是爱好，也是出于必要，因为对事业成功来说，多语言会话与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已具有关键性作用。不妨来看看西班牙语。半个世纪以前，西班牙语社会都是内向的，在传统的语言区以外，我们殊少自我表现。如今，西班牙语生机勃勃，发展迅猛，在五大洲上都已生根发芽，甚至开花结果。今天，美国有2500～3000万人在说西班牙语，因此，美国的两位总统候选人，德克萨斯州长乔治·沃克·布什和副总统艾伯特·戈尔，在竞选时不止要说英语，还要说西班牙语。

世界各地有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正在全球化的激励下学习日语、德语、普通话、广东话、俄语和法语。幸运的是，这一势头在未来数年内还将持续高涨。所以，要保护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全球化的世界里有力地将之推广，而不是自欺欺人的执拗于语言文化的纯洁性，并以此来应对英语的威胁。出此下策者，满嘴谈的都是文化，但他们才是愚昧之徒，他们只是想用文化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民族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与文化的普世精神相牴牾，那就是民族主义者那狭隘的、排他的、混淆视听的观念，他们企图将这样的观念强加于文

化生活。而文化给我们上了绝妙的一课，让我们懂得：要使文化保持生机与活力，无需官僚或政委，也无须，笼子的限制或海关的隔离；此类做法只会适得其反，会加速文化的衰败甚至凋零。文化必须自由发展，必须不断与其他文化切磋。这样才能促进文化的新陈代谢，使之不断演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生活潮流。上古时代，拉丁文化并没有扼杀希腊文化；相反，希腊文化的艺术创造力和高深智慧，深深影响了罗马文化。随着罗马文化的传播，荷马的诗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遍了整个世界。全球化不会令地方文化消亡；在全球性开放的大环境下，只要地方文化里有可贵的、值得传世的元素，则必将找到适合其生息繁衍的沃土。

这样的事情既发生在欧洲，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那里的地域性文化正重现勃勃生机。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地域性文化遭到压制，被迫转入地下。但是，随着民主的回归，西班牙丰富多彩的文化解除了束缚，得以自由的发展。在西班牙的自治地区，地方文化格外兴旺，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加利西亚和巴斯克乡村，其他地方也是一派欣欣向荣。当然，我们不可将地域性文化的重生与民族主义现象相混淆，前者是积极的，能使生活多姿多彩，后者则是对文化自由的严重威胁。

1948年，T.S.艾略特在其名篇《文化释义札记》中预言，未来人类将经历地方文化和地域性文化的复兴。那个时候，他的预言显得颇为大胆。然而，在21世纪，全球化很可能将这个预言变为现实。对此，我们应当感到高兴。弱小的地方文化之重生，将使人类再现行为与话语的高度多样性。从18世纪末开始，尤其是在19世纪，民族国家为了塑造所谓的民族特性，致力于消灭这种多样性（这一事实很容易被遗忘，或者说，因其黑暗的道德内涵，我们企图将其遗忘）。民族文化往往成型于

血与火之中——只因与民族国家所追求的理念不符，方言的教授和出版以及某些宗教、习俗都处于禁止之列。就这样，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强制推行着主流文化，地方文化则遭到压制、废除，被迫退出主流生活。然而现在，与视全球化如洪水猛兽者的警告恰恰相反，只要文化的背后有悠久的传统与人民的奉行——哪怕是隐秘的奉行，那么无论这种文化多么弱小，要将其消灭都变得不那么轻而易举了。今天，由于民族国家的式微，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曾被遗忘的、被边缘化的、被压制的地方文化在全球化的大合唱里重现生机，焕发出蓬勃的活力。

注：

[1] 本文系经作者同意后选印自《外交政策》，2001年1月1日特刊。

通过全球化改善人类处境[1]

弗农·史密斯

在这篇文章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通过市场秩序的扩展追溯了人类财富的增长过程，并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资本主义能够改善人类的处境。

弗农·史密斯是美国加州查普曼大学经济学教授，是“实验经济学”的先驱，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有商品和资本市场、资产泡沫生成、商业周期、金融，自然资源经济学以及市场制度的发展。2002年，他与另一位学者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为“将模拟试验作为工具应用于实证经济分析，特别是在市场替代机制的研究方面。”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涉及经济学、博弈论及风险研究，他的著作有：《实验经济学论文集》、《谈判和市场行为：实验经济学文集》。史密斯也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教学专家，他不仅要把实验经济学用于经济进程研究，而且也用于教授经济学原理，为此他已制定了各种方案。

我今天给大家传达的信息是乐观的。这个信念有关于交易和市场，正是交易和市场使我们能够从事各种工作，使知识有了专业分工。知识的专业分工，正是一切财富创造的秘诀，是人类处境持续改善的唯一动力来源。这就是全球化的本质。

目前的挑战是，我们所有人都同时在两个互有交集的交易体系中活动。在第一个体系中，交易的基础是小群体、家庭及社区中的互惠原则和共同规范。我们在这样的体系中生活，在这样的体系中进行个体间的

或社会性的交易。我们常说“我欠你的”，这句话跨越了多国语言，通用于人类世界，这是将受惠视为负债的自愿确认。从原始时代起，个体间的交易便催生了劳动的专业化（狩猎、采集和工具制造），从而为生产率和福利的增长奠定了基础。这种劳动分工使早期人类的世界性迁徙成为了可能。因此，在市场制度正式出现之前，专业分工便已催生了全球化。

在第二个体系中，交易的基础是市场，其原则是非人情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与陌生人进行长途贸易。交流与协作的方式也逐渐变得复杂。通常，在个体间的交易行为中，为他人做好事会成为我们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在市场上则常常付诸阙如，我们每个人都会专注于一己之利。然而，我们的模拟实验表明，同样的人，在个体间交易中会千方百计配合对方，在规模更大的市场交易中又会最大限度的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时，在市场交易中，他们也会不自觉地尽可能扩大自己在团队利益中的份额。为什么呢？因为财产权的缘故。在个体间的交易中，基本规则源自双方的自愿同意。在非人情的市场交易中，基本规则——如禁止只取不予的财产权，则是由制度框架所确立的。因此，两种交易体系其实是以同样的方式运作的：若欲取之，必先予之。

繁荣的基础

商品和服务市场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其确定了专业化的程度。在有序的市场中，生产者揣摩相对可预测的生产成本，消费者依赖相对可预测的有价值商品的供应。这些不断重复的市场活动难以置信的高效，即使是在非常复杂的多种商品交易的市场关系中。

通过市场实验，我们还发现，人们普遍否认可以通过某种模型来预

测最终交易价格与货物进出数量。事实上，市场的效率并不需要大量的参与者、完整的信息、经济学知识或某种复杂的理论。毕竟，早在研究市场过程的经济学家出现之前，人们就已经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了。你只要知道，什么时候赚得多，什么时候赚得少，以及是否有机会修正自己的行为。

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特点是多样性，口味、技能、知识、自然资源、土壤和气候的多样性。没有自由交易的多样性意味着贫困。单一技能或资源的存量即使再丰富，若没有贸易也无法蓬勃发展。通过自由市场，我们彼此依存，即便我们互不相识、素昧平生、甚至隔阂既深。毋庸置疑，若没有市场，我们会穷困潦倒、苦不堪言、粗俗野蛮、愚昧无知。

市场需要对规则实施的认同，需要社会协作以及经济交流。对此，大卫·休谟在250多年前曾有精妙论断，他说，只有3种自然法则，首先是财产权；其次是财产的约定转让；最后就是约定的履行。这是市场秩序的根基，使市场能够正常运作，使繁荣有了保障。

休谟的法则源于古老的十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偷来盗去只会消耗财富并遏制其再生产。觊觎他人财物则会引入强制的财富再分配模式，从而危及未来的生产激励。做假证人就意味着对社区、管理、诚信、投资信托、长期利润的侵蚀以及对最具人情的个体间交易的破坏。

市场制度能创造效益

经济发展是与由法治和私人产权培育的自由的政治经济体制紧密相连的，在严格的计划体制之下，效益的创造是无从谈起的。无数事例已

经充分说明，国家无论大小（无论是中国、新西兰还是爱尔兰），只要解除对经济自由的管制，哪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民自主追求经济效益，其经济便可获得显著增长。

中国已大步迈向经济自由。就在一年前，中国修订了宪法，允许人们拥有、购买、出售私人产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中国政府遇到过的一个问题就是，即使交易未获政府认可，人们也在买卖产权，这就使得地方官员可以从这种非法交易中抽头。财产权得到确立后，中央政府就能从源头上切断地方官员的腐败权力。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这种腐败对于中央来说就是很难监控的。我认为这一修宪举措能够有效地控制猖獗的腐败现象，并遏制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干预。

这种变化并非肇端于任何政治自由倾向，而在很大程度上将可能提高社会的自由程度。其好处是立竿见影的：在京郊某大型科技园区，世界500强中已经有276家落户于此，当地的设施非常好，该园区便和中国政府签订了令人满意的50年土地租赁合同。

爱尔兰的例子则说明了这样一个原则：小国也能通过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来实现富裕。过去，爱尔兰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国。这令美国和英国得到了好处，这两个国家接纳了许多聪明的爱尔兰移民，这些移民正是为了逃离僵化的生活背井离乡。仅仅20年前，爱尔兰仍深陷第三世界级的贫穷，但现在其人均收入已超过前宗主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欧盟成员。据世界银行统计，爱尔兰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的3.2%跃升至90年代的7.8%。最近，爱尔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在世界上位列第八，而英国位列第十五。通过促进外国直接投资（包括风险投资），提升金融服务与信息技术，爱尔兰经历了令人刮目相看的人才回流，年轻人又回家了。

这些年轻人回国是因为新机遇如雨后春笋般萌发，而新机遇的到来正是因为经济自由在祖国的扩大。他们是知识型实干企业家典范：他们不仅为祖国，也为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所有其他国家创造财富，并改善了人们的处境。这些人的故事表明，政府的糟糕政策是如何得以改变的，而这种改变将创造新的经济机会，从而使该国人才大规模回流。

我们没什么好怕的

变革、增长、改善经济，这些过程的重要条件就是让过时的工作岗位遵循过去的技术而流动。就算阻止国内企业外包，外国的竞争对手也会这么做。通过外包，国外的竞争对手能够降低成本，并靠省下的资金来降低价格和升级技术，从而在市场上获得巨大优势。

有关外包，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便是新英格兰纺织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迁。这一举动的原因在于南方各州的低工资（正如之前所预料的那样，南方的工资上涨之后，这些行业最终被迫转移到了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亚洲）。

但新英格兰的工作岗位并没有消失。纺织企业被替换为高新技术产业：电子信息和生物技术。这使得新英格兰地区获得了巨大的净收益，即使它失去了一个曾经非常重要的产业。1965年，沃伦·巴菲特控股伯克希尔·哈撒韦，那是马萨诸塞州的没落的纺织品制造商之一。他将该公司巨大的、但正在缩减的现金流再投资于一大批被低估的商业项目。他们大获成功，40年后，巴菲特的公司市值已达113亿美元。如今，凯马特和西尔斯也在进行同样的转向。没有什么是永远的：老企业衰弱，它们的资源被转移到新的领域。

全国经济研究局刚刚公布了美国跨国公司国内外投资的最新调查结果。数据显示，跨国公司在国外每投资1美元，就会在美国国内投资3.5美元。这证明了国外和国内投资之间的互补关系：一方增加时，另一方也会增加。麦肯锡公司估计，美国公司通过外包给印度的每1美元，都会给本土带来1.14美元的收益。大约一半的收益会返还给投资者和客户，其余的大部分则用于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德国在海外投资的每1欧元，只能让国内经济获得80%的收益，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下岗工人的再就业率要低得多，个中缘由便是政府的大规模管制。

我相信，只要美国长期保持全球创新指数第一，那么对外包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政客们抵制外包得逞，那才是真正可怕的。根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有超过115万的高薪计算机软件工作岗位是在1999—2003年间创造的，而由于外包所消失的就业机会只有70000个。同样，在服务行业，12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正在生成，同时1000万个旧有岗位则被取代。这种飞速的技术变革与工作岗位的新陈代谢是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

美国企业通过外包给国外节省了资金，从而能够投资开发新的技术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最终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力。不幸的是，要享受到好处就必须经历转型之痛。变化肯定是痛苦的。对那些失去工作，必须寻找新职业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对那些冒险投资于新技术而失败的人来说是痛苦的。但成功者在获得好处的同时能为整个经济体创造大量新的财富。通过探索发现的过程与竞争性的经验学习，这些好处又随之在整个市场内得到了整合与巩固。

全球化是一个现代词语，但其所指并非新的现象，该词所描述的是一种古老的人类活动，该词指的是人类通过交易，通过世界范围内的专

业分工来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全球化是一个和平的字眼。正如伟大的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道出的箴言：如果商品不跨越国境，那么士兵们就会跨越国境。

注：

[1] 本文摘自弗农·史密斯2005年9月在“经济学教育基金晚会”上发表的讲话。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延伸阅读——《福利国家之后》

A little Further Reading for Fun and Understanding

汤姆·戈·帕尔默

如癌变的肿瘤一般，福利国家在不断扩散，其规模日益壮大，并持续威胁到为其提供营养的社会的健康。和所有对社会的威胁一样，它们值得进一步研究。在本书的注释中，引用了许多额外的书籍和文章，读者们不妨自行参考。有大量的文献在为福利国家辩护，一个福利国家的研究者应从不同的角度去检验这一议题。下面列出的第一本书是诺曼·巴里教授的《福利》，这本书为这些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综述和对各方文献的指引。列出的其余书籍则集中于对福利国家提出批评和替代方案。

1.《福利》（*Welfare*）

作者：诺曼·巴利（Norman Barry）（英国白金汉：开放大学出版社.1990年）

这本小册子提供了一个对福利国家的历史、功能、辩护与批评的公正综述。

2.《从互助到福利国家》（*From Mutual Aid to the Welfare State*：*Fraternal Societies and Social Services*）

作者：大卫·贝托（David Beito）（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0年）

历史学家大卫·贝托证明并描述了美国互助组织的历史，这些互助组织为数百万人提供了团结、福利和进步，但在整个20世纪被福利国家政策系统性地取代。

3.《重塑公民社会》（*Reinventing Civil Society*：*The Redis-covery of Welfare without Politics*）

作者：大卫格林（David Green）（伦敦：奇维塔斯研究院，1993年）

集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于一身的大卫·格林已经率先研究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社会中的“兄弟会”。格林不仅证明了兄弟会的存在并阐明了它们的作用，还把兄弟会放到了广义的古典自由主义对公民社会的理解之中。（这本书可以在www.civitas.org.uk/pdf/cw17.pdf下载）

4.《再分配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distribution*）

作者：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1990年）

这本小册子基于这位著名的法国政治学家在剑桥大学所做的一些讲座。本书提供了一个对收入再分配之争的有力的批评性检验。

5.《自己的生活》（*A Life of One's Own*：*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Welfare State*）

作者：大卫·凯利（David Kelley）（华盛顿：卡托研究所，1998年）

一个道德哲学家探讨了福利国家的哲学基础，并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角度对其进行了批评。

6.《自由意志者的理论、历史与实践》（*Realizing Freedom*：*Libertarian Theory*，*History*，*and Practice*）

作者：汤姆·戈·帕尔默（Tom G.Palmer）（华盛顿：卡托研究所，2009年）

这部由《福利国家之后》的编辑所著的论文集收录了对“福利权”理论的若干批评，包括“从它的朋友们那里拯救权利”。

（原载于*Individual Rights Reconsidered*，edited by Tibor Machan[Stanford：Hoover Institution Press，2001]，网上可见：tomgpalmer.com/wp-content/upl-oads/papers/palmer-individualrightsreconsidered-chapter2.pdf）。

7.《重估瑞典模式》（*The Swedish Model Reassessed*：*Affluence Despite the Welfare State*）

作者：妮玛·萨南达季（Nima Sanandaji）（赫尔辛基：自由研究所，2011年）

这个对瑞典福利国家的简短研究为瑞典繁荣的源头和福利国家对那里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比较性的洞察。

（网上可见：www.libera.fi/wp-content/uploads/2011/10/Libera_The-Swedish-model.pdf。）

8.《福利国家是正义的吗？》（*Is the Welfare State Justified*？）

作者：丹尼尔·夏皮罗（Daniel Shapiro）（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年）

这本书描述了在制度上和实践上常见的绝佳理由，着眼于福利国家制度如何实际运作的证据，并根据最普遍持有的对正义的观点接着追问福利国家制度是否正当。本书是一本道德哲学的学术著作，然而可读性和易读性俱佳。

编者按：对于政府预算失衡的当前估值，本书的各位作者给出了几个稍有不同的数字。这些差异反映了对未来情况的不同估计、项目的不同类别和数字计算的不同时间跨度。尽管存在这些差异，所有的计算都得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金额，与官方承认的政府债务相形见绌。现代福利国家无准备金的负债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是巨大且在当下非常严重的威胁。这些债务反映了他们的长辈，那些允许这一切发生的人的严重不负责任。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延伸阅读——《市场的德性》

A little Further Reading for Fum and Understanding

汤姆·戈·帕尔默

有关市场德性的文章很多，不过大部分都毫无价值。这里介绍的是基本值得一读的书，对于了解相关问题大有裨益。这份书单本来会长得多，但许多著作文章都已在《市场的德性》中提及，如斯密、米塞斯、哈耶克、兰德、麦克洛斯基等其他自由市场捍卫者的作品。所以不要对本书所录文章的注释项心生畏惧。这就是说，以下各部著作，应该能够对头脑的训练有所助益。

1.《市场制度的道德及相关论文》（*The Morals of Markets and Related Essays*）

作者：哈·拜·阿克顿（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1993年）

英国哲学家哈·拜·阿克顿清晰明了的阐述了利润、竞争、个人主义以及集体主义、计划经济，亦涉及其他许多主题。

2.《道德与市场：阐述当代世界的进化》（*Morals and Markets*：*An Evolutionary Account of the Modern World*）

作者：丹尼尔·弗里德曼（Daniel Friedman）（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出版公司，2008年）

作者就市场和道德的平行进化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对两者的改善提出了一些争议性的建议。

3.《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

作者：弗·奥·哈耶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

哈耶克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并非“仅仅是个经济学家”。本书是哈耶克的最后一部著作，篇幅虽短，却汇集了他在各研究领域的智慧结晶，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提供了全面的论据。

4.《再分配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distribution*）

作者：伯纳德·德·茹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印第安纳波利斯：自由基金，1990年）

茹弗内尔是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这本小册子收录了他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各章短小精悍。再分配政策旨在促进收入平等，本书对其基础与意涵作了简明扼要的揭示。

5.《发现与资本主义过程》（*Discovery and the Capitalist Process*）

作者：伊斯雷尔·柯兹纳（Israel Kirzner）（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5年）

作者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他从企业家精神出发，审视了资本主

义、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深入阐述了机敏精神、创新精神、激励与收益。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译后记

Translation Postscript

在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员黄渤在歌曲《我的要求不算高》中唱到：

养老生病不差钱，有政府来买单。

这句歌词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福利主义离我们并不遥远。其实，它在我国有着非常广泛的民意基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福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呼声背后的人也许并没有深思熟虑：政府并不产生财富；让政府来买单，就是让自己来买单；更糟糕的是，实际上你可能还一直在为别人买单。

此外，即使在普遍支持更低税率和更低福利的阵营中，也有一些人认为：既然我们已经缴纳了高额税金，并且暂时又看不到减税的希望，那么增加一些福利又有何不可呢？总比什么也得不到强！

我们翻译这本书，便是想为以上两种人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本书是一本文集，收录了来自世界各国学者的文章。在帕尔默的巧妙编辑之下，这些文章形成了一个关于福利国家的完整体系：它们有的在阐述福利国家引发灾难的机制，有的在回顾福利国家的起源，有的在呈现福

利主义拖垮整个国家的案例，有的则在提供福利国家的替代方案。

希望在看完本书之后，人人都能重新思考一下福利国家的问题。的确，在接受一种足以改变绝大部分人命运的思想之前，我们有必要多想一想——看看欧洲在福利国家的政策下，究竟成了什么样子。

如果你现在能开始理解，黄渤们的要求不仅很高，还隐藏着灾难性的后果，那我们便也很满足了。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许多朋友的努力。我翻译了序言和第一篇文章并统校了全书；李杨翻译了第三、第五、第六和第七篇文章；董子云翻译了第二、第四和第九篇文章的前面一部分；刘纽翻译了第八篇文章；吴荻枫翻译了第九篇文章的后半部分；施轶翻译了附录部分的《市场的德性》。此外，冯兴元教授在最开始向我介绍了本书并慷慨赐序，周媛媛为本书联系了版权方，阿特拉斯经济研究基金会的Tom G.Palmer、Matt Warner、Elisa Bishop和Jude Blanchette也一直在支持本书的出版，还有邓琳也为校对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向他们感谢！当然，还要感谢本书的编辑们，是他们促成了本书的最终出版。

最后，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出现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邮件至xiongyue@miseschina.org）。

熊越

北京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